

江苏地方志

J I A N G S U D I F A N G Z H I

- 蒋少华 说“甘泉” / 4
- 沈建东 鱼事江南说苏州 / 13
- 叶正亭 红木家具之“苏工” / 32
- 高建国 美食家的摇篮 / 49
- 宫风华 味蕾上的清明 / 61
- 老 铁 莫愁湖曾公坊之始末 / 89
- 宋本竞 新兴的“盐”与“灶” / 93



〔明〕仇英《松溪论画图》

城市文脉

- 蒋少华 说“甘泉”（4）
- 邹晓华 镇江的山水人文精神（7）
- 丁 东 鹞山，桃源深处的守望（11）

风物揽胜

- 沈建东 鱼事江南说苏州（13）
- 杨瑞庆 影像中的昆山古建筑（22）
- 陈奕通 江宁织造府的戏曲往事（27）
- 刘跃清 南京长江大桥建成前两岸交通情况（29）

文化遗珍

- 叶正亭 红木家具之“苏工”（32）
- 顾晓清 “苏作”工匠精神面面观（34）
- 凌龙华 黎川风流黎里桥（37）
- 霍云峰 泰州安定书院的历史变迁（43）
- 侯富芳 半间书屋传四世 千卷书香润长淮（45）
——陈畏人、陈慎侗父子藏书整理手记

江南味道

- 高建国 美食家的摇篮（49）
——陆文夫与美食文化（十七）
- 章国荣 东台旧时厨行（57）
- 宫风华 味蕾上的清明（61）
- 徐永清 祥瑞美食子孙饼（65）
- 马学仁 南京板鸭（67）



古籍勾玄

- 张晓婉 新建瓮城记铭碑略述（70）

修志研究

- 韩章训 江苏乡镇志发展述略（72）

年鉴论坛

- 陈晓婧 浅议《江苏年鉴（2017）》编纂特色（77）

人物长廊

- 李嘉球 清末著名女诗人吴茵（79）
- 陈 益 《巢林笔谈》与白鱼段（83）

历史探秘

- 孙中旺 苏州历史上的意外漂海事件（85）
- 老 铁 莫愁湖曾公坊之始末（89）

书 评

- 雷 雨 读高安宁新著《千秋风雅秦淮河》（92）

地名溯源

- 宋本竞 新兴的“盐”与“灶”（93）





刊名题字 刘海粟

封面设计 潘小庆

2018年第3期

(总第175期)

主管单位: 江苏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

主办单位: 江苏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

出版单位: 《江苏地方志》编辑部

广告发布: 《江苏地方志》编辑部

广告经营许可证: 320000495003

地址: 南京市建邺路168号2号楼4楼

电话: 025-83102716

传真: 025-83102716

邮编: 210004

E-mail: jsdfz@vip.163.com

http://www.cnki.net

印刷单位: 南京凯德印刷有限公司

发行范围: 公开发发

ISSN 1003-8485

CN 32-1011/K

国内发行: 《江苏地方志》编辑部

国外发行: 中国国际图书贸易公司

(北京399信箱 国外代号BM6797)

中国出版对外贸易公司(北京782信箱)

定价: 10.00元

本刊启事

凡向本刊投稿, 请同时提供相关图片(尺寸cmyk: 300dpi)。稿件一经采用, 均视为作者已许可本刊使用该投稿作品的信息网络传播权, 本刊所支付的稿酬中已含许可使用该权利的报酬。本刊除署名及作者提供的图片外, 部分选用了其他资料照片和网络图片, 敬请作者与本刊联系。

《江苏地方志》编委会

主 任

漆冠山

副主任

牟国义

编 委

闫文献 许建军 宋余东 李亚雄

陈兴南 张鹏飞 徐勤飞 周 平

茆贵鸣 殷元松 吴海平 张士林

孙正龙

主 编

牟国义

责任编辑

孙 进 雷卫群 邬 进 卢 岚

责任校对

孙 进 雷卫群 邬 进 卢 岚

纪莉莉



风雅江苏微信公众号

2018年6月10日出版





说“甘泉”

◎ 蒋少华

城市文脉

“甘泉”在扬州地方历史文化中具有深厚的含义和较大的影响，现存的甘泉山、甘泉街道、甘泉路等地名都源出于此。梳理分析“甘泉”的文化底蕴，可简而言之：因泉而得名，因山而灵异，因县而兴盛。

一、甘泉和甘泉山

甘泉山因甘泉而得名。“甘泉”是一个美名，泉水甘冽，也反映了农业社会的人们对灌溉的良好愿望。这看起来很简单的地名，却是别有深意。甘泉山，地处扬州市郊西北，海拔虽然只有63米，却远远高过蜀冈上的观音山(35.5米)、平山堂(35米)，是市区的最高峰。这种“最高峰”的身份，很早就为古人所注意，也因此产生了种种联想和传说。

理解甘泉山，有三条线索：天象、方位、地脉。先说天象。北宋乐史编著的《太平寰宇记》卷一二三记载了西汉广陵厉王刘胥冢墓，还引《郡国志》：“广陵厉王胥冢，岁旱鸣鼓攻之，辄致云雨。”意思是说，西汉广陵厉王刘胥能够呼风唤雨，保佑一方。在这里，乐史没有提到甘泉山，不过刘胥能够“致云雨”，留下了与甘泉山联系起来的想象空间。明代《嘉靖惟扬志》是现存已知最早的扬州地方志，不过包含山川在内的三卷散佚了，无法直接看到关于甘泉山的记载。古代地方志的编纂，其惯用手法是后代抄前代。清《光绪增修甘泉县志》卷二《山川》就抄录了《嘉靖惟扬志》关于甘泉山的记载：“山上有七峰联络如斗，平地错落，诸圆冈凡二十八，如列宿拱斗然。”即甘泉山共有7座山峰，如同天上北斗，山脚周边还有28个丘冈，仿如众星拱卫。把普通山丘与天象联系起来，则是披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并上升到哲学的高度。到了清代，甘泉山的故事传说最终定型，涵盖了丰富的天象、地理、人文等内容。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二三《南直五·扬州府》江都县载：“甘泉山，府西北三十五里。高二十余丈，周围二里。山有七峰联络如同北斗，平地错落。又有圆冈二十八，如列宿之拱北。上有泉甚甘，因名。”这里共有五层意思，其一指出方位，其二点明规模，其三、其四联系天象，其五说明得名之缘由。这种说法，为后世地方志所沿袭，成了定论。

把甘泉山七峰比作北斗七星，固然是数字上的吻合和感觉上的契合(如仰望山峰与仰望星空有相似之处)，可把地理与天文联系起来，既体现了古人对地理实体的人文化，也反映了古人的信念和价值理念。脚踏大地，仰望天空，是人类探索自然宇宙的姿态。面

对遥远神秘的星空，古人通过各种想象来猜测上天的喜怒哀乐、预测人间的凶吉祸福。“在天成象，在地成形”(陆世仪《分野说》，收入《陆桴亭先生遗书》)，天地之间是贯通相连的。古人把星空分为三垣二十八宿，三垣指紫微垣、太微垣、天市垣，二十八宿可分为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组。在古代的天文分野体系中，扬州(相当于今江苏、浙江、福建、江西、安徽一带)为北方玄武象之斗宿的分野，即把扬州境内凶吉祸福与天上的斗宿联系起来。今江都邵伯的斗野亭始建于北宋时期，因苏东坡、秦观诸人把酒论诗而名声大噪，其得名便源于斗宿。紫微垣是天帝居住的地方，北斗七星(属于今大熊座)是紫微垣的星宿，是天帝的车舆，也就是专驾。由此，便可理解甘泉山在古人心目中的分量，而甘泉山一带的诸多人文遗址和种种历史传说也就有据可循、有源可溯了。

再说方位。甘泉山位于广陵城郭的西北，这与西汉甘泉宫位于长安城的西北，其方位是一样的。甘泉宫是汉武帝修筑的避暑夏宫，规模宏大，建筑辉煌，位于长安城西北处100公里的甘泉山脚下，西汉辞赋大家王褒《甘泉宫颂》开头便是“甘泉山，天下显敞之名处也”(《全汉文》卷四二)。汉代国势强盛，威震四方，广陵国盐铁丰富，国用富足，作为汉家子民、刘姓宗室，东汉广陵思王刘荆等诸多皇家宗室把身后葬地选择在甘泉山一带，也算是遥望长安的一种寄托吧。1975年在甘泉山东北1.5公里的西侧土山发现了一座东汉墓，编为甘泉一号墓；1980年又在东侧土山发现了甘泉二号墓，并出土了轰动一时的“广陵王玺”。这枚王玺与日本发现的“汉委奴国王”金印授予时间前后仅相差一年(“汉委奴国王”为57年，“广陵王玺”为58年)，很可能出自同一工匠之手。如此，便更能理解扬州甘泉山一带为什么会有这么多汉墓了。

再说地脉。甘泉山上有座寺院，叫甘泉山寺，也称慧照寺，始建于唐开成二年(837)，到南宋淳熙四年(1177)进行了重建，寺西有口古井，通泉眼，“其水甘香，大旱不竭”(《光绪增修甘泉县志》卷九)，即甘泉。这座甘泉山寺，与市区的石塔寺还有渊源。《光绪增修甘泉县志》卷九“甘泉山寺”条引明代“万历县志”说，石塔



寺原名慧照寺，唐开成三年(838)建造石塔庵藏古佛舍利，就把寺名改为“石塔寺”，寺僧觉得废弃旧寺名太可惜，便建议把“慧照寺”额匾移到甘泉山新建一座寺院，即新“慧照寺”，亦称甘泉山寺，所以，甘泉山寺是石塔寺的分支。此外，《扬州画舫录》卷三还记载，广储门外的梅花书院(今梅岭小学一带)，其前身可追溯到明朝尚书湛若水于嘉靖年间(1522~1566)创建的若水书院。湛若水，字甘泉，广东增城市人，嘉靖年间来扬讲学，在城东一里处创办讲道所，取名“行窝”。为什么选择城东一里的今梅岭小学一带，古人认为此处“承甘泉山之脉”。由于湛若水之字与山名相同，所以其门人吕柟就在门额上书写“甘泉”二字，即甘泉书院。由此可见，甘泉山虽然在郊外，但其地底之脉络延伸到了城区，古人对自然山川的认识于此可见一斑。

甘泉山上还有一座灵雨台，是乾隆七年(1742)甘泉知县张宏运修筑，他还专门撰写了一篇文笔颇佳的小品文《灵雨台记》。大意是说，张氏任甘泉知县的第二年，到乡下检查农业生产工作，路过甘泉山，发现这里风景绝好、民风淳朴，就兴致盎然地登山揽胜，“盈视骇瞩，徘徊不能去”。陪同的父老就告诉他甘泉山7峰、28圆冈、泉水甘美、广陵厉王“致雷雨”等故事。张氏对“致雷雨”之说感到怀疑，可是“然兹山之巍然特出，视封内诸山若培塿”，也就“信如斯言”了，“益以征山灵之不爽”。张氏到最高峰寻求广陵厉王塚，没找到，在山顶上望见爱敬陂成为良田，便感慨到三国曹魏广陵太守陈登修筑爱敬陂的功绩。张氏写到这里，笔锋一转，讲述当朝风调雨顺，“河防水利讲求备至”，甚于当年祈雨百倍。话虽如此，可台还要继续修筑的。“然兹山之灵异，若彼固大有造于吾民者，使不有以表彰而兴起之，亦守土者之阙也。”即筑台是顺应风俗、遵从民意。于是，就在最高峰修筑灵雨台，取《诗经》“灵雨既零”之意。最后，张氏点出了文眼“夫有一邑之人物，必有一邑之山川，是皆能表灵异、兴云雨，以为一方之利赖者，则斯台也”(《光绪增修甘泉县志》卷九)。如今，灵雨台早已不存，湮没在历史中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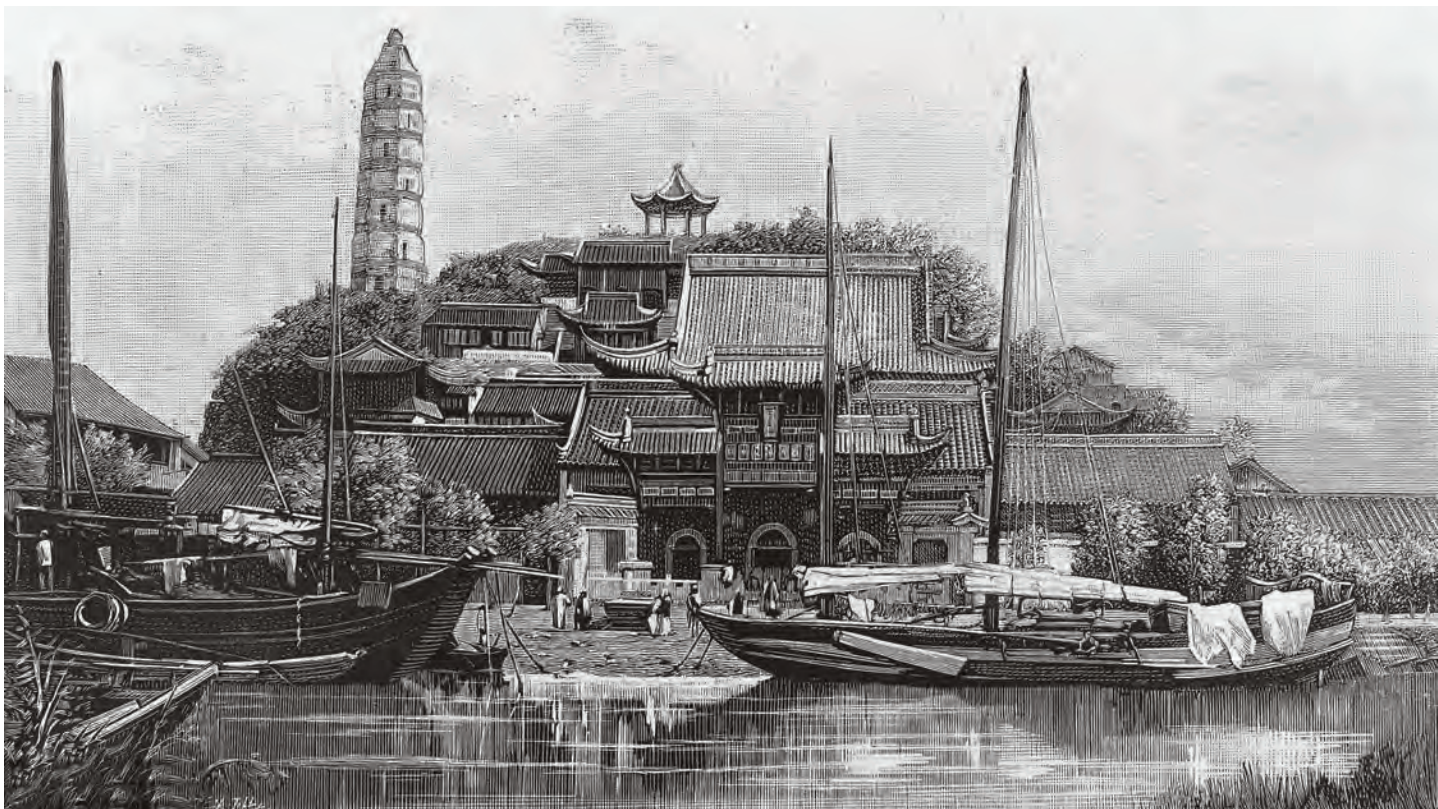
二、甘泉县

甘泉山的影响，到清代达到了巅峰，其标志性的事件就是甘泉县的设置。甘泉县设于清雍正九年(1731)五月，废于民国元年(1912)一月，存在了182年。这么长的时间，影响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也使得“甘泉”二字深入人心。雍正九年五月，两江总督尹继善上疏

说，扬州府江都县“路当冲要，事务殷繁，附居府城，幅员辽阔，应增设一(县)，令分疆而治，于地方甚有裨益”(《增修甘泉县志》卷一)。任何行政区划的调整，都是有着现实直接的社会经济利益。清代雍正时期，扬州因盐运而鼎盛，“路当冲要，事务殷繁”指大运河上盐运、漕运等繁忙景象，江都成为盐运中心；“附居府城，幅员辽阔”指今小秦淮河以东的“新城”逐步完备，大量盐商巨富卜居于此。最终，雍正皇帝同意把江都县的西北划出来设置甘泉县，县治与江都县同附郭，即江都县、甘泉县的县衙都寄住扬州府城内。甘泉县衙位于今广陵区甘泉路194号，其门厅目前保存较好，而今甘泉路也因县衙而得名。乾隆时期扬州知府高士铨在为《甘泉县志》作序时写道：“境有甘泉山，巍然特起，象应天枢，说者谓为地脉所钟灵，因并请名其县曰甘泉。”(《增修甘泉县志》保留的《甘泉县原志序》)作为扬州地区的最高行政长官，在最重要的场合写出这句话，道出了甘泉山的重要地位，应当是最权威、最准确的“定论”了。

甘泉县废置的过程也很有意思，其原因简单地说就是省钱。晚清时期，各种思潮纷纷涌入，清政府也在被动地进行改革。宣统二年(1910)，诏令各省筹设审判厅，经费自筹。当时财政捉襟见肘，十分困难。两江总督张人骏、江苏巡抚程德全就想了个办法，建议裁并同郭的州、县，把节省下来的行政经费充审判厅之用，最后决定还是把扬州府的甘泉县并入江都县。这年12月24日，皇帝批准了。宣统三年二月，张人骏发函要求扬州知府嵩岫办理。可是到了10月，武昌起义爆发，不久清朝灭亡，废置甘泉县尚未来得及实施，最终是到了民国元年(1912)1月才把甘泉县并入江都县。由甘泉县之设立、废置，可以反映扬州城市的兴衰起伏。民国以来，又先后建立了甘泉乡、甘泉公社、甘泉镇等，直到现今的甘泉街道，体现了甘泉山文化凝聚深厚、坚韧传承的力量。

无论是高士铨说的“境有甘泉山，巍然特起，象应天枢，说者谓为地脉所钟灵”，还是张宏运说的“夫有一邑之人物，必有一邑之山川”，都反映了这样的事实，即在江淮一马平川的平原地带，偶有突出的山丘往往会为古人所关注，并形而上与天象、地脉联系起来，成为上天入地的联系点，同时也会形而下的影响到自然实体、行政区划等的得名，进而影响到社会人文的方方面面。这些层层累积、蔚为大观的文化意蕴，无一不反映了古人对自然的敬畏、对天人合一的推崇、对人文的尊敬。妙哉，甘泉！



镇江的山水人文精神

◎ 邹晓华

山水是自然景观，在中国的文化传统里，山水是承载了更多精神内涵的载体。“仁者乐山，智者乐水”，“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都是把山水比拟成和自己心灵相通的有思想有灵性的存在。所谓一方水土一方人，山水风物最能涵养人的品格和精神，山水既是自然资源，也是濡养当地人的精神源泉。

镇江市地处长江南岸，大运河穿城而过，市内河道众多，山头林立，地理位置独特，是一个襟山带水的城市。丰富的山水资源，造就了镇江的古往今昔；山水的特有风姿，孕育了镇江的地灵人杰。居住于镇江或旅经镇江的达官贵人或平民百姓对着这无限江山，或抒发怀抱，或壮怀激烈，或寄情山水，或结庐著书，既体现着热爱山水、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出世理念，又有积极入世、关注民生的儒家理想和精神。“积土成山，风雨兴焉；积水成渊，蛟龙生焉。”三千年来，优美的山川风貌哺育和影响了一代代优秀的镇江儿女，留下了丰富的文化宝藏，蕴含着深厚的人文精神。这些精神源于斯长于斯，长期以来构成了镇江人文精神的主体，给后世以激励和鼓舞。

一、崇爱尚美精神

镇江北临长江，金山焦山北固山连江而立，南有南山国家级森林公园，运河穿城而过，烟柳画桥，云树堤沙，人家参差十万，风景美不胜收。“城市山林，大江风貌”，涵养了当地人对美和爱的追求。“客路青山外，行舟绿水前。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是唐初王湾的《次北固山下》中的美景；“何处望神州，满眼风光北固楼”是登高远望的豪迈；“山中何所有，岭上多白云，只可自愉悦，不堪持赠君”是陶翁物我两忘的境界。这样的山水孕育的人民必然对审美有着更高的品味和追求。正如宋人汪藻所言：“京口以江山名天下，其来尚矣……观其千嶂所环，中横巨浸，风涛日夜驾百川而东之。其形势之雄，实足以控制南北，岂直为骚人羁客区区登览之胜哉！”（汪藻《浮溪集》，清武英殿聚珍堂从书本，卷十八）

镇江山水风景如画，有“京江二十四景”和“镇江新二十四景”之说，由此也产生了许多画家。

二、崇文尚武精神

曹丕《典论论文》里说：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刘勰《文心雕龙》里也说道：“山川焕绮以铺理地之形，观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林籁结响，调如箏瑟；泉石激韵，和若球铎。故形立则章成矣，声发则文生矣。”镇江山水绝佳，催生了大量不朽的优美文学作品，是镇江人最为看重和乐道的。镇江的骨子里从始至终流淌着的是文学的基因、文化的积淀。

镇江民间流传的《华山畿》，被认为是《梁山伯与祝英台》故事的原型，作于南朝时候。《古今乐录》曰：“《华山畿》者，少帝时，南徐一士子，从华山畿往云阳，见客舍女子，悦之无因，遂感心疾而死。及葬，车载从华山东度，比至女门，牛不肯前。女出而歌曰：‘华山畿，君既为侬死，独活为谁施？欢若见怜时，棺木为侬开。’棺应声开，女遂入棺，乃合葬焉，号‘神女冢’。自此有《华山畿》之曲。”镇江人歌颂这至死不渝的纯真爱情，诗句流传很广。而诗中所说的华山，就是镇江之华山，现属新区。朝鲜籍诗人金宗直有《过华山畿》云：“冢上青青连理枝，行人争唱华山畿。野棠花发当寒食，几度春魂化蝶飞。”这首诗既可以看作镇江人传唱《华山畿》不衰之明证，也可以看作梁祝故事蓝本在本地之流传。

隋唐时候，漕运移于京口，南来北往，皆以京口通津。过往的文人墨客，到了镇江，被镇江的山水吸引，也

无不引吭高歌。李白一出手就是名句，清新如画，气势磅礴。“丹阳北固是吴关，画出楼台云水间。千岩烽火连沧海，两岸旌旗绕碧山。”北固山，与金山、焦山遥遥相望，互成犄角之势，虽然高仅五十余米，却横枕大江、石壁嵯峨，形势险要，风景秀丽，被梁武帝誉为“天下第一江山”。“一处多景楼，几多登临意。”这些璀璨的文学作品，似镇江山水的文化瑰宝，熠熠生辉，光耀千古。

北宋初年，江南繁富，许多达官贵人，文化巨匠都来此宴集行吟。尤要提及的是苏轼，他曾11次到镇江，留下的诗篇百余首。苏轼36岁作的《游金山寺》：“我家江水初发源，宦游直送江入海。闻道潮头一丈高，天寒尚有沙痕在……中泠南畔石盘陀，古来出没随涛波……试登绝顶望乡国，江南江北青山多……我谢江神岂得已，有田不归如江水。”写的是金山寺的夜景，抒发的是仕途的不得志，两者结合得甚是巧妙紧密，宦海的涛波随着金山寺周遭江水的波涛翻滚，长江上闪耀的粼粼波光映衬着诗人宦海浮沉的身不由己——读者仿佛身临其境——是有此山水，此才情，方有此佳作。同时，诗中也写明了镇江与长江和峨眉一水相连的同源关系，“江声犹带蜀，山色欲吞吴”，使人生发遐想，意境雄远。

此后，南宋与金、蒙对峙，京口成为军事要地，陆游、辛弃疾、陈亮、文天祥等，皆为一时英杰。他们登高望远，写下了不朽之作。而辛弃疾写在镇江的壮志难酬之词，也长令镇江人痛歌悲吟。

元明清时期，吟咏镇江的作品在题材、体裁和意境上都有进一步的扩展，可谓不胜枚举。

镇江市除了散篇单作数量众多、质量上乘外，在文学上还有许多个第一：产生了中国第一部文学理论巨著《文心雕龙》，第一部诗文总集《昭明文选》，第一部艳歌总集《玉台新咏》，第一部文言志人小说集《世说新语》（上卷4门即专辟“文学”一门，与“政事”同重，说明镇江古来重视文学之风），第一部以“字典”命名的字书《康熙字典》，第一部体系完整的汉语语法书《马氏文通》，第一部完整的文化通史《中国文化史》，第一部揭露“清官”之酷恶的小说《老残游记》等，这些成就，全部涌现在一个城市，不能不谓之奇迹。

那么，为什么镇江的文学如此兴盛呢？有人认为，这主要得益于镇江独特的地理位置，在长江和古运河的十字交汇处，古代运输方式主要是坐船，古人行至镇江，一般都会在此休整停留，少不得观赏镇江的大江风貌和山川美景，这样，一篇篇吟咏镇江的名篇佳作就出炉了。另外，不同阶层、不同地区的人员多汇聚于此，思想的碰撞和交融也是一个原因。



2015年,世界华语诗歌朗诵大会在镇江举行,来自世界各地的华语诗词文学爱好者来到这里一起激情吟诵。也是2015年,镇江籍著名作家、清华大学教授格非的《江南三部曲》获得第九届茅盾文学奖——这是他继获得老舍文学奖、鲁迅文学奖后,再次在文学创作领域获得殊荣。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但江山代有才人出,历史淘不尽的,是镇江人千古而下的文学精神。

文能定国,武能安邦。镇江地处运河与长江交汇处,又是吴越文化的发祥地之一——以前人们一直认为吴国中心区域在无锡苏州地区,但是20世纪50年代至今,一系列重大考古发现打破了这种看法——大港烟墩山宜侯矢簋的发现,包括对大港母子墩、磨盘墩、青龙山、北山顶、烟墩山、谏壁粮山、王家山、丹阳葛城遗址连同珥城、神墩遗址等的发掘和研究,得出的主要结论是:葛城遗址是吴国王城,镇江曾是吴文化的中心。吴文化之尚武精神由来已久。吴钩是有名的利器,镇江出土的铸铭文的剑、戈、矛均有不少,史载多位吴王和吴太子都喜欢兵器。三让王位的贤者季札挂剑的故事,也可以作为吴人尚武的例证。而季子的家乡镇江丹阳,就有季子庙,受后人供奉。镇江人受吴文化的影响,崇尚习武健身,保家卫国。两晋之际的祖逖闻鸡起舞,中流击楫,誓主北伐;刘裕建立北府军,曾经打过长江和黄河,收复长安。千年古刹金山寺,也有僧众参禅练功的传统,并流传着一套佛家拳——“洗心拳”。洗心拳是镇江地方历史文化积淀的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现在洗心拳整套被完整地摄制下来,并写有拳谱,交由市档案馆永久收藏。而今,镇江籍武术名家依然辈出,武术九段、八段、七段弟子在镇江市的武术事业中仍然贡献着力量,武术传承方兴未艾。

三、英勇顽强的爱国精神

长江之滨的北固山是长江在镇江的制高点,“一水横陈,连岗三面,做出争雄势。”面对如此江山,镇江人长期以来养成了坚强的民族气节和英勇的战斗精神,千百年来上演了许多可歌可泣的爱国英雄故事。

宋金之战

靖康之耻后,陷落地人民纷纷起义。宗泽临危受命,准备渡河北伐。但高宗意昏,奸臣当道,英雄壮志未酬,忧病而死,死前痛恨叹曰: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更连呼三声“过河!”溘然而逝!其子颖和爱将岳飞扶柩到京口,与夫人合葬。现在宗泽墓在镇江市东郊京岷山北麓。南宋嘉定年间,岳飞之孙岳珂以总

饷驻节镇江军府,重修功德院,并亲撰《重修忠简公功德院记》。英雄的事迹代代流传,永世莫忘,如今,宗泽墓旁有宗泽路,是后世为纪念英雄所修筑。

韩世忠、梁红玉大败金兵于镇江黄天荡的故事,更是家喻户晓。南宋的杨万里曾作为金国使者的接待使在镇江奉行接待任务,他看到风景如画的金山上,南宋朝廷竟专门修建了招待金使烹茶的场所,非常愤慨,写下了《雪霁晓登金山》:“焦山东,金山西,金山排霄南斗齐。天将三江五湖水,并作一江字扬子。来从九天上,泻入九地底。遇岳岳立摧,逢石石立碎。乾坤气力聚此江,一波打来谁敢当。金山一何强,上流独立江中央。一尘不随海风舞,一砾不随海潮去。四旁无蒂下无根,浮空跃出江心住。金宫银阙起峰头,槌鼓撞钟闻九州。诗人蹈雪来清游,天风吹依上琼楼。不为浮玉饮玉舟,大江端的替人羞!金山端的替人愁!”诗描写了金山的重要位置,渲染了金山的非凡气势——那种大江东去的排山倒海之势、金山顽强屹立江心不屈不挠的豪情壮志——这都是抗金力量的写照!“金宫银阙起峰头,槌鼓撞钟闻九州”也是斗争力量的暗流涌动和全国一呼百应的抗金热情——这样壮丽的山河,这无限江山蕴含的北伐力量,统治者均视而不见!眼见得侵略者趾高气扬,南宋朝廷怎么对得起这样的山河呢?!是大江和金山都在为卖国的朝廷感到羞愧、替这个耻辱的政权感到愁闷啊!“如此湖山,忍教人更说!”文学即是人学,诗人抒发的正是老百姓的心声,这些作品甚至比赞美祖国河山的作品更有力量,风格也与杨万里的“诚斋体”迥异,感情奔放而激愤,愤怒和无奈尽倾笔端,似大江大河奔涌而下,充满着强烈的爱国精神,与辛弃疾的北固山怀古词有异曲同工之妙。类似风格的文学作品,镇江地区多有流传。

鸦片战争

1842年7月,鸦片战争中的镇江之役,是令无数人为之动容的。英军在进攻镇江的途中,遭到了坚决抵抗。清军副都统海龄部守军全部壮烈牺牲,海龄全家殉国。所以恩格斯说,如果这些侵略者到处都遭到同样的抵抗,他们绝到不了南京。

“何处望神州,满眼风光北固楼。”这几乎已成为镇江市的精神标签。“沐风栉雨,薪火相传”,传唱的是不屈的爱国情怀。这些诗词和故事能够在镇江流传至今,本身就是一种取舍,是镇江人肯定、歌颂并践行爱国主义和民族气节的表现。长期以来,爱国主义精神已经与镇江人民血肉相融。他们推崇英雄,敬仰英雄,誓死保卫着这片热土。



四、寄情山水的隐逸精神

“何必丝与竹，山水有清音。”镇江南山的清朗幽静、黄鹂婉转的鸟鸣、泉水叮咚的脆响吸引了大批的文人雅士。在中国的文化体系中，向来有一种隐逸传统。戴颙来到镇江，发现南山之上，山北有竹林，林后有清幽的山涧，就留了下来，他经常坐在南山里，饮酒品茶，倾听黄鹂鸣叫，创作乐曲。现有“听鹧山房”景点，为了纪念戴颙而建。戴颙在南山生活到64岁去世，唯一留在身边的女儿削发出家，把家里的房子捐做了一座寺庙，这就是今天的招隐寺。梁朝刘勰在南山编著《文心雕龙》，萧太子统于此读书、编纂《文选》，南山至今尚存“文心阁”“太子读书台”等景点。

小隐隐于野，大隐隐于市。镇江的城市和山林均宜隐居。米芾隐居南山众所周知，大约同时期沈括隐居梦溪园，科学家苏颂等人当时也隐居此地。米芾的好朋友苏东坡也想隐居镇江，他看中的是蒜山顶上的松林和空地，还写诗给蒜山的管理者金山寺长老佛印和尚曰：“问我此生何所归，笑指浮休百年宅。蒜山幸有闲田地，招此无家一房客。”只可惜官身不由己，不久他又被贬到惠州去了。“东坡到处有西湖，可恨无缘归镇江。”

唐代许浑，晚年居住在了丁卯桥，写诗闲游度日，追寻旷逸闲适、逃避社会的思想在他诗中显得更突出。后人所谓“许浑千首湿”，正是指他诗中多用“水”“雨”等字眼，如“荣枯尽寄浮云外，哀乐犹惊逝水前”，这些自

然是受到了镇江山水的浸润。丹阳的二皇甫，长期过着闲云野鹤的生活。郑板桥曾隐居于焦山，其他居住镇江屡诏不仕的代有人出。

结论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人育一方情。镇江山水资源丰富，孕育了镇江人民，形成了特有的精神和品格。加之镇江交通发达，历代南来北往的文人墨客留下了大量摹写镇江山水的文艺作品，这些作品长期以来濡染着镇江人，成为镇江山水人文精神的重要来源。镇江濒临天险长江，又历为兵家必争之地，上演了许多保家卫国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有许多爱国主义的鲜活范例，也是许多别的城市不具备的。镇江的人口组成较为复杂，历史上汉民族有几次大的南迁，也为镇江带来了先进的思想文化和技术，不断产生出新的更优秀的思想和文化，南北交融，人文荟萃，提升了城市品位。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山水风貌，成就了镇江的山水人文精神和思想传统，镇江的山水人文精神包涵了崇爱尚美精神，崇文尚武精神，英勇顽强的爱国精神，寄情山水的隐逸精神等。镇江人生于这片山川上，沐浴了南朝的风，唐时的雨，宋元的悲歌和明清的低吟，经历了各种战火磨难，依然以昂扬的姿态迎接新时代的旭日熏风。他们世代以来形成的独特的精神标签，美好的精神风貌和气质，在新世纪的历史长河里，必如繁星点点，代代相传。





鸺山，桃源深处的守望

◎ 丁东

实际上，对鸺山的好奇，始于“鸺”字，一个生僻的汉字，饱含沧桑，从远古走来。

鸺山，位于江苏张家港凤凰镇西南，与凤凰山呼应，有所谓“前凤后鸺”之说。在鸺山东麓、西南隅，隐约能看到山坡状的地貌。走近瞧，整个山体变成了一个宽阔、深邃的宕口。每逢春夏之交，多雨时节，这里形成百丈深渊，仿佛是个“天池”。“曾经的鸺山，青山如黛。”老人们回忆。确实，昔日青山，如今已不能称其为山，远眺似土墩一个，只能算一座残山。何以至此？民间称：“鸺山石，不打自己着。”《虞乡志略》云：“鸺山采石，赤黄色，可发火。”也就是所谓的打火石了。不啻是打火石，山上有一种呈赤红色的石头，如鸡血般鲜艳，比较罕见，那时，村民不识宝物，后来才知道这是稀世珍贵的宝石——鸡血石。正是这宝贵的鸺山石，屡遭开采，经久不断，导致了现今鸺山的形态。虽然，如今的鸺山并不高耸入云，但留存有几处陡崖峭壁，些许巨石悬卧其间。入口处废弃的挖车，似乎诉说着曾经的不幸。

鸺山，以这样的姿态呈现，蒙着面目，他呼吸的声音，我们听得见。

轻叩历史的弦音，“山麓苍松千章，修竹万竿”，“为凤凰瑞鸟之护卫也”，原来“鸺山”竟是这么生动。“关雎鸠，在河之洲”，地老天荒，比之更远。“杭唷，斫竹，唷哟嗨！杭唷，削竹，唷哟嗨！杭唷，弹石，飞土，唷哟嗨！杭唷，逐肉，唷哟嗨！”先民的山歌声从远古传来，你可以想像，山明水秀的村野、平缓的小丘，到处毛茸茸的绿着。明净的水，环绕小丘，悠悠流淌，因风皱成涟漪。水里映着天上的云，白色的、彩色的，缓缓移动。一群农人，正合力拉着砍倒的树木，或合力拉着鱼网……这时，有谁起头，大家伙唱起来，由低渐高，歌声激越，愈发昂扬雄壮。“杭唷唷唷”，终成一种经典的节奏和衬

辞，憾动着山，憾动着云中的水、水中的云，于是这里不再寂寞，有了飞扬的美，回环的美，社会历史的美……这一切，是最古朴的诗、最生动的画。

关于鸺山，不得不提的是那棵至今已有1400多年的红豆树。《沙洲县志》记载，在凤凰乡徐市镇邓家宕，长着一棵红豆树，树高6米多，树围1.41米，相传为梁代(510年左右)昭明太子手植于鸺山，后明代御史徐恪移栽今处。如今，红豆树被精心呵护，另发新枝。周围建有红豆社区。相传红豆能避邪，小孩常戴在手腕上。“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红豆又有男女寄托相思之意。也就是这棵红豆树，见证了昭明太子一段凄美的爱情故事。梁武帝天监年间，萧统被立为太子，为承大业，父王责其在顾山香山寺读书。一年四月清明，太子逛庙会，邂逅一女子，见其褙纤得衷，修短合度，神情超凡，举止脱俗，顿时心生爱意。第二天，太子经打听得知，该女子是严塘边上万寿庵的妙云尼姑，万寿庵距鸺山法轮寺里许，太子借往法轮寺上香的机会，暗会妙云。交谈之中，太子得知妙云自小得到师太教诲，通音律，懂诗文，是位才女。太子庆幸自己遇到了知音。以后频频相见，相知愈深，倾慕之情日炽。数月之后，太子索性将读书之所移至鸺山法轮寺。此事传到了梁武帝耳中，便敕令太子离开鸺山法轮寺，前往虞山石梅苍圣寺读书。临别，太子与妙云共植红豆树，指树为媒，永结同心。后太子被软禁于苍圣寺。妙云相思成疾，不久撒手人寰。待太子寻机前来探望，不见昔日红颜，但见红豆树旁一座新坟。一对恋人，阴阳相隔。太子长跪坟前，泪如雨下。从此，郁郁寡欢，年不满三十，也随妙云而去。鸺山百姓因此称红豆树为“相思树”。此后千年，红豆树很少开花，难得结果，但凡开花结果，满树白色花朵绽放枝头，花形似鸡心，果实呈鲜

红色。最近一次开花是在2001年5月6日。故事感天地，让人唏嘘不已。没人认为这是传说，因有红豆树，更有法轮寺为证。

鸢山南麓山坳里，是法轮寺遗址，该寺毁于20世纪50年代，现仅存1株银杏树。据《重修常昭合志》卷十一《祠祀志·寺观》称：“梁天监间僧宗印建。”即法轮寺是在梁代天监年间(502~519)，由宗印和尚所建。法轮寺为一方名刹，曾有中峰寺、广福禅院、赵庄庵三座寺庙为其名下别院。其建造时间当略早于永庆寺和永昌寺，是南北朝时期港城境内建造时间最早的庙宇。历经兵燹，至元末明初，法轮寺仅剩断垣残壁。明洪武五年(1372)，由寺庙住持胜行和尚重新建造。永乐二年(1404)，智昶和尚增建地藏殿、法堂及山门。到了清康熙年间，屋舍再次破损不堪，又有德全和尚主持大修，但因修复工程既耗时又耗资，德全和尚竟未能完成修葺大业而西归。旧志法轮寺沿革记述甚简，文人墨客却留下了不少游览鸢山和寺院的诗文。定居于凤凰程墩的明代兵部郎中山东按察副使杨仪(1488~1558)，在炎夏六月夜游鸢山，撰《游鸢山记》。文中描写法轮寺四周“苍松千障，修竹万竿，寺后百步皆丛箴灌木，夹道如堵。忽有大石如削，负土而出，岩之上又有磐石覆之，势将倾堕，景甚奇也”(《海虞文徵》卷十一《记三·山水》)。明代廉吏徐恪的《游鸢山用壁间韵》七律诗云：“香刹深藏紫翠坳，岩亭长见薜萝交。繡经叶上虫书字，挂衲枝头鸟寄巢。谁似金山留赐带，先参玉版向齐庖。日斜茶臼林间响，疑是松门过客敲。”吏部尚书吴一鹏(苏州山塘街玉涵堂主人)步徐恪诗韵撰《鸢山寺》和曰：“台阁参差枕涧坳，长松落落晚阴交。鹿衔细草奔平野，鸟带残阳认旧巢。骚客漫题留石壁，老僧清供出齐庖。五更侧耳西风里，听到寒钟第几敲。”诗人龚复澄再和徐恪诗云：“谁将兰若补山坳，四壁松萝紫翠交。廿载旧游僧结社，半空清响鹤归巢。华岩听讲来方丈，茗碗分香过客庖。犹记月明清夜永，悚钟隐隐隔林敲。”此诗不仅写景，还追忆了诗人与寺僧结友廿载、共品香茗，在月白风清之夜听钟赏景的难忘印象。

据当地居民所述，每逢初一、十五是鸢山法轮寺最热闹的时候，周边居民都会来法轮寺敬香。农历三月二十二日是法轮寺庙会。这一天，十里八乡的乡亲们会来此朝拜祭祀。寺庙内外，热闹非凡。姑娘们打着花阳伞，小伙子戴着草帽，在人群中窥视中意的人；小孩们相互追逐、打闹嬉戏。阵阵欢笑声与木鱼声、锣鼓声、叫卖声交织，三里外的村庄都能耳闻。而今，法轮寺荡然无存，断了香火，仅存诗文，空留遐想。但几十年过去

了，乡亲们心中的信念似乎没有断，自发捐资兴建了新的庙宇。正门前，幸存下来的那棵古银杏树，矗立原地，虬枝繁茂，昂首苍穹。红豆树、法轮寺，躺在相思的怀里，见证着鸢山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变迁。

留待他年说梦痕。比红豆树、法轮寺更有名、更显赫的当属水蜜桃。眼下，行走鸢山脚下的村落，田野、路边、宅旁，随处可见的是个子不高、树型蓬松的桃树。新中国建立初期，原鸢山村和珠村从无锡引进少量水蜜桃品种，作为庭院经济的主打产品加以推广。一方水土一方桃，土净、水清、气候适宜，让引进的水蜜桃一踏上鸢山土地就变得水灵无比，个大、皮薄、汁多、味甜、果皮易剥，凡尝过的，没有不说好的。20世纪90年代，伴随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凤凰水蜜桃在鸢山兴旺开来，家家种桃，由原来的几十亩变成现在的近万亩。花开时节，粉红的桃花，汇成花海，绵延十里，一望无垠，游客络绎不绝。凤凰水蜜桃远销苏州、南京、上海等地。如今，桃树成了凤凰人的“摇钱树”，也成了全国地理标志。

抹开岁月的风尘，鸢山走过前世，迎来今生。今年开始实施的中新集团“鸢山桃花源”项目，一个美丽的田园综合体，正从掌上飞出。该项目依据山体特殊的宕口地貌特征，依残而建，变残为美，紧扣“源”“奇”两字，定位为“以桃源文化为底蕴营造的奇智旅居，以生态山水为骨架搭建的田园城镇，以多元主体为特色构筑的精品庄园”。其核心区鸢山绿谷，分“谷内”和“谷外”两大片区。谷内打造生态核心，以“奇”制胜，形成悬崖天街、缤纷花坡、悬崖酒店、观景绿岛、生态梯田等五大元素，建构陡壁揽胜、新奇体验的峡谷奇观；谷外依托田园本底，以“源”造景，形成桃源、水源、绿野三个单元，营造麦田飘香、桃园如画的生活气息。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不出两年，你会看到，凤凰鸢山双山对峙，古街、桃园交相辉映，湖水、温泉曼妙静心，一河中流，步道伸展，田园似锦，水脉交织，粉墙黛瓦……缘溪踱步蜿蜒小径，忘路之远近。忽逢桃树林，夹岸数千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复前行，欲穷其林，直达桃源谷……这里有清静的气氛、观景的绿岛、缤纷的花坡、古老的水碾、原始的作坊、淳朴的民风。幽谷林间，良舍美池，桑竹田野，鸡鸣狗吠，让人仿佛穿越到了2000多年前的世外桃源。在这里，每个人都可以望得见山，看得见水，勾起无限乡愁。

“鸢山画图开，凤凰今涅槃。何以报君恩？桃花作嫁妆。”浴火重生的鸢山，以其特有的打开方式，续写着港城新桃花源记。





魚事江南說蘇州

◎ 沈建東

春秋吴国鱼的故事

在苏州地区，不但野生鱼虾丰富，筑池养鱼的历史也十分悠久。传说范蠡曾著《陶朱公养鱼经》，尽管此书可能是汉代人伪托，但至少是江南人养鱼经验的总结，说明春秋战国时候，江南鱼类的消费量很大，同时也为了取用方便，不然就不用人工养殖了。当时还有养鱼的池和城，唐陆广微《吴地记》载：“胥门……门南三里有储城，越王贮粮处。十五里有鱼城，越王养鱼处。”又云：“鱼城在吴县西南二十五里横山下越来溪，吴王养鱼处。”南宋周必大《吴郡诸山录》叙述游览寻找石湖古迹的时候，也说：“又里许，复登舟，观吴王鱼城，城在田间。”明杨循吉《穹窿山志》载：“《越绝书》云：古赤松子尝于此采赤石脂处也。《神仙传》云：赤松子，秦穆公鱼吏也，食桂实、石脂，绝粒后上吴山升仙去。”赤松子，在秦国曾经做过秦穆公鱼吏，专门管理养鱼，可见当时养鱼的规模了。汉赵晔《吴越春秋》记载，公子光知吴王好“炙鱼”，派勇士专诸专门去太湖学习了三个月如何做“炙鱼”。所谓炙鱼，类似现在的烤鱼，在古代煮好的肉或烤好的鱼，再放在铜锅里煎。所谓煎，在孙机《古代物

质文化》一书中考证说：“《说文·酉部》段玉裁注：‘酱，醢也。’也就是说煮好的白肉要再放进热的酱汁中濡染加味，即所谓的‘煎’，之后方才进食，濡肉时蘸调味品的用具叫染器，是由一个染杯和一个染炉组成的，讲究的是在染炉底下还加一个接炭火灰烬的承盘。”在湖北出土的曾侯乙墓里曾有一件战国时期的铜炊具，上下两层，下层放炭火，上层放鱼煎，出土的时候，上层还有完整的鱼骨架在锅里，极有可能就是孙机先生说的铜染器和濡染的鱼，类似实物在考古时候也有出土，在中国国家博物馆还收藏有“清河食官”铜染器。

春秋战国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独特的时代，也是激情与刀光交汇的时代，历尽千辛万苦来到吴国的伍子胥与公子光用炙鱼为媒，导演了一出宫廷政变。光与僚用今天的话来说是堂兄弟，按照兄终弟及制度，光的父亲曾经把王位传给了僚的父亲，但僚的父亲没有依照礼制传给光，而是传给了自己的儿子，所以光与伍子胥商量，阴谋夺取本该属于自己的王位，伍子胥招募死士专诸在炙好的鱼内放置鱼肠剑，然后端着炙鱼盘进献给大王僚。来到僚面前，专诸趁僚看炙鱼的时候，迅速拔出鱼肚里的匕首，把匕首托在自己胸前，以全身力量抵近匕



首以刺僚，刀刃贯通僚的铠甲穿达后背。僚因好吃炙鱼而被刺死，公子光登上王位，这个公子光就是阖闾。据后人考证说，苏州的名菜——松鼠鳊鱼，大抵滥觞于炙鱼，而专诸去太湖学习炙鱼的师傅是太和公，说他是春秋末年吴国名厨，精通以水产为原料的菜肴，尤以炙鱼而闻名天下，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十大厨师之一，当然这是现在人收罗古籍，摘出历代有记载的名厨，排列座次的结果。



复原吴国宫廷鱼腹藏剑 沙佩智供图

春秋战国时候，主要的鱼馐除了

炙鱼，还有鱼羹、蒸鱼等，鱼既为美味之珍，又是身份等级的象征。吴国宫廷里因为吃鱼还酿出过人命呢，汉赵晔《吴越春秋·阖闾内传》云：“吴王有女滕玉，因谋伐楚，与夫人及女会蒸鱼，王前尝半而与女。女怒曰：‘王食鱼辱我，不愿久生。’乃自杀。阖闾痛之，葬于国西阖闾门外。”现在人可能不能理解滕玉举动，春秋时候实行的是分食制，一人一份，吴王因为喜爱女儿，把自己吃了一半的鱼留下给女儿，想让女儿多吃点，这充满父爱的举动却不合礼制，无意中断送了女儿的性命。

在古代吴国，犒赏军队和作战有功之臣也喜欢用鱼。据《吴越春秋》记载：“子胥归吴，吴王闻三师将至，治鱼为脍。将到之日，过时不至，鱼臭。须臾，子胥至，阖闾出脍而食，不知其臭。王复重为之，其味如故。吴人作脍者，自阖闾之造也。”可见中国自古有食脍即生鱼片的习俗，最早可以远溯至先秦，唐宋时期尤为盛行，到了明清时代便在中国逐渐衰微。古代对脍的记载很多，如“金齏玉脍”“海鲙干脍”（隋《大业拾遗记》）、“缕子脍”（五代《清异录》）、“水晶脍”（宋《事林广记》）、“羊头脍”（元《饮膳正要》）、“鱼生”（又名生鱼脍，清《广东新语》）。

古代祭祀也用鱼脍，《礼记·曲礼下》云：“鲜鱼曰脍祭。”《史记·礼书》亦载“大飨上玄尊，俎上腥鱼”。说明古礼中已将生鱼用于飨礼了，古代给祖先享用的祭品是十分重要的事情，所以新鲜生鱼祭祀祖先，自然代表的是尊享。《诗·小雅·六月》云：“饮御诸友，炰鳖脍鲤。”孔疏：“又加之以炰鳖脍鲤珍美之饌，燕赐厚矣。”所言“脍鲤”即鲤鱼的生鱼片。据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记载，御园金明池，每年三月初一对外开放，苑内不仅有诸般艺人作场，还有许多垂钓之士，他们得鱼后便高价卖给游客。然后就在水边“临水所脍，以荐芳樽”起来，所脍之鱼是现钓现做又现吃，又叫做“旋切鱼脍”，可见宋朝的老饕们为“一时之佳味”的速度与激情丝毫不输

于现在人。此外还有鲈鱼脍，宋人赵令畤《侯鯖录》认为最美味的各地食品中，“吴人脍松江之鲈”是其一。鲈鱼为脍，见《晋书》“文苑列传·张翰”，云：“翰因见秋风起，乃思吴中菰菜、莼羹、鲈鱼脍，曰：‘人生贵得适志，何能羁宦数千里以要名爵乎！遂命驾而归。’”从此鲈鱼脍或莼鲈之思成了辞官隐居的代名词。张翰虽然为避祸而厌倦宦海，假托思念家乡美味，但可以想象那个时候苏州地方的菰菜、莼羹、鲈鱼脍已十分有名，不然张翰言而何用呢！

古人食鱼脍必用酱，《礼记·内则》中提到有“芥酱、鱼脍”，又提到“脍，春用葱，秋用芥。”正义云：“上云鱼脍芥酱，则谓秋时用芥。芥辛，于秋宜也。”就是说吃生鱼的时候，春天要用葱佐餐，秋天要沾芥末酱同食，白居易诗《和三月三十日四十韵》云：“鱼脍芥酱调，水葵盐豉絮”，可知唐人以芥酱调脍。而唐人杨晔对鱼脍选择什么样的鱼则另有一说，他在《膳夫经》中把适合做生鱼片的鱼分成三个等级：列入头等的只有鲫鱼，次等的有鳊鱼、鲂鱼、鲷鱼和鲈鱼，再次等的包括鲚鱼、味鱼、黔鱼、黄鱼和竹鱼。《齐民要术》上讲切脍不得洗，洗则脍湿，生鱼片沾了水味道大异。康有为注《论语》“脍不厌细”句云，“今日日本人犹全食鱼脍”。可见康也认为日本食鱼脍的习惯也源自古中国，至今日本人吃生鱼还要佐芥末酱来吃呢，这大约要归于遣唐使的功劳。

古代有个成语叫脍炙人口，其实说的是最初古人吃鱼的两种烹饪方式，所谓脍即是鲜鱼细切加上调料，炙则相当于烤鱼再加调料，都是美味至极的佳肴，因而衍化为比喻好的诗文或事物为众人所称赞叫脍炙人口。

清乾隆《吴县志·物产》还记录了水晶脍，则与生鱼片大不同了，相当于今天北方的皮冻，是吴地民间冬日佳味，“水晶脍，以赤尾鲤洗净洗鳞，去涎水，浸一宿，用新水于釜中慢火熬浓，仍去鳞滓待冷，即凝缕，切沃，以五

辛醋味最珍，俗云腩子。”

苏州民间鱼馐，“三白”为上

苏州太湖及密布的大小湖荡，出产各类鱼鲜，每月不同，仿佛上天的安排好似的择期上市，让苏州一方水土的人们每月都可以饱尝美味湖鲜。苏州人嗜鱼成习，且讲究时节，过则少人问津，民间一直流传一首关于节令与鱼的谣谚，其云：正月塘鲤鱼，二月鳊鱼，三月甲鱼，四月鲥鱼，五月白鱼，六月鳊鱼，七月鳊鱼，八月鳊鱼，九月鲫鱼，十月草鱼，十一月鲢鱼，十二月青鱼。苏州人讲究按照四季所产鱼的最佳时节来吃，为什么要这样吃呢？苏州民谚回答说：“正月塘鲤肉头细，二月桃花鳊鱼肥；三月甲鱼补身体，四月鲥鱼加葱须；五月白鱼吃肚皮，六月鳊鱼鲜如鸡；七月鳊鱼酱油焖，八月鳊鱼要吃肺；九月鲫鱼要塞肉，十月草鱼打牙祭；十一月鲢鱼吃只头，十二月青鱼要吃尾。”初春桃花盛开，塘鲤鱼、鳊鱼应候而出，最肥美。菜花开时甲鱼上市，称“菜花甲鱼”，过此时节的甲鱼所谓“蚊子甲鱼”，肉质松老，无人问津了。据说还有这样一件事情，说到苏州人特重塘鳢鱼，老苏州们立马眉飞色舞“啊是菜花塘鲤鱼！”因此弄得汪曾祺十分好奇：“塘鳢鱼是什么鱼？我向往之久矣。到苏州，曾想尝尝塘鳢鱼——这种鱼样子不好看而且有点凶恶。浑身紫褐色，有细碎黑斑，头大而多骨，鳍如蝶翅。苏州人做塘鳢鱼有清炒、椒盐多法。”其实苏州人过日子细腻里有讲究，塘鳢鱼初春价高，为了跟上时令，普通人家多捡小些价低的买回家，清洗干净后用塘鳢鱼炖蛋，让鱼的滋味在水与火的洗礼里尽情绽放它的鲜美，而且这款蒸菜是老幼皆宜的滋补佳肴。苏州民间最家常还有白烧或红烧塘鳢鱼，加几片春笋，讲究的则是清溜塘片。



〔元〕唐子华《雪港捕鱼图》

苏州民间立夏时要见“三新”，而鲥鱼、海蛰、黄鱼组成的“江海三鲜”也陆续上市，小暑前后则要吃黄鳝才大补，说是“小暑黄鳝赛人参”。

苏州人初夏嗜吃黄鱼，黄鱼脑有骨如白石，故又名石首鱼，鱼干也称鲞。李时珍《本草纲目》说：“鲞能养



菜花塘鲤鱼 吴门人家供图



菜花塘鲤鱼 吴门人家供图



虾籽鲞鱼

人，人恒想之，故字从养。”可见它受欢迎的程度了。此鱼在海中乘五月间海潮而来，为吴地五月里的时令菜肴，天气渐热，古代的冰鲜技术有限，有时候黄鱼已有臭味，有“忍臭吃石首”之谚，谚云：“栀子开花石首来，筐中絮被舞三台。”言嗜食此鱼者，典当冬衣冬被买鱼烹食。至于“鲞鱼”，唐陆广微《吴地记》说：“闽间入海逐东夷，见海中金色逼海而来，所司捞其鱼，食之甚美，三军作战勇敢，东夷降吴纳款，王因鱼味美，遂于美下着鱼为鲞字。”吴俗食黄鱼或煎或汤，亦有以蔬菜与石首鱼同煮为羹者，唐徐坚《初学记》说：“石首鱼鳞色甚黄如金，和蔬菜作羹，谓之金羹玉饭……”宋苏州先贤范成大《田园杂兴》云：“海雨江风浪作堆，时新鱼菜逐春回，荻芽抽笋河豚上，栀子开花石首来。”

说到苏州人吃黄鱼，清尤侗诗云：“杜陵顿顿食黄鱼，今日苏州话不虚。门客不须弹铗叹，百钱足买十斤馀。”看来那个时候黄鱼的价格远不如今天这样贵的，还是价廉物美的，但黄鱼是海鱼，要出海才能得到，如果国家实行海禁，则渔民出海不得，老饕们只能翘首以望战事快平，海禁早开了，此事见清汪琬《有客言黄鱼事纪之》诗，说的是苏州农历五月热湿蒸腾，正是黄鱼上市的季节，“此时黄鱼最称美，风味绝胜长桥鲈。”但由于兵燹，诏书禁海，老饕们希望快快解决争端，早早解除海禁，使得“此鱼复得登庖厨”。

苏州习俗，明清时候，端午日必买黄鱼，用于祭祖赏节之需，苏州葑门外原有二十四座冰窖，冬储夏用，它的作用除了夏天卖凉冰外，主要用于护鱼鲜，所以吃黄鱼，苏州人直接称之为食冰鲜了。沈朝初《江南好》词云：“苏州好，夏月食冰鲜。石首带黄荷叶裹，鲞鱼似雪柳条穿，到处接鲜船。”

苏州民间还喜食另外一种鲞鱼，所谓鲞鱼即鳊鱼，

主产于我国沿海，如黄海、东海等，北方习惯称之为“脍鱼”“白鳞鱼”。鱼身一般长约四十厘米左右，银白色、体侧扁，以食鱼类和无脊椎动物为主。苏州的鲞鱼制作味道鲜美而不干咸，糅合了苏式烹鱼和苏式蜜饯的制作技艺，制成鲞鱼成为脍炙人口的夏令美食，也唯有苏州的虾子鲞鱼有如此委婉悠长的滋味，鲞鱼本就味鲜，再加上虾籽的加入，味道就更加鲜美了，苏州的鲞鱼集中了香、鲜、咸、甜、脆、酥的多层味道，让人食后倍思恋。旧时富贵之家，夏季喝粥的

佐菜之一就是虾子鲞鱼。今在苏州传统的糖食店采芝斋、叶受和都有售，是著名的姑苏特产之一。苏州的胥城大厦所供苏式菜肴里，还有一道新鲜鳊鱼按照苏式的制作技艺做成虾籽鲞鱼，味道鲜美异常，和那里的奥糟面一样是老饕们品尝苏式佳肴的首选。

这个时节还有鱼中贵族——鲥鱼，鲥鱼属洄游鱼类，每年在海中育肥后，溯江而上，生育产子，最先进入长江下游江面，从南京到长江口是主要水域，产卵前后的鲥鱼其肉质正是最为鲜美之时，故民间素有“来时鲥，去时鳊”之说。美食界素有“南鲥北鲢”和“来鲥去鲢”之说。春四、五月鲥鱼味美，但鱼汛很短，不过半月则时过矣。在明代，鲥鱼上市要先进贡皇上，称鲥贡，并形成制度，每年“檄下如火催”“百千中能选几尾”“只求好鱼呈至尊”。顾起元记载：“嘉靖间进贡船只……二则守备尚膳监，曰鲜梅、枇杷、杨梅、鲜笋、鲥鱼。”（《客座赘语》卷六·供用船只旧例）明代鲥贡制度规定，必须在五月十五日先于南京明孝陵祭祀太祖和马皇后，最迟六月末运抵北京，北京设有鲥厂，由南京守备太监掌管，统筹鲥鱼的捕捞和运输，鲥贡须赶上七月一日北京太庙祭祀，明沈德符记载说：“鲜梅、枇杷、鲜笋、鲥鱼等物，然诸味尚可稍迟。惟鲜鲥则以五月十五日进于孝陵。始开船，限定六月末旬到京，以七月一日荐太庙，然后供御膳。”鲜贡在明代最棘手的是鲥贡，时间短，保鲜要到位，不能有丝毫差池！鲜鲥到京供太庙后，进入御膳品馐，然后皇帝再分赏辅臣。因经过太庙，立刻如鲤鱼跃龙门般身价百倍，官员获上赏赐，感激涕零，题诗谢圣上隆恩。明倪岳《蒙赐鲥鱼》诗云：“中使传呼赐予仍，小臣何幸亦亲承。润分异果皆沾露，寒沁嘉鱼尚带冰。擎出九天从玉署，贡来千里自金陵。深惭两世遭逢地，图报非才愧感增。”（原载《正德江宁县志》，转引自《江苏



清蒸鲥鱼

省志·水产志》)可见古代鲥鱼赐给臣工是件多么荣耀的事情。

然而对于捕捞鲥鱼的渔民和运送的驿站人员来说,则无疑是沉重的负担,清沈名荪《进鲜行》诗云:“江南四月桃花水,鲥鱼腥风满江起。朱书檄下如火催,郡县纷纷捉渔子。大网小网载满船,官吏未饱民受鞭。百千中能选几尾,每尾匣装银色铅。浓油泼冰养贮好,臣某恭封驰上道。钲声远来尘飞扬,行人惊避下道旁。县官骑马鞠躬立,打叠蛋酒供冰汤。三千里路不三日,知斃几人马几匹。马伤人死何足论,只求好鱼呈至尊。”(原载《清诗铎》卷四,转引自《江苏省志·水产志》)不仅如此,清朝道光年间,第一批鲥鱼上市,官衙首先要尝鲜,叫渔民快船送进衙门。袁景澜诗云:“秧针刺水绿参差,正是冰鲜出市时。万里长风催船趁,官衙五月进头鲥。”词下注道:“葑门外冰窖,冬月藏冰,夏取以护鲜鱼,名冰鲜。梅雨乍过,有长风随海舶来,旬月不歇,名舶趁风。鲥鱼新出第一鲥,必进抚军,名头鲥。”鲥贡持续了二百余年,至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山东按察使参议张能麟奏请免供鲥鱼,康熙帝准“永免进贡”,从此结束“鲥贡”,渔民也可稍获喘息机会。虽然康熙下令结束“鲥贡”,但鲥鱼之珍仍然影响民间,今鲥鱼数量骤减,越来越受到关注。

鲥鱼好吃终究难得,农历五、六月江南入梅时节,白鱼正逢时,稍盐腌,葱姜少许即可,清蒸十分钟左右便可上桌,入口肉质细嫩,肥美鲜洁。因其嘴微微上翘,苏州民间称“翘嘴白鱼”,又因白鱼上市正是黄梅季节,农村正逢稻田插秧季,分为头蒔、二蒔、三蒔,共十五天,故白鱼又称“蒔里白”。有吴地童谣唱到:“新打快船柏木香,姐摇我去兜白相,看看太湖好风光,山歌唱得应天响。翘嘴白鱼豁虎跳,闪闪银鱼拍手笑,白虾勒啦



翘嘴白鱼

水草里,叽里咕噜穷商量。”(陆志明搜集。白相:吴语,游玩之意。豁虎跳:吴语,跳上跳下之意)这首童谣唱的是太湖著名的“三白”——白鱼、白虾、银鱼。

银鱼,俗称面条鱼。属于银鱼科,银鱼属,是多种半透明鱼类的统称。太湖银鱼,历史悠久,据《太湖备考》记载,吴越春秋时期,太湖就盛产银鱼。清代康熙年间,银鱼被列为贡品。它与梅鲚鱼、白虾并称为“太湖三宝”,驰名中外,现在仍是我国主要的出口水产品。

太湖银鱼大约有四个品种:太湖短吻银鱼、寡齿短吻银鱼、大银鱼和雷氏银鱼。皆软骨无鳞,肉质细嫩,味道鲜美,营养丰富。自古有“春后银鱼霜下鲈,远人曾到合思吴”的诗句咏之。苏州民间传说,银鱼是哭倒长城孟姜女的眼泪变成的。苏州民间银鱼为饌家常有银鱼炒鸡蛋、银鱼炒韭菜、银鱼烧豆腐、银鱼炒雪里蕻、银鱼蔬菜汤等菜肴。

太湖白虾久负盛名,清《太湖备考》上有“太湖白虾甲天下,熟时色仍洁白,大抵江湖出者大而白,溪河出者小而色青……青虾、白虾以色名也”的记载。白虾壳薄、肉嫩、味鲜美,五六月间为产卵期,河虾大都抱卵,渔民称之为“蚕子虾”。这时上市的无论白虾或河虾,老苏州称为“三虾”,即虾籽饱满、虾脑充实、虾肉鲜美,店家便有炒三虾、三虾面应市。太湖边刚起网的白虾做的“醉虾”最绝,用高度白酒醉之,吃的时候蘸上调料,奇嫩异常,鲜美无比。苏州人常做的是盐水白虾,虾仁可做成虾仁炒蛋、虾仁羹汤、碧螺虾仁等美食。民间有“死虾泛红”之说,但太湖白虾却不然,烧熟后浑身依然白色,通体透明、晶莹如玉。大画家齐白石画虾为一绝,不知道他老人家品尝过太湖的河虾和白虾否。“朝看一碗虾,暮作一纸虾。破墨有神态,明透是禅家。红花墨叶烈,四五蝌蚪画。千古白石蟹,白菜润喉嘉。仿佛忆



太湖白虾



银鱼炒蛋

母图，秋水共年华。笑看一蒲扇，赤子鸡冠花。”三虾好吃，但剥“三虾”绝对是个巧活，挑选饱满的鲜虾，然后把虾脑、虾籽、虾肉分别剥出来，手法要轻巧，不然虾肉剥出来会不成形，一边剥一边把剥下来的放在冷水里，不然的话，虾肉变红就失去弹性，味道也不鲜洁了。

苏帮菜老字号菜馆里，三虾菜肴还有一个非常文艺的名字：清风三虾。所谓“清风”即一片新鲜的荷叶，炒好的三虾用鲜荷叶做衬底，放在白色的瓷盘里上桌，色香味形器全有了，带着荷的清香和虾的鲜美，便有了个诗情画意文艺范的菜名。虽然价格有些“咬手”，但仍然挡不住吃货们品尝清风三虾、三虾面的热情。时令短暂，如过往云烟，归去来兮，苏州人对时令的敏感度在餐桌上最能捕捉得到。如今，邀朋呼友到太湖边品尝农家菜，白虾、白鱼、银鱼成为必点的佳肴。

鲈鱼——苏州最有文化的鱼

农历九月，苏州时令美味有鲈鱼莼菜羹，旧时以生长吴淞江的四鳃鲈最佳，体侧扁，巨口细鳞，银灰色。鲈鱼与长江鲢鱼、黄河鲤鱼、太湖银鱼并称为“四大名鱼”。鲈鱼学名松江鲈，因鳃膜上有两橙色斜纹，酷似二片鳃叶，故有“四鳃鲈”之称。属于浅海鱼类，一般在与海相通的淡水河川区域生长，洄游入海产卵，幼鱼再回到淡水中生活。《本草经疏》说：“鲈鱼，味甘淡，气平和，与脾胃相宜。”古人认为鲈鱼有养脾胃的食疗价值。

晚唐时候，著名诗人陆龟蒙《食鱼》诗：“江南春早鱼无泽，岁晏未曾腥鼎鬲。今朝有客卖鲈鲙，手提见我长于尺。呼儿舂取红莲米，轻重相当加十倍。且作吴羹助早餐，饱卧晴檐曝寒背……”隐居苏州的陆龟蒙，用春天尺长的鲈鱼来做羹，还美其名曰吴羹，美美品尝

后，在初春的暖阳下曝晒寒背。

但有一点要说明，苏轼《后赤壁赋》中有“巨口细鳞，状如松江之鲈”语。但历来多误为松江府或松江县，其实“松江”乃吴淞江之谓也，古诗有：“枫落吴江冷”句，诗里吴江指的是吴淞江，又简称吴江，亦名松陵江、笠泽江，发源于今吴江区松陵镇以南太湖瓜泾口，由西向东，穿过江南运河，在今上海市黄浦公园北侧外白渡桥以东汇入黄浦江，吴淞江源出太湖，东注大海，是适合鲈鱼生长的环境，因而自古盛产鲈鱼，苏州的吴江县（现为吴江区）自古即是有名的“鲈乡”，原长桥四腮鲈十分有名。

与鲈鱼相伴的莼菜也是九月最肥美，明代著名文学家陈继儒所著《小窗幽记》中写道：“三月茶笋初肥，梅风未困；九月莼鲈正美，秫酒新香。胜友晴窗，出古人法书名画，焚香评赏，无过此时。”莼菜为太湖特产，农历九月时嫩而味美，故莼鲈共煮为羹，其味美不可言，称东南之佳味也。

其实，鲈鱼与文化联系起来最初是晋代张翰发明的，张翰是名门之后，其父亲是三国孙吴的大鸿胪张俨，后东吴被西晋所灭，张翰在晋惠帝的时候官至大司马东曹掾，擅长诗文，淡泊名利，性情放纵不拘，他在乱哄哄的晋代讨厌朝不保夕的做官生涯，聪明地寻到一个借口，说是看到秋风起，远在千里之外的洛阳思念起故乡苏州的菰菜、莼羹、鲈鱼脍的美味了，于是马上递上辞呈，弃官回到故里，还作《鲈鱼歌》作为离职的舆论宣传，未了却留下了“莼鲈之思”的千古佳话。对于莼鲈之思，历代文人都有自己的见解，宋龚明之的《中吴纪闻》记载：“东晋张翰，吴人，仕齐王冏，不乐居其官。一日，在京师见秋风忽起，因作歌曰：‘秋风起兮佳景时，吴江水兮鲈正肥。三千里兮家未归，恨难得兮仰天悲。’遂弃官



〔明〕文嘉《垂虹亭图》

而还。国初，王赞运使过吴江，有诗云：‘吴江秋水灌平湖，水阔烟深恨有余。因想季鹰当日事，归来未必为莼鲈。’赞之意谓翰度时不可有为，故飘然引去，实非为鲈也。至东坡赋《三贤》诗，则曰：‘浮世功名食与眠，季鹰真得水中仙。不须更说知几早，直为鲈鱼也自贤。’其说又高一着矣。”意思是说张翰辞官是以鲈鱼为托词，他聪明得看出了做官不能有为的境况，打算早早脱身世外。李白在《行路难》中表达的更直白：“吴中张翰称达生，秋风忽忆江东行。且乐生前一杯酒，何须身后千载名。”从此，鲈鱼在古代士子的心灵深处，成了寻求身心

自由，视名爵如粪土的代名词，所以可以这样说，鲈鱼是鱼儿里最有文化的鱼了。据《芦墟镇志》记载，张翰回家后，筑别墅在枫里桥，宅东带水，因名莼鲈港，孝顺长辈，深为人称道，世代受到家乡人的纪念。宋宁熙年间（1068~1971）吴江知县林肇建鲈乡亭，绘张翰、范蠡、陆龟蒙画像于内，称“三高”，宋元祐年间，吴江知县王辟筑三高祠，将张翰、范蠡、陆龟蒙画像于壁，并称“三高”，后历代兴修，规模大备，祠内有塑像等物，每逢春秋都有祭奠。

张翰以莼鲈之思扬名历史，但其墓却在身后引起了一番争论。据2004年出版的《芦墟镇志》记载，清康熙时候编纂的《吴江县志》（1685年）说：“晋东曹掾张翰墓在二十九都南役圩。”而《吴郡图经续纪》云：张翰葬横山东五里，坟亡。《姑苏志》《吴县志》皆因之。则翰墓有确证，不可假托。乾隆芦墟人沈刚中在其《分湖志》（1747年）中记述：“南役圩有古墓，无封植树。民指为翰墓。”嘉庆年间，该地曾有张翰墓碑出土，惜字迹模糊。同治九年（1870）吴江知县黎庶昌重修张翰墓并立石。清初长洲学者张大纯实地调查后，在《三吴采风类记》中明确记载张翰墓在二十九都二图南役圩，并作《过季



《墓感赋》：“弭节江干日已晡，季鹰高节冠东吴。宦情落落空千载，墓草青青傍五湖。杯酒生前轻将相，秋风身后重莼鲈。只今势利滔滔是，过此还应愧汗无？”

1958年11月11日，吴江县文教局派员查明，位于莘塔公社东联大队南役圩南端的张翰墓占地50平方米，封土高1.5米，墓西约40米敬信庵曾供奉张翰的神位。墓碑和木神位已于去冬今春毁掉。当时建立三人保管小组，插牌明示。2000年秋调查发现，张翰墓已于60年代中期毁掉了，遗址在今莘塔镇枫西与荡东两村（即原东联大队）之间的东枫小学内，前排平房教室西半部即墓址所在，敬信庵原址上早已改建成村办公所和小工厂。张氏后代仍在东弥陀村，有东张、西张两支系。枫里桥、南役圩、莼鲈港又名二图港等都是当地地名，在明清时期均属二十九都二图。方言“二”念成“尼”，“二图港”转音成了“弥陀港”。尽管如此，张翰的莼鲈之思早已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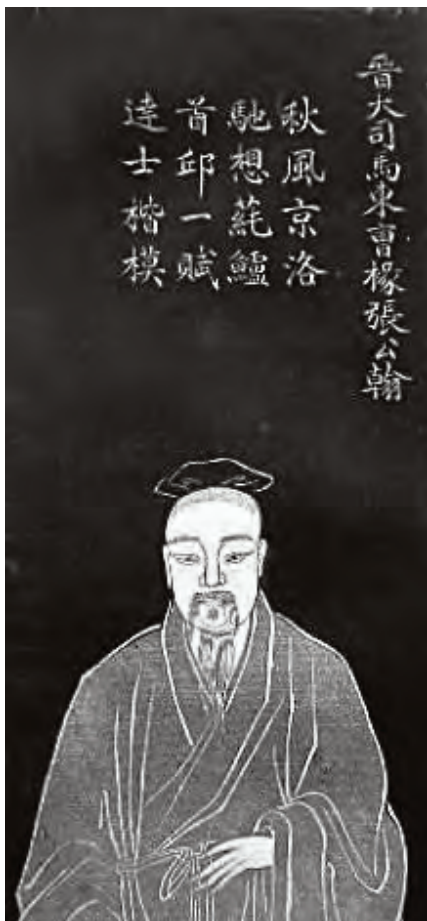


石家斑肝汤

成为了中国隐逸文化的标志，人杰地灵的吴江应该将他老人家的墓地遗址修复起来，让后来者也有个凭吊感伤的地方！

在苏州美丽的太湖边，一直流传着关于木渎的“鲃肺汤”与“斑肝汤”的有趣故事，至今仍为游木渎之人津津乐道。在民国十九年（1930）秋，当时任国府审计院长于右任，从光福看桂花过木渎，在石家饭店用餐。于席间应该饭店主人之求，书就“老桂花开天下香，看花走遍太湖旁。归舟木渎犹堪记，多谢石家鲃肺汤。”店主人以于老为党国元老，所书弥足珍贵，特悬挂在壁间，于是石家鲃肺汤，遂名闻遐迩。

后来于老为其故室黄夫人觅地筑坟，又来到苏州，午膳在石家饭店，店主人已备笔墨，请其重行挥毫，突然看见墙壁上悬的对联，联云：“老饕乱点袁公谱，小吃徕寻石氏汤。”又龙陵张自明和于氏原韵一首云“菊花美酒合生香。乘兴停桡木渎旁。闻道于髯曾饮此。疗馋目试石家汤。”于老一笑，挥毫仍是“老桂花开天下香，看花走遍太湖旁。归舟木渎犹堪记，多谢石家鲃肺汤。”并注“此为余十七年之旧作也。主人嘱再书之。”吴语：“斑肝汤”与“鲃肺汤”其音相似，陕西人于右任听吴依软语所述有误，也成就了石家饭店一菜成名，流传于今，名人效应使得普通的菜肴陡然充满了人文风味。



张翰像



影像中的昆山古建筑

◎ 杨瑞庆

昆山历史悠久，人杰地灵，在长期的社会延续和文化积淀中，曾经拥有许多源远流长的古建筑，但由于年久失修，大多毁于无情的岁月中，只有少量很有价值的古建筑，得到了历代爱心人士接力呵护才保存至今。

由于不断修缮，就会不断变化，成为古建筑存在至今的常态。虽然“修旧如旧”是修缮古建筑的理想境界，但是，修过以后就会变得新了，就是常说的“旧貌换新颜”，关键是要在新貌中能看出旧形来，做到这一点是很不容易的。

一般情况下，土木结构的建筑至多50年要大修了，砖石结构的建筑至多100年要大修了，否则就会自然坍塌，甚至彻底毁弃。留至今日的具有数百年甚至上千年历史的古建筑都是经过了多轮修复，没有一座古建筑是彻彻底底的原生态，都或多或少地留下了后人修缮时再加工的痕迹。

在实施修复工程中，有时会受到经费的制约，有时会受到技术的制约，可能会产生修得太马虎的后果；有

时会受到观念的影响，可能会产生修得太精细的后果。新景和原形相比，如果看上去似曾相识，那是令人欣慰的修缮；如果看上去迥然不同，那是令人遗憾的修缮。

昆山留至今日的好多古建筑，其基石是原来的、材质是原来的、轮廓是原来的、命名是原来的，即使变了一些模样，本质属性还未完全改变，所以还被称为原来的古建筑。应该感谢前人在不同历史阶段中做成了许多功德无量的修复善事，才使一些古建筑立于不败之地。

久远的古建筑原形由于当时没有写真条件，而未能留下可供参考的情影。自从百年前发明了照相机后，就有真实记录建筑原形的条件了。每次修复，只要对照前后影像，就能看出——是否锦上添花了？是否画蛇添足了？笔者收集了一些保存至今的一些同一建筑在不同时期留下的影像，可以看出其中存在着一脉相承的演变轨迹，有的变化大一些，有的变化小一些，成败得失，自有后人评说。



千灯镇秦峰塔

梁天监二年(503),与延福寺相映成辉的七级方形秦峰塔,在千灯镇中拔地而起。塔高38米余,边长近5米,顶刹铁葫芦下焊有八角环,每角装置紫铜响铃,风吹叮当作响,令人心旷神怡。每层的四面塔壁上各有一个长形拱门,塔内装有木质楼梯可扶摇

直上,直达顶层。每层楼面都用楠木铺地,各层外围装有观光栏杆,游人可以登高望远,水乡景色尽收眼底。

在长达1500年的历史长河中,秦峰塔几经修缮,风采不减当年,还是表现出婀娜多姿,婷婷玉立的迷人美感,因此人称“美人塔”。据载,宋代时的塔形最光彩照人。明洪武年间、清雍正年间、乾隆年间、同治年间都曾不同程度地维修过,因此,秦峰塔千年不倒,成为古老千灯的一座标志性建筑。

新中国成立后,秦峰塔由于破损严重而摇摇欲坠。每遇台风季节,塔上的砖块、碎片经常“居高临下”,殃及周围。苦于当时的政府经济拮据,难以对秦峰塔“大动干戈”,只能小修小补,期盼能渡过难关。

1962年间,秦峰塔周边终于搭起了脚手架,施行了以“封角护塔”为主要内容的保护性维修。那时,只将塔边松动的砖块、附件作固定,以消除安全隐患,其它则没有能力顾全了。即使塔角残缺,也无从修复,因此留下了那张外形还算漂亮,但顶层缺角的不算完美的留影。

1978年,那时正处于刚粉碎“四人帮”后百废待兴的时期,秦峰塔又频发落物伤人的危险事件,情况严重,已进入非修不可的议事日程。由于那时没有足够的维修经费,而且“文保”意识又不强,所以只作了“截角去边”的简单化处理,因此,留下了那时最丑陋的塔影照片,令人扼腕叹息。

1994年,改革开放以后的经济形势好转了,千灯为了开发旅游古镇,秦峰塔才得到了一次彻底大修的机会,并决定重现宋代时的“美人”风貌。不但恢复了七级翘檐,而且还恢复了塔内的木梯和楼台,游人终于又可登塔远眺,极目美景。由于塔基未动,只在外形上进行了一些美化性的装饰,所以现被评为全国级的文保单位。



20世纪60年代秦峰塔



20世纪70年代秦峰塔



20世纪90年代秦峰塔

亭林园春风亭

大约在宋开禧年代里，浙江东阳人潘友文担任昆山令，他除了勤政廉洁外，还引进了一位具有全国影响的大词家刘过，而受到了邑人的爱戴。

当时，获悉著名词家刘过处在穷困潦倒的窘境中，一向乐善好施的潘友文知道后，当即向他伸出了援手——邀他定居昆山，还为他娶妻成家。刘过从此心境顺畅，创作了大量的优秀诗词，直至布衣终生，客死昆山。刘过穷得难以入殓，已调离昆山的潘友文不但捐资，还托人在玉峰东麓买地下葬，从此，“刘过墓”成为亭林园中的文重一景。后来，昆山百姓为了感恩潘友文求贤若渴的功德，就在玉峰西山顶上建起了一座纪念亭。由于亭基地处峰巅，登高望远，就有春风得意的惬意感，所以被命名为“春风亭”。

到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春风亭已破败不堪。此时，移居昆山的辛亥元勋曹亚伯发现春风亭已是风烛残年的凋零状态，顿生怜悯，立即募捐集资，进行了彻底重修。

春风亭以前的样式不得而知。既然称为“亭”，一定有四面透风的空间，但修复后的春风亭，已变成了封闭式的“阁”了，而且还用钢筋混凝土砌成，似乎在脱胎换骨？后来才知道了原委——那是因为春风亭处在峰巅位置，游客需求一个休闲去处，而且附近的文笔峰已用钢筋混凝土重铸，为了与周边环境相协调，春风亭就用钢筋混凝土重修成“阁”了。

新亭为二层楼八角形造型，内有十级楼梯通向上

层，楼上外圈装有一米宽的走廊，游人可依栏观光。大门开在东南角上，直通山道路径。可见，重建的春风亭是一座中西合璧的民国风格阁亭。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开始，玉峰西山辟为军事禁区，春风亭只可望而不可登。但在长期的风雨侵袭中也危在旦夕，务必立即进行整修。那次修缮手术不大，只将底层楼梯装在了大门外，可让游客直接登楼观光。上层的玻璃窗减少了一半，而且变成了朱栏白墙的色彩，看上去更加鲜艳了。只是那时还没有开放，所以亭边是一片门可罗雀的萧条景象。

最近的一次修缮是在春风亭可以对外开放的背景下进行的。对照前两图，只有栏杆上的四个绿色琉璃花窗原封不动，其他如亭尖饰物换了，上层玻璃窗恢复原样了，而且底层又被封闭起来，并贴上了石片装饰，显得更加结实、厚重、漂亮了。门口已摆起小卖摊，说明春风亭周围已经有了人气。

锦溪镇十眼桥

十眼桥位于锦溪镇南的五保湖口，南北走向。桥长52米、宽2.8米、高3米，主孔跨度3.5米。由于是九墩十孔的结构，因此称为“十眼桥”。由桥形绵长，姿态优美，故有“小宝带桥”之称，成为锦溪号称“三十六座桥”中最具风采的一座古桥。

初建于南宋隆兴年间。由于五保湖之南的村民如要到镇上赶集只能依靠木船摆渡过湖，遇到大风大雨的恶劣天气就险象环生。那时，有位乡绅出于行善乡民，积德后世的目的，就奉献爱心，捐款建造了这座跨湖十眼



民国时期的十眼桥（左上）；20世纪60年代的十眼桥（右上）；21世纪的十眼桥（下）

桥。由于湖面开阔，造价不菲，而资金有限，只能因陋就简。由于既要方便行走，又要方便行船，因此就建造了由九座小平桥和一座高平桥连接起来的十眼长桥。当年建造这座大型长桥可谓工程浩大，经历了从设计、选址、筹款、购料、施工等一系列工序，历时三年，才最后完成。

最初只是石墩加杉木的实用性平桥，当然经不起长期的风吹浪打，不久桥面朽烂，桥墩倾斜，出现了险情，随后在修修补补中度过了漫长岁月。直到清代乾隆末期，杉木桥板全部换成了长条花岗石，其中很多桥石是利用镇上拆除的古牌坊石柱铺就而成的，可见修得艰难，很不容易。有一张民国初期留下的十眼桥旧影，只见四个村民走在没有栏杆的简易平桥上，虽然需要小心翼翼地行走，但比起飘湖摆渡已经安全得多了。

直至到了“文革”中的1974年，十眼桥有了一次较大规模的整修。最大的变化是加固了桥墩，还为长桥加设了栏杆，并且就地取材当地出产的青砖，砌成叠空造型，煞是好看，使得行走更加安全。但不知什么原因，最高处的平桥仍未加设栏杆。

2009年，锦溪镇政府为了将十眼桥打造成旅游胜景，对十眼桥进行了一次美化工程，拆去了原来有煞风景的砖孔栏杆，换上了通透的流线型栏杆，而且与高平桥上的栏杆连成一体，一眼望去，美不胜收，使古桥重放异彩。

数年前，又对十眼桥进行了一次修缮，主要内容是美化桥石和栏杆，更换了更具艺术性的白色护栏，替换了一些破损的朽石，成为一座棕石白栏的美桥，与周边的古莲池、文星阁一起，形成了锦溪境内最有魅力的旅游景区。

半菡园揖山亭

半菡园是昆山名门叶氏的私家园林，始建于明代中



不同时期的揖山亭

期，主人是明正统进士叶盛的五世孙叶恭焕。园林原名春玉圃，后在易主、分包的历史传接中，先后改名菡园和半菡园，内有楼台亭阁，奇石名树，曾经美景遍园，誉满吴中。由于得到叶家后生的世代接力呵护，所以一直是景色迷人，成为昆山城内的文化高地。昆山光复后的第一家新式学堂、第一家新式医院都创立于半菡园，成为百姓的向往园林。1934年时，半菡园还是引人入胜，以致时任民国主席林森视察半菡园后，啧啧称赞风景这边独好。

半菡园中古建筑琳琅满目，其中，有一座小巧玲珑的揖山亭，因为建在园中的制高点——人工堆积的山巅上，一亭独秀，令人神往。因为可以登亭望远，一览无遗，为了尊山作揖，就取名为揖山亭。

谁知1937年抗战爆发，日军炮弹投到了昆山城里，半菡园毁于一旦，将园内的菡竹堂、小有堂、樾阁、揖山亭等名胜都顷刻化为乌有，价值连城的寒翠石也不见了踪影，半菡园遭受了重创，日渐萧条。

半菡园消失殆尽，让人痛心疾首，后人已不可能恢复昔日的风貌了，唯有相对简易的揖山亭可以有条件复建，只是各个阶段有点力不从心，而随心所欲了。



千灯陶家桥



三十年代后期，半茧园里复建了一座简陋的揖山亭，只见是一座竹木结构的四角亭，显得势单力薄，弱不禁风。

四十年代中期，发表于《昆山旅游指南》中的一座揖山亭，已见改为砖木结构的六角亭了，是一座推倒重建“判若两人”的揖山亭。

建国后，在半茧园的地基上建起了昆山县第一人民医院。七十年代末，为了改善医院环境，就在医院的庭院中建起了一座高高大大砖木结构的八柱揖山亭。与前亭相比，材料和形态都已今非昔比。

还是最近新建的揖山亭与四十年代的造型有点相像，看到了一些返璞归真的迹象。今日“一院”的庭院里，已利用半茧园时留下的古树古石，营造出一些古色古香的氛围了。

还举两列古建筑影像的对照变化：

一是千灯陶家桥。这座由唐代陶峴后裔建造的古桥，原来没有桥栏，却有古意盎然的桥亭，但修复后装了栏杆、拆了桥亭。

二是周庄双桥。原是直角布局的两座拱桥，桥栏石摆布也一模一样，修缮后，其中的一座桥改为平桥，而且桥栏也改变了式样。

举了这么多修缮前后对照的古建筑，可见大多是在原来基础上的渐变修复，因此还保留着许多遗传因子，即使删除了一点附加或添加了一点装饰，还能看到原生态的影踪；但有些易地重建的古迹（如揖山亭），材料全新、式样全变，即使还用原名，也是名不副实的“假古董”了。

综上所述，古迹修复工作应尽可能按照原形修缮，千年以后还有旧形的影子，这是大家都盼望看到的传承结果。



周庄双桥





江宁织造府的戏曲往事

◎ 陈奕通

南京大行宫地区的江宁织造博物馆内，有一座“曹府戏苑”。它隐身闹市，庭院深深，翠竹掩映，戏台飞檐翘角，精雕细刻，一派古色古香。江宁织造博物馆在清代江宁织造遗址上建立，讲述着江宁织造府的辉煌过往。不大的庭院里，为何专辟二进院落为“戏苑”？难道戏曲之于当年的江宁织造府颇为重要？没错，织造府虽专管皇家织造，却与戏曲有着不解之缘。故事要从三百多年前主政江宁织造府的曹雪芹家族说起。

康熙三十一年(1692)，三十四岁的曹寅从苏州调任江宁(今南京)。彼时的曹寅，正是“贵胄公子，意气赫奕，光彩射人”，在苏州织造府的任期尚未完结，他又奉皇命接掌名震天下的江宁织造府。未来的二十一年，江宁织造府将在他的经营下进一步走向巅峰。而在此之前，乃父曹玺已经在这个颇受瞩目的位子上工作了二十二年。子承父业，时人皆知，这是康熙皇帝的特别

关照。随曹公子同时入驻江宁织造府的，就有他在苏州时期精心打造出的“曹家班”。赴江宁上任前的重阳节，意气风发的曹寅在苏州拙政园广延宾客、大集名流、赏菊观乐，曹寅家班闪亮登场，演出了《李白登科记》，一时传为佳话。

这一年，曹寅还创作了杂剧《北红拂记》。该剧以唐代传奇《虬髯客传》中“风尘三侠”红拂女、李靖、虬髯公的故事为基础进行创作，用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扣人心弦的故事情节借古喻今，表达了顺应历史潮流、认清天下大势、遇明主而附之、实现个人抱负的观点。这种观点的形成似与曹寅的家世背景密切相关：曹家本为汉人，明末清初被俘而成为满洲八旗“包衣”，虽然“包衣”本身地位极低，但顺治年间曹寅之母孙氏被选为皇子玄烨(后登基为康熙皇帝)的保姆，曹寅之父曹玺成为内廷侍卫后更于康熙年间执掌江宁织造府，而曹寅本人自小

与玄烨一起长大，既是“奶兄弟”又是同窗好友，私交甚笃。如此独特而复杂的家族经历使曹寅审时度势，在天下大势初定之时做出了“顺势”之选。

康熙四十年(1701)前后，为迎接圣驾南巡，曹寅以明代散曲家陈铎同名旧作为蓝本，创作了杂剧《太平乐事》。该剧处处洋溢着欢快热烈的气氛，多角度展现了康熙年间社会各阶层欢度上元灯节的热闹场景，一派国泰民安、歌舞升平的繁荣景象。《长生殿》作者、著名戏曲家洪昇评价该剧“传神写景，文思焕然，诙谐笑语，奕奕生动”；文学家朱彝尊则说：“意匠经营，穷工极致。聚沙为塔，鞭石成桥，未足喻其变幻。”该剧毫无悬念地获得了康熙皇帝的青睐，《圣祖五幸江南恭录》记载：“十八日……各官上朝请安，进宴演戏。皇上亲点《太平乐》全本庆贺万寿。”文中的《太平乐》，正是曹寅苦心创作的大戏《太平乐事》。

曹寅曾经自评“曲第一，词次之，诗又次之”，可见其对自己戏曲作品的看重。《北红拂记》《太平乐事》之外，曹寅还创作了大量戏曲剧本。其孙曹雪芹的《红楼梦》第五十四回“史太君破陈腐旧套 王熙凤效戏彩斑衣”中有这样一段描写：

(贾母)指湘云

道：“我像他这么大的时节，他爷爷有一班小戏，偏有一个弹琴的凑了来，即如《西厢记》的《听琴》，《玉簪记》的《琴挑》，《续琵琶》的《胡笳十八拍》，竟成了真的了，比这个更如何？”众人都道：“这更难得了。”

贾母提到的《西厢记》《玉簪记》皆为传统传世名作，独有《续琵琶》竟然是曹寅本人的作品。该作现存三十五出，讲述文姬归汉的故事，在人物塑造方面颇有新意，至今仍然是北方昆曲剧院的常演剧目。曹雪芹在《红楼梦》中设置了大量戏曲活动的描写，同时，以这样巧妙的方式纪念祖父曹寅、向其致敬，可见曹寅对戏曲的热爱深深影响了曹雪芹。

曹寅剧作以优美的文辞、新颖的立意颇为时人称道，曹寅也因此成为清初文坛上极具影响的戏曲作家。难能可贵的是，曹寅不仅是一名优秀的“编剧”，还是优秀的“演员”和“导演”。

前文说到的朱彝尊的孙子朱稻孙《挽曹荔轩先生四首》赞道：“每逢清兴发，风月一身担。”诗人张大受《赠曹荔轩司农》亦云：“有时自傅粉，拍袒舞纵横。”这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活跃的“演员”曹寅——精力充沛，兴之所至，常常登台亮相，与家班演员一起唱曲演戏，尽显风雅。而作为“导演”，曹寅不仅经常组织苏州拙政园《李白登科记》那样的“主场演出”，还时常率领家班成员外出“巡演”。

康熙四十九年(1710)春，曹寅家班就曾应邀到扬州盐商郭元舒的府第演出。时人王文范写下《郭于官宅观通政曹公家伶演剧，兼送杨掌亭入都》：

客满中庭花月多，春灯如昼酒如波。

掐箏箏笛行云驻，细按红牙白云歌。

长杨羽猎素知名，此去腾蒿莫计程。

应忆桃花泉畔醉，梦中犹听绕梁声。

可见，戏曲在江宁织造府尤其是曹寅本人的对外交游过程中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戏曲在当时是江南文人雅集的重要谈资，对戏曲创作、演出、品鉴各环节都颇为精通的曹寅，得以结交众多江南文士、高官显贵。觥筹交错中，康熙的宠臣曹寅不露声色地完成了对



江宁织造博物馆戏台

江南汉族知识分子的“统战”。上文提到的著名戏剧家洪昇、文学家朱彝尊以及王士禛、徐乾学、毛奇龄等都是曹寅的座上宾。尤其是与洪昇的交往，在清代戏曲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那是康熙四十三年(1704)五月，曹寅盛情邀请洪昇来到江宁。他召集南北众多名士，举行盛大宴会，演出全本《长生殿》，三天三夜，尽欢而散。在满堂名士的注目下，曹寅恭请洪昇独居上座，自己在一旁作陪，两人座前各放一本《长生殿》剧本，两人一同拍曲观戏，一时间传为盛事。

三百多年过去了，织造故地的戏台上，依然常常会有迤邐之声悠然唱起，曲折连绵，美妙醉人。戏台两侧，著名红学家、戏曲研究专家吴新雷教授创作的对联熠熠生辉：

曹府家声传织造，红楼遗韵演春秋。



南京长江大桥建成前两岸交通情况

◎ 刘跃清

1908年4月宁沪铁路(因国民政府定都南京,曾叫京沪线)通车,约需10小时。1912年津浦路全线贯通。此后多年,江北浦口与江南下关由于天堑长江的阻隔,南来北往的火车到此,只能汽笛长鸣,隔江相望。两岸客、货过江,只有靠渡轮,尤其是货物转驳,来回装卸搬运实在耗时费力,而且还增加物品破损率。当年过江轮渡鼎盛时期,穿梭于江北津浦码头和江南下关的渡轮有4艘,日航50次,日载客量1万余次,还是不堪重负。

1927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次年,国民政府从英国人手里收回宁沪线的经营管理权,开始谋划火车过江的问题。1930年,国民政府根据《首都计划》建设,铁道部以10万美元重金聘请外国桥梁专家约翰·华特,对下关、浦口间建桥作了考察,得出“水深流急,不宜建

桥”的结论。10月,国民政府铁道部“下关浦口铁路轮渡设计专门委员会”,决定采用铁道部设计科科长郑华提出的“活动引桥”轮渡方案。

活动引桥根据历年长江两岸水位涨落差记录14.872米而设计。两岸引桥采用活动式,随水位升降高低调节,最大坡度为26%。南北两岸各设一座引桥。桥梁按古柏氏E50载重级设计。古柏氏为当时国际通行的一种桥梁荷载,等级越高,荷载越重。南岸位于下关煤炭港,北岸位于津浦10号码头下游300米处。每座引桥由4孔穿式桥梁组成,全长187.13米。除临江一孔长45.4米,其余每孔长46米。桥高7.75米,宽6.2米。临江桥端铺设3股轨道,可与船上轨道相接,其宽度为14.44米,呈喇叭状。桥端设有活动跳板,长17.1米,



铁路轮渡栈桥

接于横梁上,用20马力电机驱动,与船头铁栓连锁,以便桥与船的轨道相连接。南北两岸接轨线路由津浦、京沪两路局承办。下岸接轨线路总长1509米,铺设4股道。因地势局促,轨道呈曲线,半径为332.7米。浦口岸线路为直线,总长2952.9米,铺设6股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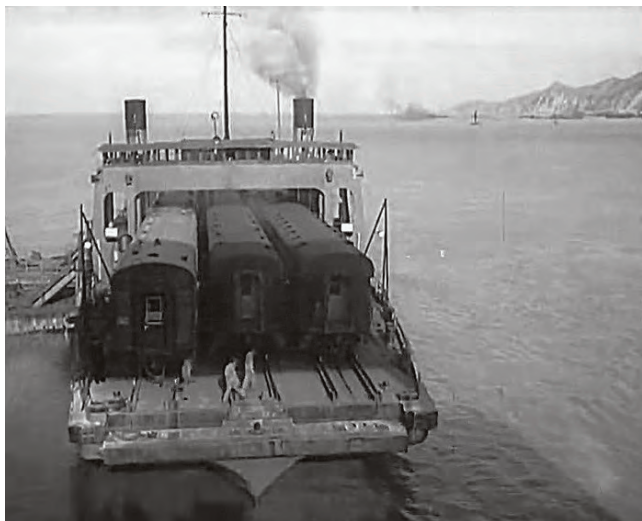
火车轮渡设计长113.3米,宽17.86米,载重量1550吨,满载吃水3.25米,航速12.25海里每小时,舱面铺轨3条,各长98.43米。全船可载40吨货车21辆或客车12辆。船后端设移动平台。车台长13.78米,备调车机车1台,可左右移动与任何股轨道连接,以取送各股道之车辆。船体前后左右各设一水柜,用于注入或排出水,以保持全船重量的平衡。轮渡由英国马尔康洋行承造,定名“长江”号,1933年8月驶抵南京交付使用,所用钢轨、枕木、钢梁全部从英国进口。

铁路轮渡工程所需费用主要来源:借庚子赔款22万多英镑,借国内工程款4万英镑(合国币58万余元),铁道部拨款25万元,借津浦路局6万元。这些借款用于购火车轮渡1艘,0-4-0式机车1台,挖掘泥船1艘和两岸引桥建造。

1933年10月22日,火车轮渡正式通车,当时万人空巷,盛况空前,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亲自到场祝贺,刚刚获得第五届全国运动会游泳冠军的杨秀琼女士应邀剪彩。南京火车轮渡,当年被评选为1927~1937年十年间中国“十大工程”之一。有日本记者在《读卖新闻》上称其“美轮美奂,东亚无双”。

火车轮渡工作原理简单,渡轮上铺有铁轨,通过“升降引桥”、栈桥和岸上的铁路线连接。“活动引桥”一端如同交链般与栈桥上的轨道连接,另一端随着水位高低升降与渡轮上的轨道相接,机车可顶着列车直接驶上渡轮。渡轮上有3股轨道,可容货车21节车厢或客车12节车厢。列车从上船、过江,再到上岸、编组,一次作业需要2个多小时。尽管有“夜间不渡,大雾不渡,涨潮不渡,台风不渡”等限制,但与原来货物转驳装卸来回折腾得一两天相比,确实方便多了。

1934年,国民政府铁道部开通了上海至北平(即北京)的直通车,全程34小时,旅客乘火车由上海到北平,经过南京铁路轮渡,中途无须上下车。那时候乘这趟车出行乃时尚之举,很多“富二代”“官二代”新婚就选择



轮渡上的列车车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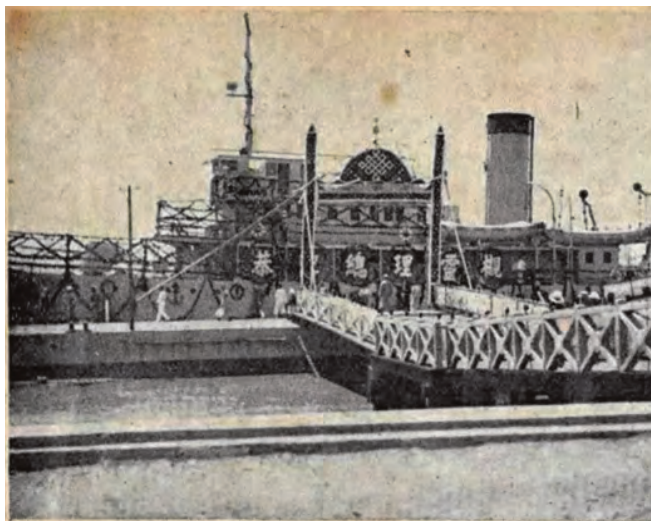
乘坐“沪平直快”作蜜月旅行。南京轮渡所大马路附近也变得十分繁华，有猪行、牛行、鸡行、米行等，酒肆林立，人声鼎沸，“南有夫子庙，北有大马路”说的就是当年景况。

1937年12月，日军侵占南京前夕，“长江”号渡轮，连同拆除的部分设备，撤到湖北宜昌石牌附近，卸下器材后自沉。

1938年初，日军铁道队使用无动力驳船2艘（一艘可载15吨货车7辆，另一艘可载4辆），上铺轨道，以小火轮拖引，日渡4次。1943年，从上海江南造船厂订购“金陵丸”第1、第2渡轮，轮换间歇航行，日渡12次，夜间大多停开。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政府交通部将两艘渡轮分别更名为“南京”号和“浦口”号，开始两轮航行，日航16次左右。1949年1月，“南京”号驶往上海大修。为防止渡轮被溃败的国民党军队劫持去台湾，该船总船长下令打开舱底阀门，自沉黄浦江。

渡江战役中，在中共地下组织的联络下，铁路轮渡工人先后开出烧煤炭的小火轮及“浦口”号接运解放军官兵渡江。战役结束后，邓小平、陈毅乘坐小火轮过江，抵达中山码头上岸，然后换乘吉普车进驻总统府。南京解放后，轮渡所由“首都铁路轮渡所”改名“南京长江轮渡管理所”，仅“浦口”号单轮航行，日航20次，曾创日航25次的好成绩。1950年，“南京”号打捞后修复投入航运，双轮日航平均48次。1958年和1959年先后新造“上海”号蒸汽轮、“江苏”号、“金陵”号（“文革”期间曾称“北京”号）内燃机轮，昼夜保持3轮航行，日均120渡次，渡车千余辆。曾创日航155次、渡车3414辆的最高纪录。1961年，轮渡所划归上海铁路局管理，其为局



在浦口迎接总理灵柩的威胜兵舰

辖两个处级单位之一，另一个是上海站。那时出入轮渡所的职员，一身挺括制服，不亚于今天的影视明星。

1968年10月，南京长江大桥建成后，火车过江时间由2个小时变为2分钟，客车及直通货物列车由大桥通过，有70%的过江货物仍由轮渡接运，此后慢慢缩减，1970年7月，轮渡所一度停航。1973年5月，南京长江大桥及新的枢纽配套工程相继建成，南京轮渡封闭停航，但作为战备单位，轮渡可在3小时内恢复工作，能让火车顺利通长江。1984年，南京轮渡所撤销，部分人员设备组成芜湖轮渡所南京综合车间。如今，南京轮渡公司隶属于南京交通集团。

今天浦口车站、中山码头、下关江面已繁忙不再，滨江风光带已成南京重点打造的一条城市景观线，曾经支离破碎、杂乱无序的江岸线，经过大力清理，成了一条贯穿南北的“绿色项链”，才半个多世纪光景就滋生出“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欲说还休的沧桑情韵。



朱自清笔下父亲的背影

红市家具之“苏工”

◎ 叶正亭



山水明意书房陈设

中国的红木家具历史源远流长,其中明清家具在红木家具里则属典范。明清家具大致可以划分为三大流派:苏工、京工、广工。这三个流派形成于不同的历史时期,受到不同社会环境及审美观念的影响,在用材、工艺、造型、风格等方面都有自己特色。后人将其概括为“文苏、豪广、奢京”。

所谓“文苏”,“文”是苏式家具的精髓所在,苏式家具之所以木秀于林,流行至今,可以说是深厚文化底蕴积淀下的结果。广工之“豪”则源于它是东南亚各国优质木材进口的主要港埠和通道,为家具制作提供了充足的原材料,使得它在用材上不吝奢华。“京工”指的是清代宫廷御用家具,所用材质都精良无比,家具上镶嵌的珍宝也都是货真价实,真可用“奢”字概括。

“苏工”家具历史久远。早在明代,苏州香山工匠——蒯祥成为紫禁城总设计师,他被誉为“蒯鲁班”。斯时,苏州的明式家具产区已形成,技艺日臻成熟。至清代,苏作家具的影响已颇为深远。它所指向的不仅仅是功用性,更是创造了中国文人身心安放的载体,演绎的是中国文人对于东方美学的解读。苏工家具是吴地的文人与工匠共同创作的。

苏工家具具有“形制、线条、结构、气韵”四美之特点。形制精美。文震亨的《长物志》中说,椅子“宜矮不宜高,宜阔不宜狭”,天然几只可“略雕云头、如意之类”,书桌应“中心取阔大,四周厢边阔仅半寸许”。他还认为方桌可以供文人展玩书画,而八仙桌只宜宴请,并非“雅器”。所以,苏作家具的形制具有经典性。线条俊美。苏工家具之线条,远非用“流畅”就能概括的,线条是家具的一部分,增加了家具的美感,线条的俊逸秀美是苏工家具“美”的重要组成部分。结构精巧。“榫卯”工艺

是苏工家具的重要标签,从古至今有140种之多,常用的则有33种,很多结构是其他流派所没有的。例如制作屏风的冰纹、用十字榫头连接起来的海棠图形等等,都体现出苏工灵动的榫卯工艺。高雅气韵。苏工家具不重雕饰、强调天然材质的审美格调,表达着江南文人的文化旨趣。

鉴赏苏式家具的鉴赏,既要“鉴”家具的材质、工艺、器型,又要“赏”其体现的审美意韵。在苏州,我见过两件经典的苏作明代家具。一件是珍藏在苏州西园寺中的千拼条案。此条案三米长、一米宽,黄花梨材质。全案没有雕花、没有繁复,可以说是简单又平淡,却让人心动。那条案就是以线条优美见长,透出的就是一种朴美的大气,抑或可以叫一种令人敬仰的神韵。这张条案的经典之处就在“千拼”二字。千,自然是个约数,千余块巴掌大的、不规则的花梨木,用榫卯拼合得如同平镜,不见一缝。抚摸案面,如同触摸婴儿肌肤。我以为这千拼条案不仅体现苏工的工艺精湛,更体现了苏州工匠“惜木如金”的一种工匠精神。这张条案距今五百多年,不仅丝毫未损,而且纹丝不动。几乎每年都有各地文物专家慕名而来,称它是明代苏工家具的扛鼎之作。

苏工明代家具另一件经典原作是一张多功能棋桌,目前珍藏于苏州园林博物馆。我则是在网师园小姐楼里见过,是一张方桌,不大,80厘米见方,未见雕琢,只以清水素雅见长,棋桌的桌面是活动的,一面刻有围棋棋盘,四角有小抽屉;另一面则是中国象棋棋盘,刻线俊秀,也堪称装饰。明代苏州工匠的聪明智慧在这张灵动的棋桌上可见一斑。

(图片由苏福红木提供)



“苏作”工匠精神面面观

◎ 顾晓清



微型博古架

什么是工匠精神?

工匠精神是长期从事于工艺制作过程中,日月积累,逐渐形成的文化认知与工艺创作的思想标准、工作态度和艺术追求,是作品内涵的表达,是作品艺术价值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一名长期从事“苏作”红木家具制作的劳动者,在我自己的艺术创作实践以及长期与“苏作”红木家具与各工种师傅们的交流中,深知每一个优秀的艺术作品、门类,它所蕴含的工匠精神是有着不同的内涵。归纳起来,蕴含在“苏作”家具里的工匠精神内容,大体包含在以下几个方面。

工匠之心

工匠之心是对自己从事职业的一种信仰与执着,静心、安心地做好自己工作,把工作作为职业,继而作为事业,把劳动作为创作。带着一颗纯净的心,把手头的工作做好、做精,全身心地投入到日常的、繁琐的工作中去,用修行的价值观代替浮躁工作观,让自己的生命沉静下来,作品沉淀下去。拒绝“物欲横流”的社会对人的无穷诱惑,抑制内心种种躁动,安静而认真地投入到自己的职业生涯,怀着一颗虔诚的心,刻苦学习技术,将复杂问题简单化,面对工作中的种种困难与矛盾,用十二分的认真去一一加以克服与解决。简单不等于草率,复杂不等于认真,只有热情、认真、用心,才能获得成功的机会。“苏作”红木家具的制作是复杂的,构建需要精心设计;“苏作”红木家具工种繁多,工艺复杂,从选材、开料、木作,到配色、雕花、打磨、点缀等,每件作品的完成,都需要多工种的通力合作,需要各工种师傅的共同努力,每一道工序都缺少不了工匠之心。



明式玫瑰两椅一几

怀着一颗“认真负责、精益求精”的工匠之心,把每件产品当成自己创作的作品,融入创作者的热情、激情和人格魅力。工匠之心会抛开杂念,为了作品完美,甚至忘却了自我,一切皆为了将手中的产品打造成精品。“人无我有,人有我精”,这样的一份理念,加上工匠一份认真、求精之心,更有一双灵巧的手,这便是“苏作”家具能够成为中国家具三大木作家具之首,成为中国国粹的真正原因。



千拼宝座

工匠之行

一打美丽的纲领,不如一个务实的行动。可以设想得天花乱坠,可以吹牛到云里雾里,但不务实、没行动,一切还是归零。工匠的可贵在于行,工匠的幸福也在于行。正是在行动中,体悟了修行的乐趣。这种行不是口号,而是日常工作中的指导思想,存在于自身对事物的理解、感悟、体会,活化出来,便塑造成为一件件实实在在的作品。也许是有粗糙,可能不够完美,但毕竟是实实在在做出来的。

当一个人的某一梦想、设想变成了某一作品,它给人带来的是欣喜的愉悦和真正的满足感,这是不劳动者所无法体会得到的。我和我的团队、我的工匠师傅们就是这样,多年如一日对专业的认知,把苏作红木家具作为一项事业去热爱、去传承、去创造。这是一项既传统又有创新,既有实用物体又不失文化内涵的事业。从事家具行业开始的几年间,一直是以仿样来做产品,从未想过改变,想过变化性与多样性,更没有想到过传承基础上的创新创造。工匠之行到一定火候会产生裂变,会产生思想的升华。2014年3月,我接待一位客户,要定制一套书房家具,他说:“我不

喜欢繁杂的家具,喜欢简简单单,纯线条美,代表苏作经典,不失传统韵味,但材料一定要讲究,让人一眼就能知道这是‘苏作’的作品。”一听此话,我知道遇到高人了。如何满足他的需求?我困惑了,仅仅传承传统家具已经不能满足时代的需求,创新必须付之行动,但如何创作呢?两天过去,我思索着,却理不出头绪。回到展厅兜圈子,突然看到挂在墙上的《苏州日报》姚永强老师的一幅山水画,思维顿时点

亮,贝聿铭设计的苏州博物馆中的山水令人难忘,姚老师山水画与贝大师的山水作品有相近的风格。“山水苏州”最是美誉,有山有水,有天有地,才是真正的“天人合一”。我将书房家具定名为“山水明意书房”,在苏作明式文房家具基础上,吸收吴门画派明四家传世作品的画意,用各种名贵材料雕刻出



吴门画意小叶紫檀花鸟笔筒

一幅幅连绵山水画面嵌入,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我们用心感受着江南的山水,感受着如诗如画的意境,并把它表达出来,成为有创意的家具作品。书房,是中国文人的“闲情之处”,有山水点缀,最是逸情。工匠之行可能是默默无闻的,却是十分可贵的,工匠们在学习与思考,将生活中对美的观察与思考提炼成为亮点,用工艺去表现。



六角椅两椅一几

工匠之韵

苏作红木家具之美,美在线条,线条所表现出的神韵。我所理解、所追求的工匠精神之韵,就是每一件作品所要表现的,既是整体风格清新自然,线条柔美,又不失简约之中透出的自然完美。一件作品的气韵、灵魂,一种无形的触摸而形成独特的美感。我个人是学雕花的,更能体会雕花工匠的劳作之韵。苏作红木家具之雕花环节是体现工匠之韵的重要环节,工作时是安静的,专注凿子下的线条深浅圆润,一点点勾勒出最初的轮廓,出坯、修光到细打磨。做一个优秀的雕花工匠注定是伴随寂寞的,每一道工序都是要用时间置换的,专注等待自己的双手将时间消磨,与木头不期而遇。做一个安静的雕花工,有很好的美感。2016年初,我无意中在木堆里见到一块原材,一块小叶紫檀小料,一看就很喜欢,不失为一种天然风格。拿回家静静地用心思索了几天,做了笔记,几天后,那块小料在我的刻刀下渐渐形成一个新的模样。我突然感觉到,木头和书写一样,同样是有温度的,可取之题材摆置同一空间,书写是让纸张、让笔迹留下时代的记忆,而雕琢木头随着时间的圆润与厚重,同样讲述着生活的痕迹。那天,我就把“小叶紫檀树根”定格为“新生”笔筒,因为她自身就透出古朴的神韵,而我也相信物与物之间的灵性。在刻画笔筒的同时,加入了全身心投入和气韵的融入,整件作品,放飞思想的灵感,让人百看不厌,叫人爱不释手。



平头圈椅两椅一几

工匠之新

创新,是一个民族不竭的动力。工匠创新是一个时代对工匠的呼唤,也是工匠智慧的结晶。苏作红木家具,明、清两代各有风格,明代讲究线条、意蕴。清代注重雕琢、讲究寓意。到了民国,西风渐进,苏作红木家具结合新工具、新需求,产生了风格独特的民国时代家具。创新,应该是有时代印记的,但创新不能丢掉优秀传统。我理解的创新,是传承基础上的创新,是工匠在积累先人的经历中,磨炼的那份心态,爆发的那种“火花”。重复又重复,是工匠工作的特点,木匠不断磨,才能化腐朽为神奇;雕花匠不断地雕,才能熟能生巧,做成一件件得心应手的作品。也只有在不断地重复中发现不足,打造更美的器物,创新也就是从这里来的,创新不是一转眼的心计,不可能一蹴而就,一切都是从生活中来的,包括平时的观察、平时的思考、平时点滴的积累。创新还需要充分的了解现代生活,才能达到时代需求,创新的结果就是一个时代的印记。没有电脑,我们怎么能了解互联网会开出了什么样的花?反过来,不了解时代,怎能跟上时代的步伐,符合时代的要求呢?以前,书桌就是书与笔,现在书桌上就是要有电脑的一席之地。传统家具必定紧跟时代的节奏,当然传统书桌不能转化为简单的现代电脑桌,座椅也不能随之改为沙发转椅,需要在传统与时代结合上找到切合点,体现苏作红木家具中文化气息的时代特点。也许这就是工匠之新的全部内容。创新不在于我们有多少聪明和智慧,而在于用心体会生活之真善美。

新者,心也!

(图片由苏福红木提供)

黎川风流黎里桥

◎凌龙华

(上)

黎里，南社巨子柳亚子先生故里，我的家乡。位苏州吴江东南，东望上海，南与浙江嘉兴接壤。现跻身“中国历史文化名镇”行列，与同区的同里、震泽一起以“江南古镇”身份进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黎里，古为“梨花村落”，清代袁枚一见钟情，挥毫题咏：“吴江三十里，地号梨花村。我似捕鱼翁，来问桃源津。”

主干市河东西向三里有余，如一条游龙穿镇而过，故黎里又有“黎川”别称。邑人徐达源于嘉庆年间著《黎里志》，云：“黎里一名黎川，又号梨花里（旧传村南多梨花）。”

古镇多古桥。据2014年出版的新修订《黎里镇志》“古桥”章：“老街核心区，原有20余座形态各异的石桥……老街古桥尚有17座，其中保留古式形制的有8座，略作改建的6座，重建的3座。”

桥毗连，且各具千秋：拱形的，一弧三板，如月半轮；梁式的，三板两竖，侧看极似一“介”字平头；更有一种简朴小桥，桥墩接岸，三两长石，墩上一撗，无柱无栏，洗炼之极，最宜竹杖芒鞋轻轻踏过。徐氏《黎里志》中多有亲切记载。

最为别致秋禊桥，位于老镇区西北，俗称“咕咯桥”，

貌似平平却奇妙无比。梁式三孔，清雍正十三年（1735）卜姓道士募缘重建。长17.5米，宽2.1米。桥面二十多块小石板如梯阶横嵌在左右两道石槽间，桥面贴水，桥心饰一“轮回”图案，登桥恰似行梯观阴阳鱼。更奇的是，足踩石板，咕咯作响，石晃而人不晃，妙否？秋禊桥通禊湖道院，道院在水中央，落霞孤鹜，空明澄澈。由“咕咯”不平走向心静如水，道家的智慧真是无处不在。

“物华天宝日，人杰地灵时。”黎里最吸人眼球的桥当数镇东青龙桥。此桥始建于明成化十八年（1482），清乾隆、道光年间两度重修。桥为独拱，取优弧形，态如旭日初升，势似蛟龙出水。桥长14米，矢高3.8米，上下各有15个台阶。桥身两侧嵌武康石龙头各两个，东西吞吐，气贯黎川。桥身大部分为青石，桥栏为花岗石，桥面望柱雕饰覆莲。青龙桥有气势，其桥联有两（段首所引即其一），均大气磅礴。遗憾的是北岸增造河阶，另一桥联的尾字被掩埋。20世纪90年代，我在桥畔的黎里中学教书。桥下流水汤汤，舟楫往来。夏秋时节常有摄制组或艺校师生逡巡两岸，或摄影，或写生。今据有关资料录全另一桥联：“长虹高挂千门月，巨锁遥连万顷云。”

青龙桥不远处有道南桥，俗称“放生桥”，亦一肖鬼独拱桥，且最有味。桥长17.3米，矢高3.9米。东西走向，傍市河，跨市河分汊南港河。道南桥之伟，一在其



青龙桥



道南桥



清风桥

高，二在其奇。在通常镌刻桥联处，道南桥饮水思源、不忘初心，工整镌刻上如是“史记联语”：“康熙五十一年里人陈永年捐建，光绪二十有三年阖镇士民重建。”桥拱临水处，置一石碑曰“放生桥”，石与水平，唤鱼鳖知？桥栏两侧镌“双龙抢珠”图，清晰生动一如当初；桥面中心石，饰“五蝠捧寿”图案，仅一平方米，而桥高如许，奇哉？放生，乃佛家善举百姓善事。黎川另辟放生河，位老镇西郊，荫子积德，其上有“子来桥”，桥基今犹存镌刻“放生官河”字样。

“黎川”行至镇西栅突改为南北向，斩钉截铁写一“丁”字。由此衍生出一条不为人关注的横街。然僻静处亦多奇桥。清风桥，其一也。此桥又名青枫桥，俗呼新丰桥，古名普宁桥。各个名称各有说法，足以引人浮想联翩。这是“有故事的桥”，据说系出家子弟为报答小时落水救命之恩所捐建。梁式三孔，初建年代无考，明时重建，清时重修。现存之桥为民国十九年(1930)修缮。长17.1米，宽2.7米，高3.3米。清风桥大有明式家具“骨感”气质，桥柱桥面均由长石条支持，柱一并5长石条，桥面一并5长石条，洗炼质朴，无与伦比。桥栏现用青砖砌实。遥念当初，三五之夜，登桥望月，则天地悠悠，星几可摘？清风桥两面有联，其一曰：“清秀一川星可望，风高千古月分明。”另一为：“庚午重逢悦新盛，仲秋载造乐丰盈。”

清风桥不远处，为望恩桥。无论造型、气势与史载，均与黎里“最大桥”青龙桥并举。可惜，地利不佳，偏僻不说，最要命的是让一座带有“文革”并“改革”背景的“振黎”水泥桥完全遮挡了风水。想当初，单拱的望恩桥，不但石拱特高，而且上建双亭(故俗称“亭子桥”)，桥亭小憩，清风明月；桥心北眺，观寺在望(一为近处袈湖道院，一为不远处易作粮库的城隍庙、罗汉寺)。望恩



望恩桥

桥绝对是一座入史入画的桥，拱圈用武康石(宋代桥料典范)，桥身杂用青石(元、明桥料范本)、花岗石(清代桥料标本)。这是“有印记的桥”，与道院息息相关，桥拱圈嵌有莲花图案石碑，可见一斑。望恩桥初建于明嘉靖五年(1526)，与“叽咯桥”一样亦由道士捐建。明、清三度重修。桥长21.6米，桥孔跨径7.4米，高4.1米，为体验，我数了一下，上下各22级石阶。桥西立有“重建万善望恩桥记”石碑一块，惜已断截，字迹湮灭无从辨识。

川不激，桥不躁。若论险峻，则为迎祥桥。此桥位



迎祥桥



进登桥



梯云桥

市河东段,为梁式三孔,明正统六年(1441)始建,清两度重建。桥长18.4米,中孔跨径4.7米,高3.3米。桥柱由条石壁立而成,给人奇瘦之感,甬说桥梁,就是桥阶也由整石纵搁凿琢而成——两长石密凿7个台阶,堪称“绝无仅有”。雪后过桥,两股不免微颤。桥瘦,桥险,然其桥联却春光融融:“日色照临迎百福,风光会合集千祥”;另一联为“东西递接川流水,南北常通行旅人”。迎祥桥俗呼汝家桥,桥下原有汝家兄弟开的面馆,大铁锅下面,现炒虾仁腰花浇头,盛在海碗中,那份鲜爽,渗入胃底。

有险必有稳。黎川众桥,最儒雅、最敦厚、也最典范处该数梯云、进登,几可谓孪生。两桥对峙,均为清代梁式单孔,花岗石砌置。然桥墩敦实,骑水而筑。为防水冲,墩间辟一小小方孔。如此造型,既科学合理,又美观大方。两桥坐落市河中段,巧中求稳,可是劝喻世人平淡处世?而“梯云”“进登”的口彩又不免激发世人一如既往,向往“高中”“登科”。桥很中庸,也很睿智。进登桥俗称夏家桥,桥北堍人家祖传卖“老虎豆”,用的是本地小蚕豆,口感紧致,小家碧玉般。古镇改造,“老虎豆”人家搬迁了,“冯记油墩”进驻了。这也是与时俱进。须知,油墩是黎里极具招牌的糕点,金灿灿,香喷喷,咬一口鲜糯无极限。吴江美食节上,现余现卖的黎里油墩摊位前,引人注目排起了长队。

梯云桥俗称唐桥,计划经济年代桥北堍为影剧院,现重修“迎恩坊”并新建“黎里古镇展示馆”。桥初建无考,桥额镌“重建梯云桥”,落款“光绪甲午年重建”。此甲午年,为光绪二十年(1894)。桥长17.4米,桥墩两侧各建一泄水孔。桥北堍为双落水坡,5级石阶接落水平台,平台东西各11级石阶;南堍是单落水坡,13级石阶。进登桥,初建无考,制式与重建年代与梯云桥如出一辙。

桥长19.6米,桥墩两侧各建一泄水孔。桥南北两堍均为双落水坡,南落水平台东西各有5级石阶,北落水平台东西各有9级石阶。

黎里古有“黎川八景”之说,杰出之景无不与桥关联。“揽桥残雪”,指的是站在镇东郊似弓的揽桥上看隆冬时节乡村田野“白茫茫一片真干净”;而“玛瑙春游”,则是喻三春之际踏镇西郊玛瑙三拱桥念“春在溪头荠菜花”。可惜的是这两座桥都因紧跟时代步伐,应“现代化”之需而被“格式化”,改造成了普普通通的水泥大桥。镇东栅原有明代所建的单孔石桥“太平桥”,“文革”间更名为“东风桥”,推倒重建为双曲水泥拱桥。今录桥联以志:“西北珠渊涵福地,东南宝阁峙文峰。”珠渊、宝阁,指代桥附近的名胜积珠潭和中立阁(俗称八角亭)。镇西南方有一单孔石拱桥,名“万隆桥”,阅尽沧桑,保存完好。桥宏伟,桥联气势不凡。一曰:“越角吴根云横跨,左萦右带水交流。”一曰:“水流直达黎兼盛,界划始分浙与苏。”此桥所在处为苏浙交界,黎里与盛泽接壤。

旧时黎里也有“走三桥”风俗。同邑老先生鲍家琚有记述,录此,助兴:“黎里有俚俗,大凡嫁女要走‘老三桥’。一走‘子来桥’喜得贵子,二走‘鲍家桥’抱抱子孙,三走‘接贵桥’荣华富贵。‘T’字形市河,三桥分跨三岸,相映成趣,让人眷恋。‘早生贵子,哼唷!子来桥呀,哼唷!’‘要抱孙子,哼唷!鲍家桥呀,哼唷!’‘连中三元,哼唷!接贵桥呀,哼唷!’古代造桥打桩唱夯歌,一人主唱,众人合唱。我引录有关歌词,佐证黎里风情。”

世事变迁,黎里一度被并入“汾湖镇”。2012年,历史悠久的黎里再度争回了历史名镇的荣耀。古镇开发,日新月异,沉睡于典故中的古桥由此也迎来了新生。市河上的数十座古桥得到很好的保护,250来颗缆船石(半数雕有纹饰,最具代表性的为如意、定胜、瓶生三戟“平



揽胜桥

升三级”等),更为一脉流水增添了珍珠般的人文光彩。2014年国庆节,笔者回乡,“唤回乡愁”的老街已是游人穿梭、灯光闪烁。堪称意外惊喜,则是打造了古镇东入口,再造了一座壮观无比的“揽胜桥”——廊桥形象,皇家气象。不能断定,这样的壮举能否再现“揽桥残雪”的诗意,但有一点,野草茂盛的原生态保存可能还能唤回遥远而亲切的记忆。2017年春节,再回古镇一转,老街已全面开发。弄堂、廊棚、石驳岸,记忆随时光唤醒。市河中心“黎新桥”边的“南社通讯旧址”坦然再现了,清代乾隆年间工部尚书周元理所建“周官傅祠”旁的梁式三孔“大陵桥”也意外修复了。流水脉脉,一脉相承的是人文。脉通古今,桥贯四方。但愿三里黎川迎时代风云,再谱风流篇章。

(下)

黎里古镇似乎是从中街(古称中市)进入的。这中街有个很特别的名称,叫況泾弄。1970年代末,我十来岁光景,适逢“评《水浒》批宋江”,无端觉得这“況泾”两字有来历,一定与水或水泊有关。但怎么就叫作“弄”了呢?

古镇的“弄”极多,林林总总逾百条。且多为“暗弄”,窄窄的、长长的、幽幽的。炎夏正午穿行,也是暗暗的、凉凉的。況泾弄坦坦荡荡,为交通要道,过太浦河径直往南行,犹记一座庙楼一样的建筑镇于“弄”口,有如照壁,绕过,宣告正式入市。

“況”,水边也。2018年春节回古镇,发现“況泾弄”南端靠市河处挖了一段百来米长的小河,迷你点缀状。琢磨之下,谜底朦胧揭开。原来,況泾弄真的与水、水泊有关,还真的是一条弄。据老黎里人介绍,此处原有一



鼎新桥

条贯通市河与外荡的“箭泾”,仅容一舟通过;小河西侧为供行人出入的一条明弄,宽六尺许,自然就叫“況泾弄”,也叫況泾街。

新挖的街心小河,当得起“箭泾”之称,然不再贯通,不免遗憾。倒是“箭泾”之上新现的石桥,还原一分雅韵。一桥朴实无华,石板平铺其上,名“彬板桥”;一桥较古典,台座,梁式,名“登瀛桥”,1960年代(我出生的年代)況泾河未填平前,此桥镇于河口,俗呼即为“況泾桥”。

黎川三里,流水脉脉,河上古桥比比皆是。如果说



箭泾之上彬板桥

“浒泾”是黎里古镇的横切导入,那么穿镇而过的东西市河“黎川三里”绝对是古镇的一条“龙脉”。龙首在东,有青龙桥引领;龙尾在西,有明月桥辉映;正中则为鼎新桥。鼎新桥与登瀛桥呈直角毗连,类陈逸飞画笔下的“双桥”。此两桥而今同时复元,当属有缘。我的记忆中,自然不会有登瀛桥,而鼎新桥则革命化唤作“黎新桥”,改造成平平如也的水泥桥。改革开放初年,黎新桥下岸有一储蓄所,母亲首次带领少年的我储蓄了百元,印象深刻。

新重建的鼎新桥,移到了登瀛桥西上首,花岗岩,独拱。上下台阶各20级,中心桥面石饰八瓣水游纹。站在桥上看风景,东西市河,南北通衢,尽在眼前。曾经指点江山的南社通讯处,手指一点,即是。目过数桥,南社巨子柳亚子先生的纪念馆,同样清晰可见。小桥流水人家的背景中,鼎新桥显得高大而沉稳,两侧桥联楷书,联语固有,东侧为:“高映日华,香逢枸子;中分水色,秀挹梨花。”西侧为:“蚁聚千家,共承鼎业;鲈乡四季,屡庆丰年。”黎里古为梨花里(旧传村南多梨花),也有认证为蠡里(传范蠡大夫曾居此),成镇当在南宋时期,地方志载:“淳熙时工部侍郎赵磻老居黎里,而黎里之名始著。”古镇东今存有纪念赵磻老的东圣堂,可作佐证。

让人惊诧者当重建明月桥,俗称杨家桥。桥名之雅



明月桥

俗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桥型与桥之所位。对此桥,我的印象格外“高大上”。一是因为它位东西市河黎川西栅,同时又奇迹般中端开启西栅之南北次市河,地位一如东西主市河之上的鼎新桥。1980年,我在镇西郊的黎里公社中学读初三,明月桥早夷平。当时因为市河流向关系,梦中与白天均辨不清东西南北。一直要从学校走到转折点“明月桥”方位,才豁然开朗,确凿无疑。

再往前追溯,我的大龄姑姑解放之际嫁往镇上,住在这横市河之一端。姑姑家附近,塘广树野,乱岗荒漠,但多村桥。某夜宿姑姑家,值春雨时汛,忽闻惊天轰鸣,原来久旷的郊外石桥坍塌了。此桥无名,单薄,石拱。

由梦而明,从姑姑家返回,重入闹市,必得走上明月桥。明月桥可能是文人的梦吟,在我则是实实在在的“登高”。此桥石质优拱,在逼仄的参照体系中,真有登云之恍惚。因而,每每至此,我必肃然并向往。桥一过,有阁重檐,一家桐油店,一家大饼店。可能是小资情调油然而生,我总觉得那桥是西端进入市镇的重要标志。读初三时,“明月”不再,桐油店的身价早被大饼店置换。走过改成钢筋水泥的无名平桥,若有所失。

明月桥好高爽,往北就是清风桥,就是望恩桥,就是在水一方的禊湖道院,还有在水一方之旁的罗汉寺——南宋孝宗皇帝赐额“罗汉讲寺”,那是与杭州灵岩寺相提并论的广大寺庙!我成家时的居处邻此。禊湖道院而今焕然一新,发声不平的“咕咯桥”因为开放而格外包容。而罗汉寺塑像全毁且移作国家粮库,想来恢复遥遥无期。但那里同样有抹不去的集体记忆,巢谷,购油,亢奋又焦躁。

2017年方志出版社出版的《黎里镇志》古桥栏中未载明月桥。本土文史专家李海珉先生述:明月桥建于元大德二年(1298),是黎里第二座石桥,有历史故事,没



登瀛桥

有桥联。

2018年春节前后的黎里新桥大致如此。稍推前,在我未及记录的黎川桥中,称谓“大陵桥”者不能不提及,此为黎里有史记载的第一座石桥,始建于南宋咸淳元年(1265),明成化、清乾隆年间分别重别。梁式三孔,两端均为双落水台阶,“铺张”的背后必定是繁华。大陵桥之名,不免有些附庸,让人无端联想起大禹治水,联想起伟岸高大。事实上是为纪念附近的一土丘——多水无山的吴江,难得“大陵”!农人无暇风雅,也不买账,于是就叫庙桥。进香有庙,有庙必有桥。黎里的“庙桥”名副其实,一桥挑两庙。北有全真道院,俗称大庙;南有财神庙,俗称小庙。现今北面忽现一戏台,前树镌刻有“癸酉至顺闰三月吉日”等字样的枳星石柱(癸酉至顺为元顺帝元统元年,公元1333年)。时空穿越,暮忆计划经济时代代表身份的居民粮油站即在此,好不荣耀。还是叫庙桥吧,但改造后的庙桥总有一丝不谐——桥联今拟且磨底阳文电脑体行书,略显轻飘。大陵桥南岸的庙桥弄,我以为是最诗意的石板弄,如果下雨,如果有一柄油纸伞,戴望舒的《雨巷》说不定就在此处演绎。

庙桥的石板弄实在太美了。我走读黎里公社中学那年,每周都要刻意走上几回。这弄是少有的明弄(朝天弄),敞亮,宽广。下雨,雨落在石板上,马上渗入阴沟,阴沟在石板下,几乎与石板同宽;不下雨,阳光打在石板上,石板下的空气几乎以同样的清新回应。那时的我十四五岁,界乎少年青年间,不爱走阴晦漫长的暗弄,似乎也不喜热闹的浒泾弄,但就爱走这一条庙桥弄。那样清亮的紫金石板、金山石板啊!

庙桥弄东侧有好大一座祠庙,而今才知是周公傅祠。当年,我那镇上姑姑的孩子即我的表兄弟们都于此上学。我跟着去过几次,只觉得那操场好大,那高台好

高。而今,名正言顺复原,反觉庄重而疏远。祠堂深深,共有六进。主人周元理为清乾隆年间工部尚书,

终“乞骸骨”荣归,旋歿。乾隆帝赐诗碑,委派江苏布政司代为致祭,哀荣备极。皇上祭祀臣下的御碑,非同一般,苏州地区仅此一座。周公傅祠集“皇祭”“家祭”与义学祭孔“三祭合一”,亦属江南仅有。河对面的紫阳观,系我味蕾乡愁,今时尚化作咖啡店一族,奈何。

“吴江三十里,地号梨花村。我似捕鱼翁,来问桃花津。”这是清乾隆年间诗人袁枚到访黎里时所做的诗。诗中还有这样的描述:“长廊三里覆”“家家棹小舟”,画龙点睛,简直把黎里古镇的风貌写绝了。当年袁大才子所访的对象是徐达源,徐达源亦为一方名士,号山民,居于镇西,著有《黎里志》等文集。徐氏《黎里志》写得极精彩,如下一段文字堪称“黎川概要”：“本镇东西距三里半,周八里余。民居稠密,瓦屋鳞次,沿街有廊,不需雨具。镇之中曰中市,有上下两岸、东西南北四栅。”

水脉未改,桥韵犹存。黎里市河体系,东西为主干,长1980米,西栅头南北为支流,长约500米。市河体系中现存石桥盘点如下。由东到西:梅兰桥(待重建梁式)、青龙桥(原样拱形)、迎祥桥(今修缮梁式)、道南桥(原样拱形)、梯云桥(原样梁式)、进登桥(原样梁式)、登瀛桥(今重建梁式)、鼎新桥(今重建拱形)、大陵桥(今修复梁式)。由南到北:明月桥(今重建梁式)、清风桥(今修缮梁式)、望恩桥(原样拱形)、秋楔桥(楔湖中,原样梁式)。

桥上行人,河中行舟。值得一观的还有不起眼的缆船石,实用而审美。那是桥与河绽放的花蕾,也是行与驻缔结的契约,一朵朵,一方方,嵌于河沿上。玲珑别致,寓意吉祥,通俗而形象的叫法为“象鼻眼”。黎川风流,如浪花,随处可见一斑,妙乎?



大陵桥



黎川“双桥”



安定书院 顾祥忠摄

泰州安定书院的历史变迁

◎ 霍云峰

北宋是泰州文教发展的一个辉煌时期,开创局面的关键人物是胡瑗。胡瑗,著名教育家,世称“安定先生”。因其祖父胡修在泰州为官,遂举家南迁。他自幼敏而好学,通晓五经,又在外游历苦读,终成饱学之士。仁宗天圣年间,胡瑗先生带着一身学问回到泰州,在城内华佗庙旁边的经武祠设馆讲学。正是这段讲学经历,使安定先生对教学有了自己的思考和理念,为后来开创在中国教育发展史上产生深远影响的“苏湖教法”奠定了基础。安定先生一生著述颇丰,有《易传》《论语说》《尚书会解》《武学规矩》等百余卷传世,开创宋代理学先河,所以黄宗羲《宋元学案》将其列为宋代学术第一人,卷首即《安定学案》。宋神宗在他的画像上亲提赞辞:“诚斯文之模范,为后世之钦崇。”范仲淹称赞他为“孔孟衣钵,苏湖领袖”;王安石尊之为“天下豪杰魁,事业望孔孟”;苏轼推之为“章为万世程”;司马光颂之为“苏湖之教,造士有术”。胡瑗倍受赞誉。南宋宝庆二年(1226),泰州知州陈垓在胡瑗先生讲学的地方设立书院,名“安定讲堂”,来纪念先生治学教之功。《泰州志》记载了这一时期的盛况:“选收生徒二十人肄业,聘博学者讲学,定期会讲。每峰会讲期,知州亲临讲堂,主持讲学行礼仪。”安定书院成为泰州文教聚会之所。

明代,在中国思想史上出现一个以泰州命名的学术

流派——泰州学派。泰州学派的创立者是著名的平民哲学家王艮。他出生于泰州安丰场盐户家庭,是王守仁弟子,却不拘泥于阳明心学,主张“百姓日用即道理”的观点,重视平民教育,强调后天学习的重要性。嘉靖五年(1526),王艮应泰州知府王瑶湖之聘,主讲于安定书院。求学者纷至沓来,弟子数百人,以平民百姓居多,但亦不乏徐阶、颜钧、王栋、王襞、罗汝芳、何心隐这样名宦高士。在讲学上也别出心裁,按《礼记》制着深衣、戴五常冠,“行则规园方矩,坐则焚香默识”。可以说,王艮的教育理念是胡瑗先生“明体达用”思想的新发展。嘉靖十七年(1528),巡按直隶、监察御史杨瞻到泰州巡视,在安定书院中祀安定先生,并立《宋安定胡先生讲学故址碑》《安定祠》碑。嘉靖四十四年(1565),督学耿定向在安定书院增祀王艮。于是形成书院东讲堂祀胡瑗,西讲堂祀王艮的格局。晚明战乱,社会动荡,安定书院亦遭荒废。

清代,因为科举的兴盛,书院发展进入鼎盛时期。安定书院也受到重视,几经修缮。康熙二十七年前后,泰州知州施世纶重修安定书院。乾隆五年(1740),知州段元文重新修葺院舍,并改名“胡公书院”,专祀安定先生。嘉庆二年,两淮盐运使曾慎捐资数千金扩建“胡公书院”,“建东西斋舍各两进,计十六间,另书舍一进,亭子一座,院内广植花木”,安定书院的格局渐渐形成。道



光元年,知州赵钺又率士绅捐巨资扩建书院,“建牌坊二座”,即“振兴文教”“乐育英才”两牌坊,大门、二门,闲雅堂、会心堂、四至堂,奏雅亭、挾亭,东西斋舍各二进,规模宏敞,招生童 120 名。光绪五年(1879),知州刘汝贤率官绅集资扩建书院,房屋增至 45 间,规模为历史之最。光绪二十八年,知州侯绍瀛在胡公书院旧址创建泰州学堂,对旧址进行改造,增建新房至 85 间,“自春迄冬,凡十阅月,乃获竣事”,侯绍瀛亲自撰写《泰州新建学堂碑记》,讲述建学不易,勉励诸生:“既生安定之乡,复亲炙定安于堂”,应“好学深思,上希先生高风”,“以振先圣不传之绝学”。光绪三十二年,科举废止,泰州知州张浚改泰州学堂为泰州中学堂,校址仍设于胡公书院,直至民国元年(1912),泰州中学堂停办。

民国初年,科举已废,学校兴起。泰州近代教育体制在此背景下开始建立和发展起来。民国七年,马锡纯、袁祖成、杭斌等五人发起,在泰州中学堂原址上创办了泰县私立淮东中学,占地约十六亩,东西斋舍、礼堂、杂屋五十余间。由杭斌出任校长,泰县每年补助学校 1000 元。民国十二年,泰县县议会致函县公署停止了经费补助,杭斌辞去校长职务,由袁祖成继任校长,学校更名为江苏省代用第一中学,分高中部、初中部,成为完全中学。为了筹措经费,袁祖成以私人名义借贷甚至出售田产以维持办学,后来争取到省里每年 4000 元经费补助。建校四年后,即民国十六年,四月六日,泰州城遭遇军阀孙传芳所属五省联军攻占,烧杀抢掠,损失惨重。袁祖成死难,校舍、仪器、书籍等遭到极大破坏,学校不得不停办。五省联军退离后,省代用第一中学教务主任陈兆琛等人组成校董会,在省代用第一中学原校址上筹办私立时敏中学,校名取自《论语》中的两句:“学而时习之”“敏而好学”。民国十七年六月,经中央大学核准,泰县私立时敏中学正式成立,陈兆琛为校长,仍分高、初中两部。民国三十年,泰县县城被日军侵占,中等学校相继迁徙或停办,时敏中学仍留在城内坚持教学。抗战胜利后,泰州各中等学校先后复校,泰县各界争请教育厅设省立泰州中学,经苏后青奔走呼吁,于民国三十六年,由江苏省政府下令并出资,私立时敏中学迁至平民工艺厂旧址,原

安定书院旧址另建省立泰州中学。

新中国成立后,泰州市政府对全市中学进行整顿,民国三十八年(1949),改省立泰州中学为泰州地区泰州中学,合并县立泰州初级中学,为分部。私立时敏中学、私立扬子江中学、私立泰县淮南中学 3 所私立中学合并建立泰州私立联合中学,亦分高中部、初中部。1951 年 1 月,泰州中学更名为苏北泰州中学。1952 年 2 月,私立联合中学的高中部并入苏北泰州中学。1953 年,恢复江苏省建制后,苏北泰州中学被定为省属中学,并改名为江苏省泰州中学。1970 年改为泰州市第一中学。1981 年,泰州市成立中等教育结构改革委员会,对全市中学的结构比例作全局性调整。泰州市第一中再次被定为省属重点中学,恢复江苏省泰州中学校名,校训“明体达用”,仍源于胡瑗的教育思想。

从北宋中期至今,在安定书院旧址上先后兴办了泰

州学堂、泰州中学堂、私立淮东中学、江苏省立代用第一中学、私立时敏中学、江苏省泰州中学、省泰中附属初中等,这里一直是泰州有名的文化传习之所、教育中心,办学不断。而安定书院优良的教育传统、治学理念,在省泰州中学得到发扬光大,人才辈出,胡锦涛主席当年曾就读于此校。



现如今,省泰州中学内西南角有一青砖二层小楼,就是胡主席当年读书时的教室,座位依然。

岁月悠悠,安定先生虽已驾鹤千年,但安定书院历经沧桑,几番沉浮,依然伫立。现在的书院,前后两进,面阔三间,单檐歇山,翘角飞檐,黛瓦红廊,掩映在绿树翠竹之间,古朴庄重,沉静肃穆。正门上悬原江苏省文联主席李进手书“安定书院”匾,有雕刻祥云凤凰与麒麟花纹的石鼓,门联为“精忠上仰将军岳,正学肯瞻教授胡”。厅内展出的是安定先生图文资料。书院右前方有一株银杏古树,相传为安定先生手植,寓意“常青”。历经千年风雨,依旧枝干遒劲,根深叶茂,见证着千年文化教育的传承。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安定书院、省泰州中学,这便是泰州人心目中的文教圣地,共同承负的先贤文脉。古老学堂的悠长韵味同与时俱进的现代教育一脉相承,源远流长。

半间书屋传四世 千卷书香润长淮

——陈畏人、陈慎侗父子藏书整理手记

◎ 侯富芳



陈畏人(1883 ~ 1970),本姓史,名味余。5岁时出继姨父陈继元,遂改名宗书,字鉴庭,号畏人,别号半间书屋主人、绿雪庵主、十石老人、打线巷南一老民等。淮安市淮安人。幼年时曾读私塾,后习商业。但他喜爱读书,经常向当时淮安著名学者段朝端、徐嘉等请教。并十分喜爱藏书、抄书。

陈慎侗(1909 ~ 2010),陈畏人之子,字岳山,少从父经营烟店,解放后任教于淮安各小学。

2012年4月、2016年6月,藏书家陈畏人、陈慎侗父子的遗存图书,由其后人陈廷顺先生分两批捐赠淮阴师范学院图书馆珍藏。笔者作为淮阴师范学院图书馆工作人员,有幸参与这批珍贵古籍接收及初步整理工作:两批图书共计700余部2000余册。作为藏书家的陈畏人、陈慎侗父子除了在书上钤上藏书印记外,还在书中留下了许多弥足珍贵的批校题跋信息。这些文字充分展现出如下内容:一是陈氏父子对乡邦文献的珍视;二是证明他们不仅是藏书家,还是读书者、校书者;第三,陈氏父子珍爱图书,亲手修复了许多古籍;第四,父子二人还著书立说,记述淮地历史、风物,又是淮安乡邦文献的创作者。

故土情深

陈氏父子和许多藏书家一样,情系乡邦。曾从多种渠道搜集清代后期淮安府山阳县的潘德舆、鲁一同、丁晏、高延第、徐嘉和段朝端等6人资料,于1931年创制《淮山六君子遗像》图卷,装裱成长卷藏于家,后又将六君子遗像刻于砚背,旨在尊崇和传扬前人治学之风。并将自己的书斋命名为“咏六草堂”。在收藏图书方面,使命意识浓烈,十分注重地方文献的收藏。藏书中的地方文献包括两淮地方出版物、地方人士的著作以及论及两淮的著作等。除大量常见的淮地出版物之外,可资补充江澄波先生《江苏刻书》所述淮安地区公私刻书单位的就有“清河学署”“淮安鸿润书林”“勺湖渔墅”等等。

陈氏藏书中有许多是淮安地方文人的著作。不但收藏了历代著名的作家如宋代徐积《节孝先生集》、清代李锐《读书杂述》等,淮安府旧辖山阳、沐阳、清河、淮阴诸县作家的著作,悉数收藏。它如甘泉、丹徒、宝应等地方人士的著作,亦在收藏之列。这些图书,从版本上可分为刻本、铅印本,甚至抄本、稿本;从内容上讲则涉及名人试帖、硃卷、诗、文,以及其它各体著作。

方志如《山阳县志》《山阳志遗》《王家营志》等等;记述当地掌故、名胜古迹的有《淮郡典故》《山阳河下园亭记》《淮阴古迹附安东古迹》《咏淮纪略》等等;谱系著作有《山阳潘氏统宗谱十二卷附续修世系》等;教育史方面的著作有《段笏林先生加注淮山肄雅录》《南清河肄雅录》等等,都是极为珍贵的地方史志资料。

上述种种,无疑对淮安地方经济、文化、历史的研究,保存了许多珍贵资料。

藏书价值

此批图书中,不乏珍稀之本。其版本价值、文献价值十分巨大。

据粗略统计,明版计4种170册,重要的如《资治通鉴》《宋元通鉴》《南史》《南华真经评注》等;清代乾隆以前的刻本大约有9种近90册,如康熙间天黎阁所刻《春秋指掌》、敦本堂所刻《节孝先生集》等堪为代表。

此批图书中有稿本约65种67册、抄本约77种89册。这些稿抄本可补《江苏艺文志·淮阴卷》版本140余项。其中原著录“佚”或未见之书40余种;因著作存



在而增补淮上作家 10 余人,足见其珍贵。如潘德舆、鲁一同、丁晏、段朝端等名士的多种不见于史乘的著作,皆赖保存。它如不见史志记载的清代淮上文入程步荣次子程锡珩(字小桥,号卧轩,又号六逍遥)之著作稿本就达如下七种之多:《卧闲轩诗抄》《卧闲轩诗集》《卧闲轩词录》《借巢小集不分卷》《海上游子吟不分卷》《丙申年吟草不分卷》《彭城行草不分卷》。

名家抄校本如罗振玉居淮之时为毛乃庸所校写著作如《十国杂事诗不分卷》等数种,弥足珍贵。

藏书来源

为了丰富藏书,陈畏人父子采取了许多办法。从陈氏父子留在书上的题跋识语来看,陈氏父子的藏书来源约有以下几种方式:

大部来自于书肆购买。和许多藏书家一样,陈畏人喜用笔墨在藏书记载购书的时间与地点。如《古文摘义》封面题曰“庚辰四月初旬买于淮安市场,计四册。陈畏人记”;《江邨消夏录》封面题曰“戊子祀灶后一日,购于淮阴旧书摊市。畏人”;《墨缘汇观》封面则题曰“戊子祀灶次日,买诸淮阴旧县署东故货摊市。老畏记”;《阳羨茗壶系》封面题曰“戊寅七月下浣买钞于清江浦邸店”。

可见,当时两淮及清江浦的旧书摊,是陈畏人常去之地。1998 年出版的《淮安市志》说他“在清江浦经营谦益烟店。他的经营所得,除生活必要开支外,其余均用来购买、搜集两淮文献和前贤诗文墨迹、书画”。

清代康熙年间敦本堂所刻《节孝先生集》,为淮人邱如升、邱迈、邱迥重新编次校定的宋代淮人徐积别集。此书于道光十八年(1838)为淮上名士潘德舆购得。书中有潘氏“道光戊戌闰四月郡中买”题识,并钤有“四农”“四农藏书”二印。藏书章为证。世事沧桑,解放后,此书出现在上海古籍书店中。陈畏人先生于 1964 年用

10 元人民币购回淮安。有上海古籍书店当年出具的发票及给陈畏人先生的回函为证,封面还钤有“子孙宝之”印。

抄书是中国古代藏书家一直沿用的丰富藏书的一种重要方式,陈氏父子亦是如此。陈畏人手抄两淮存世孤本或刊刻难觅之书近百种,其藏书中有不少是他们亲笔所抄。其中的重中之重,又在乡邦文献,最有名的恐怕当数《秣陵秋》。陈美林先生《稿本秣陵秋传奇作者和创作时代考辨》文中指出南京图书馆与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各藏一部陈畏人钞本《秣陵秋》。而此次陈氏后人捐赠本馆的图书中,亦有一部。据相关专家研究确定,本馆所藏为校订本。这部成书于道光年间的传奇,“仿《桃花扇》之写法,以名士鱼甫卿与名妓王云仙的爱情故事为主线,反映了鸦片战争前夕江南地区的动荡形势与科场乱象,充满着极其深挚的兴亡之感,具有催人肺腑的艺术感染力。”(朱德慈《校定本传奇〈秣陵秋〉的作者、校者、钞者考略》,中国曲学研究 2014 年第 3 辑)另外,当时淮安名家的著作,如潘德舆《养一斋酬世时文》、鲁一同《通甫外集诗存通甫诗外集又钞三钞》等鲜为人知的珍稀乡邦文献著作,均赖陈氏父子抄录才得以存世。陈畏人还专门请时人杜元杰等人帮他抄书。如《节钞佩言》内封,陈畏人题识曰“斯册乃数年前倩杜生元杰节录”,《曾文正家书别钞四卷》亦是杜氏所抄。据前述陈美林载,藏于南京图书馆的陈氏抄本《秣陵秋》一书题有“戊辰涂月,由邵叔武之子手购得徐鹤孙所撰《秣陵秋传奇》,上有吴温叟先生手笔改正。去秋倩董、沈二生录此副本,今又收拾而校对之。原册拟换通翁手评杜诗零册,未定也。庚午二月朔,畏人记。”

关于陈畏人抄书之功,其子陈慎侗在张养重《古调堂集》封面总结道“此册先君畏人公所抄,有段笏林先生考注。原本流失不可复得,赖先君有此抄本,保存淮之文献,功不可没。慎侗书衣”。

陈氏抄书的另一特色是十分重视文献的完整性。如陈畏人将《淮安河下园亭记续编》抄在《河下园亭记》

一書之上。并在封面上題曰：“半間書屋主人識。”又題曰：“附辛卯所鈔《河下園亭記續編》于眉端行間。時菊秋也。十石老人識。”

至于陳慎侗抄書，則其字跡之工整，用心之精，皆可從書中感受。其所抄書有《山陽河下園亭記補編》《和靖詩鈔不分卷》《影摹娑羅樹碑殘字》《北遼書八卷》等等，無不透出其承繼先人遺志，潛心學問、搜羅文獻的精神。

陳氏藏書中有一部分亦為他人所贈，這可以從藏書上陳畏人的識語上看出。如《南園吏隱詩存》封面題“淮陰王君慕易贈。畏人署”；《涌翠山房文集四卷詩集四卷》牌記頁題“甲子涂月段翁蔗叟贈予”；《南京保文堂書局書目民國十九年四月》封面題“庚午旧历四月七日托湯錦文索寄到。畏人記”等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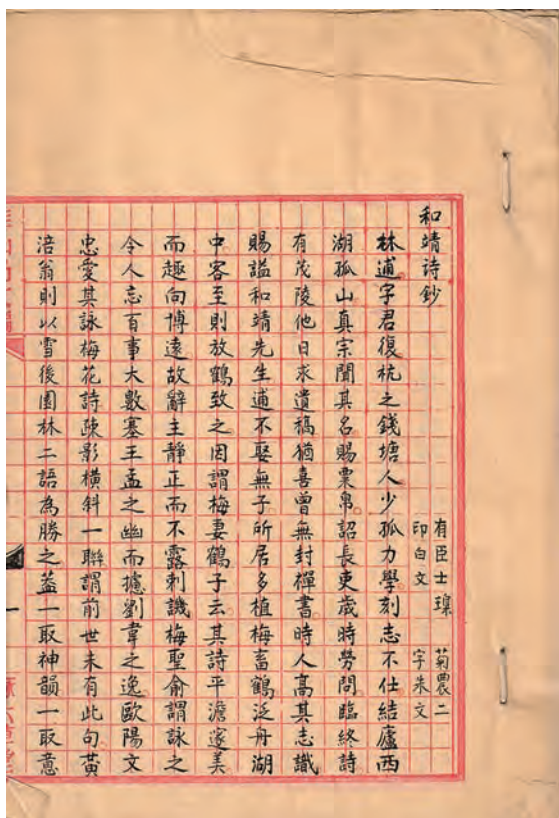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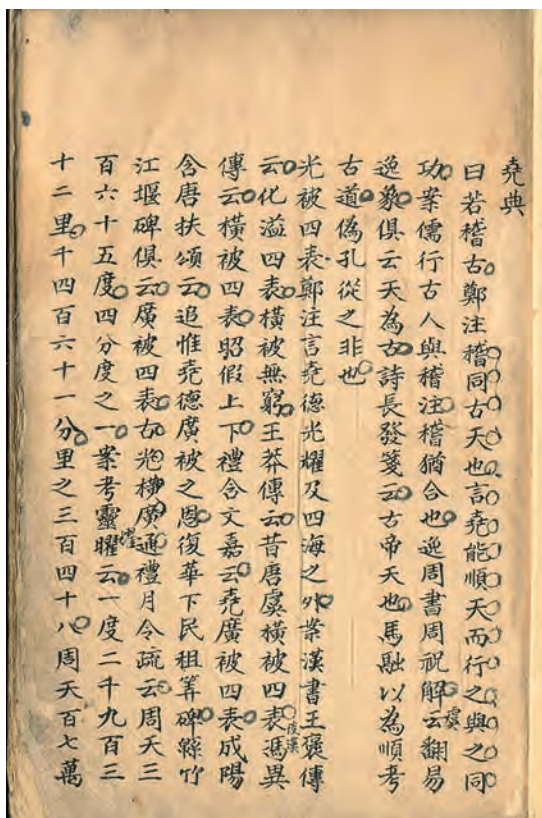
陳氏藏書中亦有部分為“以書易書”的方式從其他藏書家手中交換而得。如《南雷文約》封面題：“此書四卷分訂六冊，乃路山夫先生藏本。以他書從邵炎手易得。庚寅正月也。”旁有陳慎侗注“一九五〇年”等等。

讀書校書

陳氏父子熱心文獻搜求，但他們並不是只藏不讀的“藏書”家。陳畏人讀書痕迹亦留在諸多書上。如《節鈔佩言》內封，陳畏人題識曰：“斯冊乃數年前倩杜生元

杰節錄潘養一先生親筆《佩言》。資余不時溫習，間加硃圈點。然仍多亥豕零落顛倒之處，未能一一整厘為憾。己巳辜月初旬，畏人書于江西瑞昌武茨林果行次。”可見陳氏和許多傳統讀書人一樣，在外出旅行時也要攜帶圖書，讀書之事不敢稍停。到了晚年，陳畏人勤奮讀書的情況在書的識語中也時有體現。如《歷代畫史匯傳》封面題：“癸酉七月十七日淮安咏六草堂主人書。書面姓氏均杜生所寫，共卷首卷目七十二卷，又附錄二卷，分釘十二本。惜系油光紙，讀之久則目瘁而花，不敢多讀，亦不能多讀也。畏人手記。”

陳慎侗讀書亦勤。同樣可從他在書中的題跋識語中得到證明。如《南京保文堂書局書目民國十九年四月》封面題“此書排字工不認真，不少錯字待正。侗，一九八四·十·十三·”。又如《老子証義》書末題：“一九九二年六月二日點讀完 三十三頁以下須加紙托裱。慎侗記。”《景德鎮陶錄》書末題：“此冊多年來未暇一讀，今以三日點讀一過，不免有誤，容再讀時正之。一九九三年元月三十一日陳慎侗記。”《文選》一書上有陳慎侗親筆校語多處，書末曰：“一九七八年八月以于光華評注昭明文選校補，侗。”《敦夙好齋詩初編》卷十二末題：“一九九七年四月三日點讀竟。慎侗記。”等等。陳慎侗讀書的特点是邊讀邊校。許多經他讀過的圖書，都將史書或辭書中的作者小傳抄于書首等位置。



爱书补书

陈氏父子不仅藏书，亦和传统的藏书家一样，深谙爱书、补书之道。陈畏人看到图书受到虫害或其它损伤时，往往精心修复，并题字句以记录：

如《翰海》第四册末硃笔题曰：“此书为虫伤有年，今始全之，以便不时展阅。时乙未四月也。”《端溪砚史》封面：“八二叟陈史畏人重装。”陈畏人还有专门志其补书的印章。如《风俗通义》一书书签上题“但容先生底本，畏人修补”，且书末有钤有“鉴庭装潢”印。足见其补书、修书之事亦乃常事。陈畏人补书时对书首、书末损毁部分文字，往往从它书抄录补齐。对一些内容有缺憾的书也往往予以补充。

如《墨林今话》一书，全书十八卷，但全书各卷均无目录。陈畏人于每册书首将各卷目录补齐、重订。

陈慎侗继承其父爱书、补书的优良传统，亲手修复已经破损的古籍多部。有的受损图书上也留下他提醒需要修补的语句，如《老子证义》书

末：“一九九二年六月二日点读完 三十三页以下须加纸托裱。慎侗记。”《跬园诗钞》封面：“此书又有虫口，应注意晒书。慎侗一九八四年春节前。”还有一些图书则经他亲手修复，如《白石诗词集》书封面：“此诗词集是写刻本。惜为虫所蛀。诸家评论不全，原藏有石印本现已失去。经加衬纸粘糊，俾能久传于世。陈慎侗重装。一九七三年三月六日。诗词评以别本序钞，需得原本校正。侗。”《四忆堂诗集》封面题：“六卷二大册，合一册，《四忆堂诗集》。慎侗收拾重装。”之类，不胜枚举。

著书创作

陈畏人陈慎侗父子在大量收藏经籍图志的同时，也

进行一些编辑和创作，对淮安当地的文史研究留下了许多珍贵材料。

陈畏人的相关著作，有《两淮画友小识》《鲁一同先生简谱》《所知明清学者生卒年表》《淮山肄雅录集注》《淮山尚友编》《王小史绿荫堂诗集》《潘养一先生评陶诗》《潘养一先生读书记》等。此批图书中尚有其节抄厉鹗《樊榭山房集节录》、辑有《通父鲁先生手批集千家注杜诗目录》、选有《曾文正家书别钞四卷》、汇集《山阳诗征正集段潘两先生加注汇集》、摘录《北行日记不分卷养一斋诗话续不分卷》、撰著《淮安山阳任氏家谱》等等，极大地丰富了淮安地方文化的研究。

陈慎侗除了助其父亲完成一些著作之外，也独立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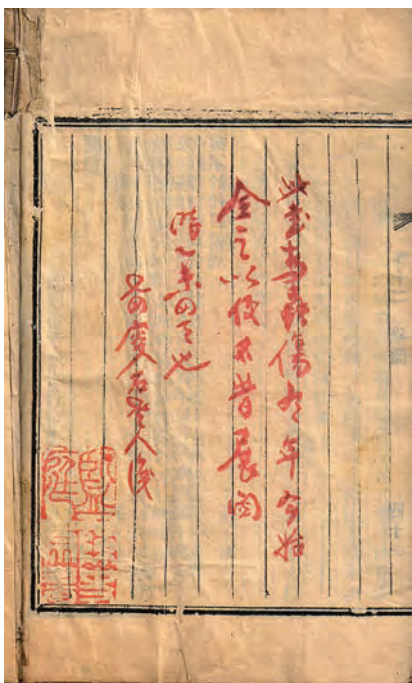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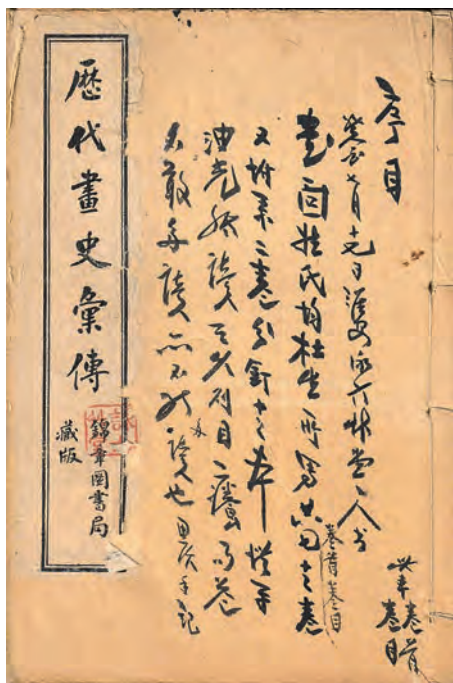
作了许多淮安近代历史名人的传记、年谱等。如他辑有《自怡轩对联集钞》，撰写了许多文人掌故事迹。如《清代学者任瑗》（《淮安文史资料》第17辑）、《清初学者周白民》（《淮安文史资料》第8辑）、《清末民初著名学者诗人段朝端段》（《淮安文史资料》第8辑）、《清田园诗人吴进》（《淮

安文史资料》第13辑）等等，为淮安近代文史的研究留下了宝贵的财富。

据笔者编目时所见，陈畏人藏书章多达二十余枚。如：“陈畏人”“坚庭”“坚庭葆存”“史三”“山阳陈史氏藏书”“宗书之印”“畏翁涉猎”“但畏人我欺”“畏人”“陈史宗书”“古山阳”“畏人之印”“车桥史氏”“曾在史鉴庭家”“淮安史氏鉴庭珍藏”“畏人心赏”等等。

可以说，淮安地方文史的相关内容，正是因为陈氏父子撰述记录才变得更加丰富和完整。

陈畏人别号“半间书屋”。半间书屋的千卷藏书走出四世私藏而归于公藏，书香长润两淮读书之人，必将更加充分发挥它在淮安文史研究中的作用。



美食家的摇篮 ——陆文夫与美食文化（十七）

◎ 高建国



小说《美食家》问世后，“美食家”一词，开始在中国流行；“朱自治”这个人物形象，从此出名。朱自治是苏州人。为什么在苏州，能诞生美食家？因为，苏州的美食文化，自古积淀深厚，是美食家成长的温室和摇篮。富足，是这座城市的特色，也是人们尽享美食的基础。“毗邻大海，襟带江湖”，是苏州的交通优势；“鱼米之乡，经济富庶”，是苏州的物质资源。谚语说，“苏湖熟，天下足。”范成大《吴郡志》称“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明清时期，苏州成了全国商业中心。诗人高启说：“财赋甲南州，词华并西京。”（高启《吴趋行》）就是概括苏州的经济文化地位。因为富有，苏州对国家的贡献也大，“东南财赋，姑苏最重。”（沈寓《治苏》）所以，生活在苏州的唐寅，这样描述家乡：“长洲茂苑古通津，风土清嘉百姓驯。小巷十家三酒店，豪门五日一尝新。市河到处堪摇橹，街巷通宵不绝人。四百万粮充岁办，供输何处似吴民。”（唐寅《姑苏杂咏》）在这样的环境中，产生几个美食家，应当不奇怪。小说《美食家》，也写到这种景象。本文从三个方面，来考察一下。

一、居家生活考究

美食与财富相关。家中富裕，吃穿住行便考究。比如居住环境。朱自治、孔碧霞的居所，就很一般。朱是西式洋房，孔是园林豪宅。在这样的房屋内生活，不会轻视饮食质量。我们参观一下。

西式洋房。小说第一章《吃喝小引》，这样介绍朱自治的住处：“这房子是二十年代末期的建筑，西式的。有纱门、纱窗和地毯，还有全套的卫生设备。晒台上有两个大水箱，水是用电泵从井里抽上来的。这座两层楼的小洋房坐落在一个大天井的后面，前面是一排六间的平房，门堂、厨房、马达间、贮藏室以及佣人的住所都在这里。”（陆文夫《美食家》）这种楼房，多为民国苏州上流社会的住宅，是“清末民初，在上海的影响下”出现的西式建筑，《苏州市志》称它们为“海式住宅”。结构特点是，“不采用立贴式木构造，一般用砖混柱承重。木架屋面，铺盖红色或黑青色平瓦，外墙为扁砌清水墙面，多数用水泥浆勾缝；层次多为一二层，少数为三层或假三层。”（陈晖主编《苏州市志》第一册）这样的住宅，反映了主人殷实的家境，也是朱自治，享受美味佳肴的物质条件。只可惜，朱自治并不珍惜它，更体会不到“家”的温馨。《美食家》说：“朱自治早出晚归……家在他的概念中仅仅是一张床铺，当他上铺的时候已经酒足饭饱，靠上枕头便打呼噜。”（陆文夫《美食家》）如此“豪宅”，都不放在眼里，可见他唯一的精神寄托，只有美食。朱

自治怎会成为这种人？原来，他是一个不差钱的“房屋资本家”，“我们这条巷子里的房屋差不多全是他的”（高小庭语）。而这些房产，又是不劳而获的财富。严格说，朱自治“连自家究竟有多少房屋，坐落在哪里，都是稀里糊涂的。他的父亲曾经是一个很精明的房地产商人，抗日战争之前在上海开房地产交易所，家住在上海，却在苏州买下了偌大的家私。抗日战争之初，一个炸弹落在他的家屋顶上，全家有一幸免，那就是朱自治——到苏州的外舅家来吃喜酒的。”这样的人，自然不懂惜财。民国苏州，不少男人外出赚钱，在家购置房产，期待叶落归根。他们的子孙，因为衣食无忧，也就变成了白相人。就像朱自治，成了好吃懒做的“美食家”。所以此人，拥有财富，却不爱财；舌尖兴趣，高于物质利益；享受美食，是他唯一的精神寄托。这也是不少苏州人，津津乐道的生存方式，精神大于物质。“吃”在朱自治这里，已成为精神化的对象。

石库门。小说第十一章《口福不浅》，这样写孔碧霞住处：“那两扇黑漆的大门终日紧闭着，门上有一条缝，一个眼。缝里投信件，眼里装有玻璃，据说这是一种窥视镜，里面能看清外面，外面看不见里面，叫花子是敲不开门的。那时候沿门求乞的人很多，差不多的人家都装有这种东西。我从来不知道那门里是什么样子，只是看见那高高的围墙上长满了爬墙虎，每到秋天便飘送出桂花的香气。”这是通过“我”（高小庭）儿时的目光，从外面观察到的，孔碧霞居住的“五十四号石库门”。所谓



石库门,就是房门用石头“箍”(围)上的。宁波人读“箍”为“库”,所以,“石箍门”被讹传为“石库门”。石库门建筑,是民国时期的苏州人,模仿上海人建造的一种西式建筑,类似江南传统二层楼的三合院或四合院,居住者都是大户人家。孔碧霞能住这种宅子,是因为,她“原本是个政客的姨太太,这政客能做官时便做官,不能做官时便教书,所以还有教授的街头。”说明石库门的主人,多为苏州上流社会。但石库门在小说中,不只用来象征主人的身份、地位和财富,它已拓展到文化层面。居住在这里的孔碧霞,同样津津乐道生活艺术(包括美食烹饪),成了她的精神追求。作为教授夫人,原本就懂艺术(会唱评弹,会画兰花),经过高雅文化的熏陶与历练,她对于美食的理解,自然胜过朱自治这个土包子。朱自治只知道到饭店吃饭,而孔碧霞却一定要将美食,与诗意环境结合在一起。就在她家的石库门庭院里,花草竹木、楼台亭榭、小桥流水,再加上如花似玉的女儿,为客人们端菜,便综合了美味与美景、品尝与观赏、物质与精神,等等多种元素。小说这么写孔碧霞,就是从艺术层面,定格苏州人优雅的生活方式,描绘江南城市独特的文化风俗景观。在这样的环境里生活,很容易成为美食家。

私家园林。民国苏州,中上阶层人家,有住宅庭院的,都要修建园林景观。旧时苏州城,面积并不大,然而在“明清鼎盛时……各式园林和精致庭园,多达300余处”。(陈晖主编《苏州市志》第一册)媒体说:“骄傲的上海人习惯将苏州称之为自己的‘后花园’。在大户人家,前厅大堂作为迎来送往、谈正事之地,需要冠冕堂皇、正襟危坐。而‘后花园’便是倩影相随,花木扶疏,曲径通幽,廊桥迂回,是琴棋书画、吟诗读书、休憩养性之地。于是,如此精美之地所出的饮食,其精致之度,当然也不在话下……千百年来,苏州园林的文化早已融入了苏帮菜的美味。”(杨艳《游苏园惊食梦——消失于苏园里的那些饕餮》)孔碧霞的石库门庭院,就是一个微缩园林。《美食家》第十一章《口福不浅》,通过高小庭的目光,看到了这个园林环境的布局:“我跟着孔碧霞往前走,一个幽雅而紧凑的庭院展现在面前。树木花草竹石都排列在一个半亩方塘的三边,一顶石桥穿过方塘,通向三间面水轩。在当年,这里可能是那位政客兼教授的书房,明亮宽敞,临水是一排落地的长窗。所有的长窗都大开着,可以看得清楚,大圆桌放在东首,各界人士暂时都坐在西头。”(陆文夫《美食家》)三间面水轩,是



苏州园林的建筑样式之一,临水而建,别具风情,富于诗意,留下过许多文人墨客的足迹和诗文。这里也是,烹饪者施展才艺的物质空间,美食家品味佳肴的理想环境。可惜民国之后,苏州人家少有再建。只有当代企业家陈金根,建造了“静思园”;当代画家叶放先生,建造了微型的“南石皮记”(央视《舌尖上的中国》第三季,还拍摄了叶放在南石皮记的饮食生活)。如今仅存的私家园林,多为民国或明清遗存。这些广布在苏州城郊的艺术建筑,成了美食家生存的港湾。

二、市民追逐时尚

人们品鉴美味,也是一种时尚。不为吃饱,只为精神享受。周作人说:“我们于日用必需的东西以外,必须还有一点无用的游戏与享乐,生活才觉得有意思。我们看夕阳,看秋河,看花,听雨,闻香,喝不求解渴的酒,吃不求饱的点心,都是生活上必要的——虽然是无用的装点,而且是愈精炼愈好。”(周作人《北京的茶食》)苏州人追求这种时尚,

能做到极致。举个例子,400年前,苏州人爱唱昆曲。张岱《陶庵梦忆》说,若逢一年一度,虎丘中秋曲会,苏州人会倾城而出,万众齐唱。“土著流寓、士夫眷属、女乐声伎、曲中名妓戏婆、民间少妇好女、崽子变童及游冶恶少、清客帮闲、僮仆走空之辈,无不鳞集。”因为人多,演唱时“动地翻天,雷轰鼎沸”。苏州枫桥杨神庙,一次职业昆班的演出,竟然达到“四方观者数十万人”。如此热爱昆曲艺术,没有富庶的背景支撑,简直不可想像。盛唐白居易,在苏州当过刺史,对此体会最深。所以他写诗,都会情不自禁,盛赞苏州的繁华与富裕:“人稠过扬府,坊闹半长安”(白居易《齐云楼晚望》);“处处楼前飘管吹,家家门外泊舟航”(白居易《登阊门闲望》);“舟移管弦动,桥拥旌旗驻。况当丰熟岁,好是欢游处”(白居易《吴中好风景》);“留春不住登城望,惜夜相将秉烛

游。风月万家河两岸,笙歌一曲郡西楼。”(白居易《城上夜宴》)后来调离苏州,白居易依然不忘苏州:“江南旧游凡几处,就中最忆吴江隈。长洲苑绿柳万树,齐云楼春酒一杯。阊门晓严旗鼓出,皋桥夕闹船舫回。六七年前狂烂漫,三千里外思徘徊。”(白居易《忆旧游》)陆文夫写《美食家》,背景是民国苏州。虽经战乱,但苏州人追求时尚生活,依然痴心不改。20世纪40年代,陆文夫从泰州移居苏州,亲历了当时的社会现状,所以他写苏州,基本上是“情景再现”。比如,苏州的美食家们,一般到哪里吃饭?吃完饭到哪儿喝茶?出门乘坐什么汽车?手腕戴什么表?平时抽哪些香烟?等等,均写到小说里。这些消费场所或生活用品,构成了美食家饕餮人生的文化土壤,反映出那个时代的时尚生活元素。举几个例子。

石路茶楼。

《美食家》写道,食客们的生活丰富多彩,吃过喝过洗过歇过,要到茶馆里去蹲一蹲。第一章《吃喝小引》,就写到阊门石路的茶楼:“苏州的茶馆到处有,那朱自治为什么独独要到阊门石路去呢?有考究。那片大茶楼



上有几个和一般茶客隔开的房间,摆着红木桌、大藤椅,自成一个新天地。那里的水是天落水,茶叶是直接来自洞庭东山买来的,煮水用瓦罐,燃料用松枝,茶要泡在宜兴出产的紫砂壶里。吃喝吃喝,吃与喝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称得上美食家的人,无一不是陆羽和杜康的徒弟的。”在这里,由茶楼写到特定的茶叶(洞庭东山买来的,想必是碧螺春)、泡茶用的水(天落水)、煮水用的锅(瓦罐)、烧水的燃料(松枝)、盛茶的器皿(宜兴紫砂壶)。仅喝茶,就有这么多名堂,由此可见,苏州饮食文化的独特性。这也是苏州人,精致生活、高雅品位的写照。美食家们青睐的阊门石路茶楼,凸显出苏州餐饮精细的文化内涵,和苏州人生活消费的时尚个性。可惜民国之后,这样考究的茶楼,在苏州已难觅到。

福特汽车。朱自治最惬意的年代,是民国时期,我

们俗称“解放前”。那时候,苏州马路上也跑汽车,但在一些民国题材的影视剧里,汽车都没有品牌。《美食家》描写孔碧霞家,石库门外的场景,特别提到福特牌小汽车。小说十一章《口福不浅》说:“(孔碧霞住的)五十四号我是很熟悉,读中学的时候我每天都要从那里经过,常常看见有许多油光锃亮的黄包车停在门口,偶尔还有一辆福特牌的小轿车驶过来,把巷子里的行人挤得纷纷贴上墙头。”注意数量对比:黄包车,有“许多”;福特牌小轿车,却“偶尔还有一辆”。说明这种汽车,在当时的苏州街头,很少见;也说明乘坐汽车的人,不是普通人。媒体称,苏州城里第一次出现汽车,是在1936年。“民国江苏《长途》杂志1936年1卷15期刊文介绍,1936年时,有阊门外更生医院美籍医师惠路易拟在苏州城里开办一所慈善性质的医疗诊所。为求往来方便,惠路易想在城区开行汽车,便致函吴县外务秘书处,请求批准。县外务秘书处接惠路易之信后,即与吴县县长邓翔海商洽。县长邓翔海认为,既然是慈善事业,应可‘酌予通融’。苏州城里的第一辆汽车由此诞生。”(佚名《1936年苏州城里的第一辆汽车》)这位汽车主人惠路易,是个外国人(美籍医师)。之前,中国医生也申请开汽车,却遭政府拒绝。“上世纪三十年代初,苏州阊门外马路

拓宽,商市繁荣,有留美医学博士张卜熊开办卜熊医院,为出诊方便,购置汽车一辆,且呈文吴县政府,请求批准在城里已经加宽的马路——景德路、观前街、官巷等处行驶。但是,吴县政府以城内马路虽有改善,但至今没有汽车通行,行车要求‘尚在考虑当中’为由未予批准。因此,到1935年,苏州城里还没有汽车行驶。”当时国家,积贫积弱,由此可见一斑。不过,“县府虽然批准了惠路易的汽车可在苏州城里通行,但考虑到城里拓宽的马路有限,故惠的汽车只能够行驶在县府规定的路线,并于此车注明特别标记,以资识别。”孔碧霞家里的福特汽车,也应是30年代进口中国的产品。1931年,福特公司在上海,设立第一个汽车销售和服务行。本打算建造汽车装配厂,却因国民购买力小,每天卖出的福特车,不到4辆,计划便撤销了。(陈晖主编《苏州市志》第一册)当时中国,拥有福特汽车的人,都有一定身份。孔碧霞的先生,能乘坐这样高档的汽车,说明地位和名望不一般,也有经济实力。能拥有福特牌小轿车,这个家庭平时的饮食,也一定考究。长期这样生活,孔碧霞自然懂得,如何将日子过得艺术化一点。做一桌好菜,应是手到擒来,这也是一种生活时尚吧。在这样的物质氛围中,人人都可以成为美食家。





浪琴手表。食客们喝茶的时候，谈笑风生、举手投足之间，可能还会露出手腕上的手表。朱自冶却不戴手表，他告诉“我”（高小庭）：“不瞒你说，读大学的那一年家里给了我一只浪琴金表，我戴了三天就不想要了，总觉得手腕上多了个东西，很不舒服。”（陆文夫《美食家》）朱自冶的手表，后来弄哪儿去了？有几种可能：一是因为人懒，像他自己说的，“总觉得手腕上多了个东西，很不舒服”，所以手表也就送人了；二是因为醉酒或洗澡，不慎将手表遗失；三是因为嘴馋，把手表当掉换钱，留作下馆子用了。然而，那可是一块昂贵的“浪琴表”！民国时代，没有多少人能戴得起。第一块浪琴表进入中国，是在1867年，当时只能“由宫廷贵族和富商享用；上世纪30年代，上海比较繁荣的时候，浪琴表是东南沿海很昂贵的商品。”（张潇潇《浪琴表最大的优势是坚持》）朱自冶拥有浪琴表，说明家境殷实富裕，是一种身份与地位的象征。朱自冶不稀罕，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这位美食家的皮囊本质。浪琴表如同他的石库门洋房一样，毫无价值可言。他认可的时尚，就是享受美食。所以，解放后这位大脑空空的吃客，当上“美食协会会长”，也

算是实至名归吧。

三炮台香烟。《美食家》写到香烟的时候，小说故事已演绎到解放初期。此时，市民的生活用品，仍有民国标记。朱自冶的生活水平，尽管今非昔比，但他抽的香烟，仍是一些名牌。小说第三章《快乐的误会》说：“朱自冶对我刮目相看了，他称我同志，我喊他经理，他老远便抱出三炮台香烟递过来，我连忙摸出双斧牌香烟把它挡回去。少跟我来这一套，你那高级烟浸透了人民的血汗，抽起来有股血腥味。”这三炮台香烟，缘何称作“高级烟”？因为它是1914年，英美烟草公司在中国，推销的一种品牌卷烟，分公司设在福州和厦门鼓浪屿。同时推销的品牌烟，还有大炮台、二炮台、老刀、哈德门、五华、使馆、多福等等。百姓一般抽不起，它是烟民的时尚标志与身份象征。所以，在现代影视剧中，能抽这种烟的人，都不是一般角色。比如，电视剧《亮剑》中的楚云飞，电影《风声》中的吴志国大队长。相反，“双斧”牌香烟，却身价低廉，是国营中华烟草公司的普及型香烟。烟盒背面，还印有宣传标语：“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增加生产，支援前线。”小说中的“我”（高小庭），用这种香烟，回绝朱自冶的三炮台，是有政治寓意的，反映出那个时代，人们的政治觉悟，阶级斗争的警惕性。朱自冶抽这种烟，无非是想保持，追求生活时尚的个人形象。所谓百足之虫，死而不僵。

三、饮食消费便利

美食家是吃出来。朱自冶在家吃，条件充分，妻子孔碧霞就是烹饪高手；到饭馆吃，也有用武之地，苏州的老牌饭店数不胜数。有了这些菜馆和饭店，苏州人也就特别讲究，吃的水平与艺术。朱自冶能成为美食家，这些大大小小的老牌饭店，起到了关键作用。《美食家》写到的饭店和食品店，大约有10多家，朱鸿兴、元大昌、新聚义、义昌福、松鹤楼、木渎石家饭店、陆稿荐、马咏斋、采芝斋等等。不过，多为略写。比如“元大昌”，小说第二章《与我有关》说：“当朱自冶快要醒来时，我也从学校里下学归来。书包一放，妈妈便来关照：‘今天还在元大昌，快去！’妈妈的话只有我懂，那朱自冶还有一顿晚饭没有吃呐！”元大昌是什么？读下去就会知道，朱自冶要在这里吃晚饭，所以它就是一个饭店。再比如，第一章《吃喝小引》，有一段描写：“（朱自冶和吃友们）会

议一结束便要转入正题,为了慎重起见,还不得不抽出一段时间来讨论今日向何方?是到新聚丰、义昌福,还是到松鹤楼。如果这些地方都吃腻了,他们也结伴远行,每人雇上一辆黄包车,或者是四人合乘一辆马车,浩浩荡荡,马蹄声碎,到木渎的石家饭店去吃鲃肺汤,枫桥镇上吃大面,或者是到常熟去吃叫花子鸡……”这一段文字,提到了新聚丰、义昌福、松鹤楼、木渎石家饭店,这些品牌名店。但到枫桥镇吃大面,指的是哪一家饭店?到常熟去吃“叫花子鸡”,又在哪家餐馆?都略去了。不过,小说重点写到的饭店、食品店,很有代表性。比如朱鸿兴、松鹤楼、木渎石家饭店、陆稿荐(卤菜店),和一家没有提及店名的“有名的菜馆”。它们在民国苏州,赫赫有名,都是美食家心中的殿堂。下面细说一下。

朱鸿兴。小说第一章《吃喝小引》,写道:“(朱自治)眼睛一睁,他的头脑里便跳出一个念头。

‘快到朱鸿兴去吃头汤面!’这句话需要作一点讲解,否则的话只有苏州人,或者是只有苏州的中老年人才懂,其余的人很难理解其中的诱惑力。那时候,苏州有一家出名的面店叫作朱鸿兴,如今还开设在怡园的对面。至于朱鸿兴都有哪许多花式面点,如何美味等等我都不交待了,食谱里都有,算不了稀奇,只想把其中的吃法交待几笔。”在此,作者写出了朱鸿兴的影响(出名的面店),所处的位置(怡园对面),面食的正宗(“许多花式面点”都进了“食谱”)。历史上的朱鸿兴,始创于1938年,专营特色面点。1980年代扩建后,二三楼供应早茶、饭菜,一楼供应各色面点、虾肉汤包等。小说的描写,接近现实,可见作者对朱鸿兴,有生活体验。作者曾说,抗日战争胜利时,“我考入苏州中学”。(陆文夫《忆朱砚馨同学》)而苏州中学,离朱鸿兴不远,陆文夫可能到朱鸿兴吃过面。苏州的朱鸿兴,是一家平民化饭店,更适合普通市民的生活需求。这样一个普普通通的饭店,受到“美食家”朱自治如此重视,可见它做的面条,确有特色,是

美食家历练味觉的理想平台。

松鹤楼。小说第二章《与我有涉》写:“这里是某府喜事,包下了整个的松鹤楼,马车、三轮车、黄包车在观前街上排了一长溜,新娘子轻纱披肩,长裙曳地,出入者西装革履,珠光宝气。”文字不长,却标注了松鹤楼的地址(观前街),饭店的档次(出入者西装革履,珠光宝气),饭店规模(包下松鹤楼的车马队伍,“在观前街上排了一长溜”)。松鹤楼是著名的苏帮菜馆之一,早在清乾隆四十五年(1780),列入苏州面业公所碑记。更是民国时期,

有身份有地位的苏州人,经常出入的场所。所以,松鹤楼是当时姑苏上流社会生活的一个缩影。直到今天,松鹤楼依然是苏州的一流饭店,总店至今还在毗邻观前街的太监弄,与另一个著名的饭店得月楼隔路相望。小说没有直接写,朱自治到这里消费;只是用它来烘托,当时苏州的美食环境。仅此一笔,便



能看出,它在美食家心中的份量。

得月楼。小说没有明写它的店名,只是在第四章《鸣鼓而攻》,这样描述:“全行业公私合营的时候派不出那么多的公方代表,我也只好滥竿充数,被派到某个有名的菜馆里去当经理。这个菜馆我很熟悉,但在解放前从来没有进去过,只是在门口看见有许多阔绰的人进进出出,看见有许多叫花子围在门前,看见那橱窗里陈列着许多好吃的东西,在霓虹灯的照耀下使人馋涎欲滴。”从文字看得出,这个菜馆是“我”(高小庭)的工作单位。作者不写店名,只说它是“有名的菜馆”,令人费解。“许多阔绰的人进进出出……橱窗里陈列着许多好吃的东西,在霓虹灯的照耀下使人馋涎欲滴。”说明这是一家贵族化的高档饭店,类似松鹤楼。尽管小说没有介绍店名,但第八章《殊途同归》,还是揭开了这个谜底。“几乎每天都有吃客吵到我的面前:‘我们是来吃饭的,不是来受气的!’我忙着给人家赔不是,同时抓紧时间开会,做思想工作,订服务公约,批评别人,检查自己。还得感谢

我们苏州的滑稽艺术家张幻尔——祝他安息。他那时编演了一个滑稽戏,名叫《满意不满意》。这戏还真帮了我不少忙,我还请他到店里来做了一次报告,他的报告比我的报告有效,所以便招待了他一顿,没有收钱,是在宣传费用中报销的。”看似虚构的小说,其实全是写实。苏州的滑稽艺术家张幻尔,真有其人;滑稽戏《满意不满意》,真有戏剧,还拍成了电影。它同另一部电影《小小得月楼》,表现的内容,均是苏州得月楼菜馆的故事。这样来看,《美食家》所说的“有名的菜馆”,自然便是得月楼。不过需要说明,民国时期的得月楼,地址不在观前街,而是在苏州的虎丘半堂野芳浜口。始建于明朝嘉靖年间,距今已有400多年历史。1982年,才移址毗邻观前街的太监弄。今观前街得月楼旧址上,原来经营的饭店,叫苏州菜馆。由此观之,陆文夫笔下的得月楼,是客观存在与艺术虚构的综合产物,所以,小说隐去店名,以免引起争议。说明陆文夫写小说,创作态度极为谨慎。

石家饭店。小说有两处,写到木渎的石家饭店,一处第一章《吃喝小引》,属于略写;另一处在第九章《士

别三日》,详写石家饭店的一个典故——名菜“鲃肺汤”的故事。因《走进小说的苏州美食》一章,我们已介绍过“鲃肺汤”,此处不再复述。民国以前,石家饭店的名气更大。原名“石叙顺”,创建于清代,做出来的美味酱方、三虾嫩豆腐、鸡油菜心、白汤鲫鱼、清溜虾仁和鲃肺汤等十大名菜,一直是苏帮菜的瑰宝。木渎石家饭店出名,与名人光顾、留下墨宝,有一定关系。它也是美食家们,经常光顾的地方。有人会说,石家饭店的十大名菜,貌似也很寻常啊。此话差矣。就说“三虾嫩豆腐”,食材确实普通,却要将虾子、虾仁、虾脑,分开加工,所谓“一虾三用”。烹饪前,先将虾子洗出,再剥出虾仁,然后将虾头煮熟,再剥出蟹黄似的虾脑,需下许多功夫。再比如,“鸡油菜心”。先是素油过油,再用荤油煸炒,最后是鸡油淋油,色香味齐全。普通食材,都能烧得如此精致,可见这饭店的菜肴,不是一般出色。

《美食家》写到的饭店,还有许多。陆文夫在小说中的描述,详略不一,是有用意的。“朱鸿兴”,是平民饭店的代表;“松鹤楼”“得月楼”,是贵族饭店的代表;“木渎石家饭店”,凝聚了村镇饭店的乡野之趣。作者重点描述这三种饭店,能够概括民国时期苏州饭店的多样性;也为小说主人公朱自治施展饕餮才艺,提供较为全面的美食平台。在朱自治的“成才”道路上,这些饭店,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以上三个方面:居家生活考究,市民追逐时尚,饮食消费便利,是小说《美食家》所展现的财富苏州的几种形态。它们为美食家队伍的成长壮大,提供了必要条件。王稼句《姑苏食话》说,苏州历史上,便出不少“好吃知味者”,饮食著述也多。比如:叶清臣的《述煮茶泉品》、朝奕的《易牙遗意》、钱椿年的《茶谱》、张源的《茶录》、黄省曾的《稻品》、吴禄的《食品集》、张丑的《茶经》、王世懋的《学圃杂疏》、周文华的《汝南圃书》、陈鉴的《虎丘茶经注补》、尤侗的《真率会约》与《簪贰约》、陆廷灿的《续茶经》、吴林的《吴蕈谱》、褚人获的《续蟹谱》、钱泳的《履园丛话》、陆耀的《甘薯录》、毛荣的《食谱》、童叶庚的《睫巢镜影》、李公耳的《家庭食谱》、时希圣的《家庭食谱续编》与《素食谱》等等。讲究吃的品位,研究吃的学问,都是衣食无忧的必然结果。可见苏州富庶,自古亦然。小说《美食家》演绎的故事,也证明了这一点。只是,古代的饮食著述,多为知识与食谱;陆文夫却用小说形式,写出了魅力四射的美食文化,形象更生动,影响也更大。这是陆先生的一大贡献。





东台旧时厨行

◎ 章国荣

东台的厨师在过去称为厨子,虽然说社会地位不高,但在东台厨子却是“两难”之一,所谓“两难”,就是“秀才”和“厨子”,因为这两项职业都要经过艰辛努力才能功成名就。书读好了可能成秀才,进而入仕奉官;厨艺精了可能成为厨子,亦能过殷实日子。对于穷苦人家而言,拜师学厨是更为现实的职业选择,不过学厨子却比较艰苦,因而在过去老东台,做厨子的不是家中传承就是贫苦出生的。

过去,大户人家、官宦之家培养孩子读书,而没钱的老百姓就送孩子去当手艺人。有句古话“荒年饿不死手艺人”。手艺活包罗万象,但做厨子不但能拿到工钱,而且能管饱肚子,能吃上油汤油水的,再加上没有干重苦力活那么辛苦,所以选择这一行的人还比较多。厨

子学徒一般都是在茶馆,东台的茶馆实即餐馆,一般是上午供应茶水、早点、面条等,中午和晚上供应点菜、和菜(按价钱供应相应的几道菜肴)和酒席。也有极少的是跟师父在公馆或忙家作(家宴)学徒的。学徒期一般是三年,先由熟人出面找茶馆老板,谈妥在该店学徒,然后再拜师学艺,有时候老板就是掌作师傅兼任,那就要拜老板为师。学徒期间,师父管吃管住,学费不多,也无明文规定,主要是师父要无偿占有徒工在学徒期间的劳动。特别在最后即将出师的那一年,徒工已经可以拿到跟师父差不多的工资,这些都全归师父。如果这个师父大气,或者与徒工家是亲戚、朋友,师父就会让他提前出师,人虽然还跟着师父继续深造,但可以得到他自己的那份工资。学徒工大都是一些十五六岁的小伙子,他们

拜过师后就进入了师父的家庭。一开始,他们大都学不了多少做菜技艺,好像只是师父家的一个小长工,家里的什么活儿都要干,包括洗衣烧饭带孩子,早上还要替师父倒夜壶。如果碰到一个又慵懒又霸道的师娘,整日里会对他呼来唤去,连孩子的尿布都要他洗。曾经有人调侃说:“当学徒的,除了不用替师娘洗屁股,其余活儿样样都得干。”当然,有时也会有些幸运的徒工能遇到一对脾气好有良心的师父师娘,他们在师父家中既能学到立身的技艺还能体验到一些家庭的温暖,多少年过去后,师徒关系仍然会很好,这正所谓“一日为师,终身为父”。还有更圆满的,师父师娘看中了这个徒弟,后来将家中与之年龄相仿的宝贝女儿嫁给他。不过,这种情况发生的概率极低。

师父开始让徒弟接触做菜活儿,先是让徒弟学着磨刀,从基础上做起。厨子用的刀具都特别锋利,这是要花点功夫磨出来的,遇上刀斩骨头碰坏刀口,那就麻烦了,刀要磨上老半天还不一定能好,这就让学徒的从一开始就记住,刀具要注意保养,不能随便乱斩东西,古人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因此,磨刀是做厨子的一项基本功,就像过去学剃头先要学会磨剃刀一样。接着就是跟在师父身后打杂,从最基本的工作开始,宰杀、择菜、洗碗、洗锅、烧火……待这些基本功都掌握熟练了,也就一年时间差不多了,这时候师父才开始让学切配。学切配要求很高,所切的菜必须要粗细相等,厚薄均匀,大小一致,待砧板功

夫练成,才开始学上灶,上灶师父一般是不教的,学徒只有凭眼看心记,来掌握技艺,要尝菜肴的口味,只有最后桌上客人吃剩下的才能尝一下,遇上师父高兴,堂菜才让学徒去炒,所谓堂菜就是现在的员工工作餐。经过三年的刻苦学习,徒弟掌握技能后,才能满师(出师),满师之日,徒弟需置办酒席答谢师父,另外也邀请一些同行的,以备以后进入厨行后,能得以帮衬。满师后的厨子一般都要都有一手扎实的基本功,才能在厨行立足。东台曾有技艺高超的厨子制作的溜仔鸡,从宰杀、褪毛、切配至溜炒装盘,一共只要三分多钟,在现在来说真有点让人匪夷所思了。

过去茶馆里的厨子虽然每天和山珍海味、鸡鸭鱼肉打交道,但所吃的伙食却很差,除了逢年过节有荤菜以外,平常每个月吃一次大荤(鱼肉之类),一次小荤(荤素搭配的炒肉丝、猪肝之类),其它时候就是一个汤菜。有些厨子喜欢喝两口酒,就自己打酒,碰上客人吃剩下的一些荤菜就拿过来下酒,还自嘲地起了一些菜名,如鱼称为“梳子鱼”(光剩下鱼骨),鸡称为“灯笼鸡”(剩下鸡骨架),如果将顾客剩下的面条再重新下锅加热就称为“回卤面”(回炉面)等等,所有吃这些剩饭剩菜的称为“吃退步餐”,因为厨行的孩子由于家贫缺少教育,成绩优异的不多,民间就说是吃了“退步餐”的原因。现在厨师已经是高薪收入者,那种旧社会下层劳动人民的困境窘态已经是一去不复返了。



新中国成立前,在厨行做厨子要有一定的做菜功底,才能被雇主长期聘用。过去在东台厨界有“四大名旦”,他们分别是景正福、万俊良、焦禄宝、肖双喜四位名厨,其中景正福师傅熟练掌握切配、冷菜、炉灶、面锅技艺,做事一丝不苟,干净利落,他切配菜肴手起刀落,原料在他手中能变得整齐划一,切好的生姜丝根根可以穿过针孔,一块八厘米宽,一厘米厚的方干在他手中横批九刀,竖切四十九刀,切出整整齐齐五百根干丝,不碎不断,他擅长物尽其用,一天工作下来砧板上很难看到废弃的边角原料;他制作的冷菜做工考究,色彩明快,堆放美观,尤其是象形冷

盘图案构思美观大方,形象逼真;炉灶上他技艺娴熟,菜肴下锅,一气呵成,特别是炒菜,亮油包芡,口味适中,不拖泥带水的;他站面锅可以一锅下十斤面条,面条在他的长筷上如行云流水,卷入竹篱里,从清水中过桥,挑入乳白色的鱼汤中,如发髻高高卷起。一天的炉灶站下来,他的围裙干干净净,看不到一点油污,在业内一直让人啧啧称奇。焦禄宝师傅制作的油爆虾,客人连壳都舍不得扔掉,因为口感又脆又香。他制作的醋熘鳊鱼三次入油锅炸至酥透,两锅并用熬制糖醋汁,滋滋沸腾,色香味形俱臻上乘。他讲究出品的菜式一定要清爽,不能拖泥带水,这也说明了东台厨子在制作传统菜式上不但做功

考究,而且干净利落。

民国初年,是东台厨行的一个繁荣的时期,这时候东台有名的茶馆有红兰别墅、太平园、兴汉馆、俞复兴、张复盛、三元酒家、桐花小筑、玩意帐、听雨等,这些茶馆的名字不但起得很雅致,而且所供应的菜肴、早点都很有特色。当时著名的厨子有“太平园”的曹纘成,“兴汉馆”的章震林,“听雨”的吴楚,“俞复兴”的俞进斋等。据记载到民国三十六年,东台城有茶馆共计三十九家,这里不包括那些卖便饭的“荒茶馆”(小饭馆)。东台传统酒席以六碗八碟、八碗八碟为主,其档次的高低是以头菜来决定的,档次高的头菜有海参、鱼肚、鱼皮、鱼翅等,档次低的有蹄筋、猪肉皮等,宴席的程序,讲究首先上头菜,第二道是禽类,第三道是大蛭或淡菜等海味,接下来是时令菜肴,时蔬,鱼肉上桌后宴席就到了尾声。最后是汤,汤讲究清澈见底,口感滋润。过去的宴席上,厨子们在制定菜单时也有忌讳,比如,喜事鲍鱼、蛤

仔不可用;小孩子生日,狮子头不可用;过大寿,甲鱼不可用;丧事办酒席,黄鳝不可用;生日宴豆腐、粉皮不可用。过去东台人对吃很讲究,所以食材的应用也十分考究,宴席的菜肴要根据时令来制作,比如鸡子这道菜,春天是“干炸鸡”“蛋美鸡”,夏天是“荷花鸡”“溜子鸡”,秋天是“菱米烧鸡”“板栗黄焖鸡”,冬天是“砂锅鸡”“大



鸡抱小鸡”等,时令不同,同一种原料所制作的品种也不同。

东台人遇上婚丧嫁娶,或者春节期间的请春卮等活动总是请厨子在家中办宴席,一般的几桌到十几桌不等。这就要请做“家作”的厨子上门来定菜和做菜。家作厨子一般是自带刀勺,就直接上门服务,餐具桌椅炉

灶主家自备,厨子要根据主家宴席的主题来开菜,决定菜品内容。这里还有一个重要原则,宴席的主题和定菜由头菜来决定。一个好的厨子负责家宴,根据原料来出宴,不但要炉灶手艺好,而且还要会配菜,在菜品品种、烹调方法上要注重丰富讲究,而且不多不少,绝不重复和浪费。过去东台名厨陈凤山师傅在做家作时,他能根据主家的要求,制作出不同主题的宴席,菜肴注重创新,富有特色,他创作的“犀牛望月”“海瑞罢官”“林冲夜奔”“海底捞月”等菜肴,一直在老东台人口中啧啧称道。厨子做家作与在茶馆工作不一样,要受到主家热情款待,除了给薪酬外,还要好烟好酒、茶水点心招待,而且遇到婚宴,姻亲在上头菜后,就到厨房跟厨子打招呼,送上一个大包喜(红包)。做家作厨师工资是比较高的,比如20世纪80年代期间来说,那时候请厨师到家做菜,每桌薪酬五元钱,如果遇到结婚操办二十桌宴席,一个厨子带个学徒的或帮手,第一天去下作,第二天办宴,两天时间就可以得到一百元薪酬,四十元红包,遇上客气的主家还要给厨师送上烟酒、喜糖答谢,而在当时普通的工人一个月的工资也就在七八十元左右。现代城里人由于都住的商品房,家中有事都是去酒店,没有人家再请厨师上门做家作了,取而代之的是农村一条龙做家宴的,按桌数收钱,为了节省时间,很多冷菜、热菜都是买的成品或者半成品,做出来的家宴千篇一律,再也很难有过去那种家作厨师精益求精的认真做菜的敬业精神了。

旧时一般大的茶馆里按厨子的不同工种,分为浇案(做冷菜的)、案板(切配)、红锅(炒菜)。茶馆里的炉灶都是抽风灶,几口铁锅一字排开,有专人烧火,根据厨子

技术的高低,所站的灶台不一样,技术最好的站头灶,制作高档的菜肴,或者服务重要的客人,其它的就依次站二灶、三灶等,当然头灶的薪水也要相应的高一些。过去东台站灶的厨子都是用铁铲和铁勺相互配合炒菜,没有厨子会用颠锅翻勺的,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颠锅翻勺的技术才由外地厨师传入东台,到现在已经是很普及了。过去厨子在做家作时用的是柴火灶,后来都是使用大铁皮油桶做的炭炉,火力比较大,一般二十桌的酒席,有两个大炭炉也就可以了。

开茶馆俗称吃“江湖饭”,所接触的人有各行各业的,为了同行之间交流方便,不让外人知晓,厨行之间都有特定的话语,这些话语俗称行话、舌子、哨语等,比如筷子称为“篙子”,花卷称为“手巾把”,肉皮称为“大褂子”,青菜称为“撒青”,一称为“旦底”,三称为“横川”,乡下人称为“十一子”,碗称为“莲花”,能吃称为“隆德”等。如跑堂的在厅堂里朝着厨房喊道:“来了横川十一子,弄旦底大莲花大褂子,隆德多撒青,再弄旦底荷叶手巾把上来!”外面的人听了不知所云,而里面的厨子听了心领神会:来了三个乡下人,要烧一大碗肉皮,这些人能吃,要多放些青菜在里面,还要再来一盘葱花卷给他们。进入现代社会后,这些过去厨行的行话已经没有人再说了。

随着现代餐饮业的不断发展,快餐化和机械化的不断更新,再加上老一辈厨子的退休,旧时的厨行的各种习俗已经渐行渐远,但它不能被时代所丢弃、遗忘,因为它对于我们弘扬东台饮食文化,传承老一辈厨师不断进取的精神还是有着非常积极意义的。



老字号“红兰别墅酒楼”



“红兰别墅酒楼”红兰厅



味蕾上的清明

◎ 宫风华

一畦新韭绿

“春园暮雨细泱泱，韭叶当篱任意长。” 甬上风物，清明时节，韭菜总是青碧的，着一身青衫，水袖轻舞，是戏曲中端庄秀丽的青衣花旦。株株的，纷长几片狭长的叶片，如兰，似蒿，沉淀着霜华露魄。一畦畦韭菜，是春季最生动的色彩，宋词小令般，轻快活泼，令人心生欢喜。

纤瘦的田埂上，有窈窕的村姑，挎着竹篮，对着新韭，小锹轻轻一铲，嗤一声，如痴情的女子，温软地躺在湿润的掌心里。那种快意淋漓的割春韭的声音，与惊蛰时的春雷颇相似，隐约可闻一股微微的辛与辣以及春韭处子般的鲜与香了。

韭菜之食在我国由来已久。《尚书·夏小正》中有“正月囿有韭”的记载。《诗经·豳风》中曰：四之日其蚤，献羔祭韭。韭菜可作祭祀之用。《山家清供》载：六朝的周颐，清贫寡欲，终年食蔬。文惠太子问他蔬食何味最胜？他答曰：春初韭菜，秋末晚菘。可见韭菜乃俗雅共食也。

韭菜又名起阳草、长生菜，有很高的营养价值与健

身功效。古医籍《本草集注》中载：“韭菜，生食辛加行血，熟食则甘而补中、益肝、散滞、导淤。” 春天，气温上升，人体肝气易旺，犯脾搅胃，有腹胀反胃的不适感，肝肾阴虚。而韭菜含有挥发性和硫化物等成分，散发辛香气味，有助疏调肝气。终年，农家餐桌上总能见她绿色的身影。

清明节这天，家中必炒一盘韭菜。放晚学后，我们细小伙都吃晚茶，小碗里总撒上几筷韭菜。长辈说吃了汰毒，我想也有对已故亲人“久”怀之意。

常常想起一家人在春雨霏霏的日子里包饺子的温馨场景来。母亲把新割的韭菜剁碎，去汁，锅里煎好蛋皮，再将精肉剁碎，加进油渣，细盐，把包心炒熟。包好的饺子轻轻地码在竹匾里。煮熟的饺子，盛上一碗，浇上麻油，拌进葱花，夹块脂油，吃得齿颊生香，不忍卒筷。

亲朋到家，备一盘韭菜炒鸡蛋及红烧豆腐，打趣说，今天十样菜待客，韭九谐音。客人回，蛮好，蛮好，香着哩。主客会心而笑，一屋子的温暖和亲情。一盘鲜韭炒鸡蛋色泽好看，香味通融，滑润柔嫩。吃来爽口有嚼劲，味道微微辛辣，细嚼略带甜味，纯真纯味，吃一口齿颊生香。黄绿相间的鲜韭炒鸡蛋，让人品咂出春天的味道。

作家陆文夫盛赞新割的韭菜“肥、滑、香、嫩、鲜”。

经乡间巧妇精心烹制，舌尖上的滋味却是百转千回。

韭菜炒青虾味道特鲜。青虾炒熟后红如丹枫，衬以翠绿的韭菜，犹如红莲掩映在绿荷之中，清新怡人。食之清香柔嫩，味蕾立时陷入鲜美的沼泽中。红绿的色泽搭配，也极令人喜悦，书写着一种渔樵乐事、农圃家风的符号趣味。吃河蚌或蚬子汤时，夹两筷炒韭菜投入汤中，好看又美味，确实相得益彰。

翻张岱《夜行船》，有“郭林宗友人夜至，冒雨剪韭作炊饼”之语。二人关系，像虎皮西瓜，纹络清晰，叶雨相亲。母亲摊的韭菜饼总是弥漫着一股浓浓的韭菜香。将青嫩韭菜割下，洗净，切碎，和小面拌匀，一勺一勺地舀进炸油的铁锅里，发焦后即铲起来。此时的韭菜饼色泽黄绿相衬，清新养眼。搽一块一嚼，发出咔咔的声响，犹如冬夜里走在厚厚的积雪上。逼仄的草屋里立时流淌着馥郁的饼香。一碗清凉的薄粥、一筷咸辣的酱瓜子、一块喷香的韭菜饼、一屋子的亲情和温暖。袁枚《随园食单》记载：“韭白拌肉，加作料，面皮包之，入油灼之，面内加酥更妙。”

韭菜炒百页是农家最寻常的一道菜。农家宴席，有了她，既实惠，又开胃，且低廉。韭菜台炒肉丝、干丝，味道爽脆。母亲烧的韭菜炒猪肝，红绿相衬，汤汁粘稠，入口生香。韭菜须旺火爆炒，略炒片刻即出锅，此时，鲜香扑鼻，嫩嫩的，让人满嘴生津。

母亲还会做韭菜盒子、韭菜炒干丝、韭菜炒豆芽、辣炆春韭菜等，每做一道简朴的菜肴，母亲都投入无限的真诚和慈爱，给我们百般的呵护和疼爱。

喜欢吃饺面店里的水饺和汤面，里面佐料是药芹和韭菜末儿。喜欢韭菜末儿那股醇香，连汤带水一仰脖子全灌进肚里。抹抹油光光的嘴，生活的惬意全写在脸上。

韭菜入诗入贴入画着实令人回味无穷。杜甫“夜雨剪春韭，新炊间黄粱”写出了春韭的鲜嫩及诗人的欣喜；苏轼“渐觉东风料峭寒，青蒿黄韭试春盘”预示着春天的真正到来；李商隐“嫩割周颙韭，肥烹鲍照葵”抒发

思古之幽情；陆游“鸡跖宜菰白，豚肩杂韭黄”把鸡和肉一起列为美肴。杨凝式的《韭花贴》令无数书家为之倾倒。潘天寿的《旧友晤谈图》中“剪韭共加餐”细腻清雅，意蕴丰厚，令人动容。

“一畦春韭绿，十里稻花香。”韭菜绿得清苍，容貌秀丽，水灵如村姑，不张扬，不邀宠，只需一抔土，即分根长蘖，蓬蓬勃勃，舞风弄月。在恬淡的农家生活中，有了韭菜绿生生的点缀，便有了一股子的田园气息和乡土风味。呵，真想挎个竹篮，握把小锹，踏着微润的土膏，沐着和煦的春阳，俯身乡野，采摘青嫩的韭菜，采摘烂漫的春天。

一缕青蒿香

清明时节，用艾蒿挤汁包的青团，色泽青绿，味道尤绝。

青蒿和菖蒲、薄荷一样，弥漫着苦涩的味道，丰富、内敛，灵性，充满着让人心安的意味。青蒿摇曳在轻软的风中，发出窸窣的天籁之音，笛声一样悠远。青蒿如邻家娇羞的村姑，静静居于一隅，细细低语心事。

细雨滋润，青蒿不经意间齐嘟嘟地蹿上来，叶片碧绿脆嫩，身材颇长，袅袅婷婷。青蒿一堆一簇的，随处可见。茎叶似菊，无花。叶子也像是一层薄薄的霜，灰白，疑是秋之薤露。青蒿，如一串驼铃，摇曳在早春的风景里。在和煦的春风中，发出天籁般的响声。青蒿的青灰色，浓郁而清冽，宛若清扬。

常常见到柳条般俊逸的村妇

便拎起雪亮的镰刀，不疾不缓地去往墙边地角砍回一大抱青蒿。采艾的情形，颇有“柔条纷冉冉，落叶何翩翩。攘袖见素手，皓腕约金环”的风韵。青蒿淡绿，微香，令人想起黄穆《小城故事》里那个叫玉纹的女子，所有的情感如艾般缄默、潜藏。

轻风中，残阳下，我们划着小木船，来到故乡的卤汀河边，打棕箬来了。秀珠、春芹和桂花嘻嘻哈哈的，如一



群画眉鸟儿。我们挎着小竹篮，握着小镰刀，蹦蹦跳跳地穿行于没膝的青草丛中。青蒿在轻风中飘舞，浓烈馥郁的芳香氤氲每一个角落。我们清脆的笑声流淌在如水的艾香里。天蓝得透明透亮，夕阳似殷红的樱桃，槐树躬着佝偻的腰，麻雀跟我们捉迷藏。

她们伸出白净如藕段似的臂膀，嫩葱尖似的手指，把苇叶一片一片掐下，再一把把放进船上的水桶里。刚采下的苇叶，青翠欲滴，新鲜碧澄，散发出幽幽清香。采棕箬和采菱、采桑一样，颇有诗经中采薇采葛的意蕴。

沾露的艾蒿亭亭的，有大半人高。那叶片，青青的，蒙了层浅浅的绒毛，显出青苍风骨，又有点清丽柔靡的味道，似失意文人的清凉诗词。浓浓的清香，夹带着淡淡的苦涩，直入肺腑，穿透心灵。艾蒿从根到茎，从茎到叶，气味浓烈得汹涌澎湃，有种豁出去的气势。采艾的巧手，要用清水漂洗多次，才渐褪其香。

艾蒿的香味，如一位女子怀抱琵琶，风韵流泻。艾蒿渗透的香，是水边的湿地，踏一脚就渗出水来。

采回青蒿，或插在门楣上，或搁在堂屋神龛上的香案旁，能驱鬼避邪，你瞧，家家门楣、窗框都插上用菖蒲做的剑，用青蒿做的旗。几束青蒿和菖蒲插在盛有清水的瓶子里，到五月十五才能拿掉。青蒿的奇特芳香，能驱蚊蝇虫蚁，净化空气。菖蒲是提神通窍，杀虫灭菌的草药。正应古籍记载：“五月五日采艾为人，悬门上，以攘毒气。”

青蒿能消病祛灾。村里女人生养时都喝艾汤，艾叶具有温气散寒、生暖止血的功效。我们常常看见邻家姑姑、大婶坐月子喝艾汤，皱着柳眉，喝得很艰难，最后还用红糖水过口。真想不到青蒿与女人之间竟是如此的血脉相通。母亲也喜欢用艾水洗澡或熏蒸，以达到去晦气而活血之效。

我们有时头上或身上害了天疱疮，长了疖子，母亲就把艾叶和菖蒲捣烂，滗出汁水，在我们身上涂搽，我们疼得哇哇直叫，母亲安慰着马上好马上好！一连几天，渐渐地，我们身上的患处便结疤了，心里真佩服母亲有本事，会治病呀。

青嫩的青蒿还能食用。清明时节，青蒿才窜出来，祖母就掐些嫩芽回来，搅在玉米面里或糯米粉里摊饼。祖母擅于煮出艾汁和黏面，放到蒸笼里蒸粘糕，有时，擀成薄薄的饼，卷起来，蘸糖汁，嚼起来，朵颐生香。蒿饼香常常在长街短巷里萦纡不散，浸染了我们的童年时光。

《小雅》里的“蓼萧”即艾蒿，做青团绝计离不开它。母亲擅做青团。将青绿的蒿叶切碎后，用葛布滤出碧

绿的草汁，揉进嫩白的米粉、糯米粉，有了劲道和粘韧，然后包上各种馅儿，甜的有芝麻、花生、核桃，咸的有猪肉、火腿等，沾点糖精，搓成一个个团子，放入铁锅中隔水清蒸，股股喷香直扑鼻息。青团的绿色是一种有香气有甜味的绿色，仿佛整个春天都溶解在这精致的团里了。

村妇们还会把艾草割回家，去掉梗，挂在草垛上晒干，做成枕头芯。我们睡着松软的枕头，闻着浓浓的艾香，可以明目提神、咀嚼苦涩，且清香远胜于现在的海绵枕、荞麦枕、羽绒枕。

青蒿是一种善良而美丽的植物，如村里的姑娘媳妇，眉清目秀、风姿绰约、性情温婉，有水般的灵性、月般的柔情、蒲草般的韧性。她们忙忙碌碌地赶制着热气腾腾的日子，所有的疲惫化为满桌满碗香喷喷的饭菜，化为月光小屋里藏不住的欢乐和幸福。

青蒿是一种凄苦的植物。清明节和端午节的祭祀少不了她的身影。苦涩的滋味，如同童年代贫瘠而艰难的日子，浸润进我们的骨髓和血脉。青蒿和苦楝、苦藤、苦瓜一样，冠名苦字，凝聚了乡村所有的苦难和清贫。青蒿香味浓烈，却恬适安详，如同一个人丰富而干净的内心。

青蒿和吉祥的节日一起，成为田园生活的一种标识，弥漫着古典气息。青蒿把乡村里流动的善良、隐忍和坚韧注入我们的筋骨和血脉里，那烙印在我们心灵深处的甜蜜、淳朴、温暖和欢乐，脐带一样，伴随我们一生。

一碗螺蛳鲜

汪曾祺在《故乡的食物》中深情地描述：“我们家乡清明吃螺蛳，谓可以明目。用五香煮熟螺蛳，分给孩子，一人半碗，由他们自己用竹签挑着吃……”

清明时节的螺蛳，螺肉丰腴细腻，壳中尚无小螺蛳，是采食螺蛳的最佳时令，“三月螺蛳四月蚌”，故乡卤汀河里自然少不了蚌螺蛳蚬之类的鲜美贝壳，而螺蛳特多，水乡人一年四季都能尝到新鲜的螺蛳。

水乡人都会趟螺蛳。趟网是在一根竹竿的顶端绑上三角形的篾条，篾条上系着湖蓝色的小眼渔网。他们来到田间的河沟边，手握趟网，紧贴河边的淤泥，用劲往前推，只见趟网所经之处，水面直泛泡泡，有鱼虾蹦跳。趟网直捣到河对岸，然后慢慢地往回拉，水草们被搅得纠缠在一起，毫无章法。

趟上来后，要把尖蜗螺、软壳子的旱蜗螺、坏死的蜗螺壳拣掉，有时里面还有蚂蟥、小甲鱼、蟾蜍什么的，惊

得她们哇哇乱叫。

村姑们喜欢去河边拉螺蛳。在铅丝篮的把子上系一根长长的尼龙绳子，左手绕着绳子的一端，后仰着身子，成弓形，右手把篮子猛地向河心一甩，“扑咚”一声，远处水花飞溅，光影迷离。接着，双手交替贴着水底拉。拉到岸边，把篮子里的淤泥淘掉，倒到河坎子上，里面掺杂着水草、瓦瓷片和蜗螺儿。

旁边的人就拣里面的螺蛳和蚬子了。再甩，再拉，拉足了螺蛳才停手。最后，大家拎着满篮子的螺蛳，沐着夕晖，哼着民歌《拔根芦柴花》，走进老水牛哞哞的散淡而忧伤的牛歌里，走进母亲浸着甘香和抑怨的呼唤声里。

螺蛳拉回家后，要用清水养在头盆里，滴几滴香油，让螺蛳吐去泥渍。用罩子罩住盆口，由第二天吃。母亲善用旧剪子剪去螺尾，夕阳濡染，低眉躬腰的美妙姿势恰如俏绣娘在穿针引线。然后备好葱段、生姜片，待油锅炸响后，嗤啦一声倒入螺蛳，爆炒，倒点白酒，解腥，倒进酱油，加水焖烧。不一会儿，灶台上热气腾腾，香气弥漫整个灶间。揭开锅盖，红黄绿

褐，艳光四射的螺蛳出锅了，一阵阵鲜香兼具的氤氲热气直扑鼻翼。拈一只轻轻一吮，脆爽又鲜辣的螺蛳肉就随着舌尖裹进了口中。

吃晚饭时，揀着油汪汪、青滴滴的炒螺蛳，“嘅嘅嘅”地嚼着螺蛳，桌子上堆了好多壳儿。有时会被螺蛳屑子粘住，咯好一阵子才咯出。遇到难嚼的，就用竹筷子在螺蛳口捣几下，松动螺蛳肉，如鸡啄米一样，一吸一个准。昏黄的灯光下，一家人低着头，嚼螺蛳的身影凝固成一幅经典的油画，悬挂在心灵深处。

乡村的黄昏，夕光濡染，人们总能闻到煮饭炖螺蛳的清香。蜗螺洗净，放进小瓷盆子，加上葱蒜等佐料，倒上香油、酱油，等铁锅里的米饭冒泡时，把小瓷盆墩进去，再加火烧。炖的螺蛳，特别香，好嚼，一碗饭，不费事就下肚了。油渍渍的螺蛳壳儿早堆成了一堆。

农家常见的吃法是螺蛳炒韭菜。巧妇们挑出来的螺蛳肉漂养在清水里，鲜嫩的韭菜入锅翻炒，再倒进螺蛳肉，起锅喷香。盛进青花瓷盘后，扑进胡椒粉。黑白相间的螺肉衬着碧绿翠嫩的韭菜，俨然一幅雅致的明清小品，十分营眼。河鲜和春蔬的混合香味，令人如品田园生活的清苍疏旷。

酒糟螺蛳味道鲜美，令人垂涎。用钵子将螺蛳、葱姜蒜一干作料装好，挖两勺糯米酒糟，加水入钵，炖在饭锅里即可。扒拉着粳米饭，吮吸着被酒糟醉倒了的螺蛳，舌尖上的滋味确是百转千回，随即进入“一味螺蛳千般趣，美味佳酿均不及”的境界。

泰州人吸螺蛳，也叫“嘬螺蛳”。现在寻常螺蛳已进入排档或饭店里，既保留了传统的水煮螺蛳、韭菜炒螺蛳头、茴香螺蛳，还变生出香辣螺蛳、三鲜烩螺片、螺

肉豆腐羹、荠菜螺蛳羹、咸肉螺蛳汤、马兰头拌螺蛳肉等。食客们运足中气，嗤溜嗤溜地吸，舌尖上滚动的是原汁原味的乡野美味。

螺蛳肉细腻鲜美，清淡爽口，可红烧，可余汤。具有较高的食疗价值，明代医学家倪朱谟在《本草汇言》说螺蛳有“解

酒热，消黄疸，清火眼，利大小肠”的功效。其肉味甘性寒，主治尿赤痛、尿闭、痔疮、黄疸等疾病。因其高蛋白、低脂肪，颇受热衷瘦身的女性青睐。烹调时加以紫苏叶、蒜头，吃起来肉质嫩滑，咸中带鲜，齿唇留香。

清代朱彝尊《黄螺诗》劝我们爱护小螺蛳“怜渠一破壳，也有九回肠”。刘禹锡《望洞庭》“遥望洞庭山水色，白银盘里一青螺”。色彩明丽，俨然一幅淡雅的水墨小品。

逛超市时常常看到一大盆清煮螺蛳。禁不住捏一粒塞进嘴里，韧劲里透着绵软，思绪早飞到故乡的餐桌上了。家乡“太湖八鲜”必有螺蛳的身影。螺蛳已成为故乡的一张餐饮名片了。以其为主料的乡土菜肴愈来愈受到游客的青睐了。螺蛳的清香，固执地停留在我们温暖的童年乡愁里，供我们暖心。





祥瑞美食子孙饼

◎ 徐永清

子孙饼是扬州一带的传统美食。它有子孙满堂，团圆幸福诸多美意，属于祥瑞美食，是故备受欢迎。

早年间，此饼市面上没有，只有家庭版。即便是家庭版，平日里也找不到它的踪迹。它只是悄无声息地潜伏在人们的记忆里，只有到了中秋、春节两大节日，它才千呼万唤始出来，人们才有机缘一饱口福。除了上述两大节日，也有一个例外，生活中一些恪守传统，又喜欢热闹的人家，在嫁姑娘之际，必定要做子孙饼，是用来发吉兆的。这子孙饼或在暖房之日，与嫁妆一同发到新郎家

的，多半则是新婚正日，现做现吃，并是新郎清早接亲时三道茶中的一种甜点。随后多做预留的此饼，与新娘出一同阁，饼随人走。大凡操办喜事，均可因地、因时、因人而异，没有严格的规定，不必拘泥。只要意思到了就行，祝福不打折便可。

子孙饼的体量不大，它的大小犹如酒瓶的瓶底，厚薄亦如瓶底。子孙饼的食材就糯米粉、白糖、黑芝麻、食用油四样。它的制作方法跟汤圆基本相似，馅料要尽可能的多，越多越好。通常把球形的汤圆，压扁，压圆，压

薄,尽量做到浑圆平展,波俏秀美,悦目美心。它的烹制方法极为简单,就干烙,一滴油都不放,跟烙煎饼相似。子孙饼最大的特点是:脆、黏、香、甜。大凡美食趁热吃最好,最能凸显食材的本味。刚刚起锅的子孙饼,热乎乎,香喷喷,白雪雪,黄灿灿。咬上一口,乖乖,黄的是饼皮局部淡云样稍稍凸起的焦黄,它展现的是锅巴样的香脆。虽是点到为止,却意犹未尽。白的便是饼皮甘于低调的本色,它主打的是黏,既有弹弹的快感,又毫不粘牙。馅料则香甜而滋润,这是芝麻与白糖充分融合,通力合作的杰作,加之食用油的润泽,快意而滋养,赞到了极点。饱享之际,千万别打岔,给个皇帝也不当;送个神仙,吃后再考虑。

子孙饼俗称糯米饼,黏饼子。扬州人为何将此饼叫做子孙饼,这是有说道的。中国人好谐音,爱寓意,喜象征,凡事喜欢讲究口采,以求心理的慰藉。这饼浑圆,象征团圆。其次,此饼的馅料为芝麻,芝谐音子,就像石榴多籽一样,寓意多子多福。关键是一把芝麻可比一只石榴的籽粒还要多,祝福更多,福气更多。既方便,又快捷,这是何乐不为的好事。再者选用芝麻是有考虑的,它不像石榴,易受季节的左右,可芝麻却不受时节的影响,随吃随取,还能确保万无一失。其实扬州人的生活习俗与国人大体相同,唯独中秋与春节,分别在吃月饼、吃汤圆之余,还要吃子孙饼。这子孙饼是额外的,追加的。大凡好事,尤为美食,多多益善。这子孙饼外地人兴许也偶吃,只是没有制度化,亦没有赋予美好的内涵。俗话说:“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扬州人享用子孙饼,虽是小众习俗,也颇具地域特色。

制作子孙饼是项愉快的工作。每每中秋、春节两大节日,儿孙们全都回家了,一家人团聚了,老人们高兴地都合不拢嘴,脸笑如花。常言道:“人逢喜事精神爽”,这些长辈就像打了鸡血,又像服用了兴奋剂一样,连哼带唱的,浑身的干劲。他们不仅要准备丰盛的饭菜,更要制作子孙饼,应时应节,表表心意,发发吉兆。现如今,一个大家庭,祖孙三代或四代,少的也有七八人,多的达到十几号。这子孙饼连吃及带的,要做多少呢?当然是多多益善。临了,每个单立门户的子女,最起码要带十个回家。实实在在的,十全十美的,多好!

通常,制作子孙饼均由奶奶、外婆级的长辈亲自料理。制作之际,女儿、媳妇们总要积极参与,或一同劳作,或帮忙打杂。此刻她们总要谈些家常,说说笑笑的,开心无比。最是那些小把戏(小孩),目光直勾勾地看着

锅中,不停地咽着口水。就连唱歌、做游戏诸等快乐的好事,全都忘却了,就一门心思在等待。子孙饼刚熟,长辈们便赶紧每人分发一个。小把戏头一掉,便站于巷中的门口,吹着热气,有滋有味地咬嚼起来,那幸福的姿态,能把一旁围观的邻居小把戏羡慕得两眼发红,口水直淌。见此情景,长辈们也赶忙拿出热乎乎的子孙饼,逐一派发给这些小把戏。做人要懂分享,知结缘。人生像种田,只有投入,才有回报。只有今朝的分享“阳光”,往后才会有人跟你分担“风雨”。

至于那些操办喜事的人家,结婚前夕,无论男方抑或女方,都忙得雾起来了。这个“雾”在扬州话里有忙碌,忙乱,团团转诸多语意。就子孙饼来说,必定是女方做。要做子孙饼,人手肯定不够,只有邀请些精明能干,手脚麻利的邻居阿姨帮忙。于是两三个阿姨撸起袖子,一齐上阵。她们边包子孙饼,边拿新娘开涮,说得新娘对新的生活充满了红红绿绿的愿景。不时这些阿姨也会转弯抹角,抛出几句荤话,兴许是善意的提醒,或许是好心的教化。其中既有启蒙的因素,又有开导的成分。这些荤话能把新娘臊得满面通红。要开涮,趁早,过时不候。新娘一旦出了阁,就老扎了,并是过来之人,不吃这一套了,也不在乎了。闲话少述,这子孙饼不仅是做,且是大做特做,至少要做五六十个,多的达到上百个。一是显示大方富足,娘家对姑娘上心。再者,还要分发左邻右舍,也让人们沾沾喜气。

那位要问了,你们扬州人为何对子孙饼这般念念不忘,还情有独钟?答曰:早年间,国人的生活水平普遍低下,寻常的茶饭能吃长久就不错了,还能有什么奢望。这子孙饼不仅难得稀有,加之又满载着文化与传承,是故珍贵,记忆深刻。现如今,人们的生活不仅富足了,有闲情的人也多了,大家更喜欢怀旧。人们享用子孙饼,也不再局限上述三种情形,可随做随吃。一些老扬州,或单家独户,或呼朋唤友,隔三差五地做些子孙饼,用于甜甜嘴,解解馋,慰藉“饼愁”。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的口味也在悄然发生变化。就子孙饼的馅料来说,可谓丰富多彩。甜口的不仅有芝麻糖的,也有花生糖的、红豆沙的、酒酿的、枣泥的、桂花的……咸口的既有豌豆苗的,亦有韭黄的、青菜的、荠菜的、肉松的、鲜肉的……只有想不到的,没有做不到的。

行文至此,突发灵感,咱与妻子商量,待我的女儿出阁之际,我也要充分利用自身资源与优势,热闹一番——亲自做回子孙饼,为女儿发发吉兆。





南京板鸭

◎ 马学仁

南京人善制鸭,历史悠久,技艺精湛,品种众多,风格独特,称得上最有地方特色的还是板鸭。这个“板”字用得很好,颇能形容这种腌制品的质感。南洋劝业会后,人们将南京板鸭与镇江香醋、苏州刺绣并称为“江苏三宝”。

历史

据《玄武湖志》注引南梁吴均《齐春秋》所载:相传六朝时,南京即能制作板鸭,参照其它史料,至迟在明初,南京板鸭已在市场上出售。明初,南京流传着一首民谣:古书院、琉璃塔、玄色缎子、咸板鸭。时人将南京板鸭与最大的国立大学——南京国子监;被称为世界奇

迹的大报恩寺塔;著名特产玄色锦缎并列,可见质量上乘,其身价不凡。

据朱千华在《食客行:我的江湖美食生涯》中云:“明代吏部左侍郎顾起之(1565 ~ 1628)所著《客座赘语》中说板鸭已经成了南京特产:‘购觅取肥者,用微暖老汁浸润之,火炙色极嫩,秋冬尤妙,俗称为板鸭,其汁陈数十年者,且有子孙收贮,以为恒业,每锅有值百余金,洵江宁特品也。’”

据《饮食文化典故》卷一介绍:相传南北朝,梁武帝在位,建都城于建康(今南京)。584年,大将侯景起兵叛乱,围困台城。战斗十分激烈,梁朝士兵有时连饭都顾不上吃。当时,正值中秋,肥鸭上市,城内的妇女们便将鸭子洗刷干净,加上佐料煮熟,用荷叶包好送上战场。

有时干脆将几十只鸭子捆扎在一起,抬上阵地。士兵们打开成捆的干鸭,用水一煮,咸淡适宜、香气扑鼻,都夸奖板鸭好吃。后来,台城的老百姓为了纪念那次战斗,便把挤压成板状的鸭子称为“板鸭”,其制作的方法有了改进,而且越做越好,并沿袭下来,成为南京的名特产品。

每年从小雪到清明,是南京板鸭生产季节。其中大雪到立春是制作板鸭的黄金时期,这一时期生产的板鸭叫做“腊板鸭”,能保存到清明。立春到清明这一段时间生产的板鸭,叫做“春板鸭”,不宜长期保存。由于板鸭便于携带,易保存,也是郑和七下西洋时携带的食品之一,一是作为礼品赠送给沿途各国,板鸭作为中国的饮食文化的象征,让这些国家的领导人品尝后无不惊叹中华文明的伟大;二是自食。

据清乾隆年间的《江宁新志》记载:“购取肥鸭者,用微老汁浸润之,火炙色极嫩,秋冬尤佳,俗称板鸭……江宁特产也。”南京地方官员在新板鸭上市时,总要挑选一批质量最好的进贡皇室,所以南京板鸭又叫“贡鸭”。朝廷官吏在喜庆佳节互访时,也喜欢以南京板鸭为礼品互赠,故又有“官礼板鸭”之称。

要诀

南京板鸭其要诀是“鸭要肥,喂稻谷,炒盐腌,清卤复,烘得干,焙得足,皮白、肉红、骨头酥”。

“鸭要肥,喂稻谷”,制作板鸭的原料以湖熟的南乡鸭为上品,南乡鸭体长、身宽,胸部及两腿肌肉饱满,两腋有核桃肉。干毛瘪嗦时体重在 1.75 公斤以上的健康活鸭,宰杀前要用稻谷催肥。“炒盐腌”,是指宰杀后腌制的盐,要和香料一道炒干,然后才能使用,这样的鸭子就腌得透、香味浓。“清卤复”有二层含义:一是指经腌制过的鸭胚还要复卤(即放入特制的卤水中复腌),以保证鸭胚都能腌透;二是指卤水要清(即干净)。“烘得干”是指复卤后的鸭胚先经风吹干,以增加香气。“焙得足”是指在煮食时必须用小火焙熟,煮鸭的水一定不能翻滚。这样才能呈现南京板鸭的酥、香、嫩的特殊风味。

工艺

南京板鸭加工工艺流程为:选择健康活鸭—停食喂

水—宰杀—选料—开、扣、洗、腌—复卤—起卤—排胚—叠胚—整形—吊胚—成品。

南京板鸭的前几道工序和盐水鸭工艺基本一样,所不同的是:板鸭需要摸肘,而盐水鸭是不需要的;板鸭需分公母,公鸭必须割掉生殖器,而盐水鸭不需要;板鸭复卤与盐水鸭相比时间要长得多,工艺上增加了排胚、叠胚、整形、吊胚几道工序。

排胚:将复卤后的鸭胚取出,倒尽肚内卤水,放在案板之上,对鸭胚进行初次排胚处理,双手压住鸭胚的人字骨,使其断裂,理顺鸭胚的颈部食管、气管,排出板鸭的形状。将排好的鸭胚放入鸭架上进行叠压堆码,在码放过程中,每层需撒盐一次。

叠胚:使鸭子形状固定成型,肉质经过叠码后更加紧板,使之相互间有间隔,让空气流通。鸭胚决不能相互黏连,否则容易受潮变红。

整形:数日之后,再进行整形处理。

吊胚:板鸭成品达到眼瘪、颈直、骨头露的要求后,再挂吊数日。整个板鸭制作周期 20 天左右。

煮食

煮前用淡盐水浸泡 4~6 小时,让鸭体回软,析出鸭体内部部分盐分,同时将其体表清洗干净。沥净水分后,选用 10 厘米长、中指粗细的芦苇管或小竹管,插入鸭子肛门处,用烘炉内的余火,将鸭体烘干。只要经过烘干的板鸭,吃时才会皮脆肉酥。先将清水煮沸,停火,放入少量生姜、香葱和大茴香,再将板鸭放入。待热水灌满鸭腔体后,抓住板鸭的一只腿拎起,倒出腔体中的汤水,再放入锅中,并添加约为原汤量的六分之一的冷水,盖上锅盖。锅盖应小于锅内水面积,只将鸭子压入水里,而不将面封严。焖焙 25 分钟后,点火加热,待锅边出现气泡,此时水温约为 85℃,即停火,俗称抽丝。然后再次提腿倒汤,加冷水盖上锅盖,焖焙 20 分钟,进行第二次抽丝。第三次提腿倒汤,盖上锅盖,焖焙五至 10 分钟,即可取出,待凉透后切食。经过这样的方法煮制的板鸭,体态丰满,皮白肉红,酥、香、板、嫩,余味返甜。

板鸭简便食用法:将去咸洗净的板鸭切成薄片,放入碗中置饭锅上蒸熟;将去咸洗净的板鸭放入高压蒸锅煮制,只需保持 85℃,焖焙 40 分钟左右即可,冷却后切食。



南京板鸭、盐水鸭制作技艺 图片来源于南京市文化馆网站

名店

南京板鸭店到抗日战争前发展到 200 多家,年产量达 260 万只,其中最著名的有韩复兴(昇州路)、濮恒兴(雨花路)、马长兴(中华门外)、老宝兴(桃叶渡)、魏洪兴(小彩霞街)、陈厨(信府河)、王厨(七家湾)等被人称为“八大家”。当时,国人就以“鸭都”来称呼南京。1946 年 5 月至 1948 年 1 月,南京一共有 85 家板鸭店,其中 54 家是回民经营的。张通之(1875 ~ 1948)在《白门食谱》中说:“韩复兴之板鸭,肥而且香,亦久闻名于外。盖其鸭之肥,喂以食料,待其养成。至其肉之香而嫩,亦咸之适宜,有一定之盐,与一定时。”新中国成立前,发展到五处店铺(内桥、仓巷、府东街、中央商场)。1956 年公私合营时,与魏洪兴合并,传统特色风味经久不衰,创制的雪花牌板鸭远销港澳和东南亚。

2015 年 1 月 20 日,南京樱桃鸭业有限公司成为南京板鸭盐水鸭制作技艺的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

影响

郑和研究会理事、南京伊斯兰协会委员郑自海在《“金陵鸭都”》(载《江苏穆斯林》,2016 年第 1 期)一文中说:“从目前了解到云南陆良板鸭、湖南无骨板鸭、江西南安板鸭、福建建瓯板鸭、广东南雄板鸭、安徽无为板鸭等,如果考其源流大部分来自南京,只不过经过不断改良更具地方特色罢了。”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英国商人在南京开设的“和记洋行”,每年冬春两季,要从南京运销板鸭和冻鸭 100 多万只。

获奖

1910 年,在“南洋劝业会”上,南京韩复兴生产的板鸭曾获一等奖和金质奖章。《金陵野史》《金陵鸭韵》《江宁区文化志》《秦淮古今大观》上都这样记载。经笔者查阅有关资料,南洋劝业会共评出奏奖(一等奖)66 名,相当于今天的金奖;超等奖(二等奖)714 名,相当于今天的银奖;优秀奖(三等奖)426 名,相当于今天的国优;金牌奖(四等奖)1218 名,相当于今天的部优;银牌奖(五等奖)3345 名,相当于今天的行业优;总计 5269 名。仔细查阅后,可确定南京板鸭不在获奖名单上。是什么原因呢?经查参展分类纲目,有 24 部,89 门,444 类。其中第二十部饮食品,有 4 门分别为茶食、面粉、酒(附调味品)、蜜渍(附酱醉品)根本没有熟食这个门类,因为根本没有参展,哪能评上什么奖呢!开幕前,南洋劝业会专用宣传刊物《金陵杂志》中,详细地介绍了南京烧(烤)鸭、盐水鸭、板鸭和南京香肚等。南洋劝业会于宣统二年四月二十八日(1910 年 6 月 5 日)正式剪彩开幕,会场内到处设有贩卖部。土特产和工艺品,应有尽有。各省市的名菜、细点、香茗,供客品尝。南京板鸭在贩卖部销售,受到国内外参观者的热烈欢迎和赞赏。有好事者说是得奖了,有人以讹传讹,写在文章中,造成了历史误会。

新中国成立后,南京板鸭生产发展更快,1951 年新建了国营板鸭加工厂。板鸭的加工生产,也从手工操作逐步发展到半机械化操作。1956 年,在中国食品公司举办的全国食品展览会上,南京板鸭荣获一等奖。1981 年,南京市食品公司魏洪兴板鸭店生产的“雪花”牌南京板鸭,被评为江苏省和商业部系统优质产品,并获国家银质奖章。南京板鸭厂生产的“白玉”牌板鸭、盐水鸭在 1994 年江苏食品展销会上双双获金质奖。

新建瓮城记铭碑略述

◎张晓婉



新建瓮城记铭碑拓片

2017年2月10日，南京博物院在对一批旧藏墓志、碑刻的整理工作中清理出一块石碑，经过辨认是元末张吴政权的一块记铭碑，周身无雕饰，碑题篆额为“新建瓮城记铭”六字，全文如下：隆平府阊门，元设水陆二关。天佑三年十二月，本处守御总兵官武毅将军万户任士元，申禀中书平章政事兼同知枢密院事，一同启奉：

王令复造南北二关，重加备御，使职智谋深略。度量涵容，出足以振千里之威风，入则以布万民之德泽，三军整肃，一郡安居，保障城池而永固，开兴社稷以攸宁。大器已成，芳名高著，载拜铭恩，谨镌诸启（名）。

天佑四年四月□□日居民□□等立。

文十一行，行十八字，尾款十五字。此碑石质，上底35cm，下底55cm，高89.5cm，厚25cm，于元至正十七年（1357）刻成，原有底座，现已遗失。

一、碑文有关概念略考

阊门，是苏州城门之一。春秋末，伍子胥建的苏州城有八座城门，且均为水陆二门并列，水门也称作水关，分别为阊、齐、胥、盘、相、封、娄、蛇门，阊门在城西北角上，千百年来位置几无变化。多次遭受战火毁坏，历代重修。

“中国古代的城防体系一般是由城（城垣）和池（城壕）两个实体组合而成的。城垣除了有作为主体建筑的城墙外，还有城门、城台、城楼、瓮城、角台、角楼、马面、马道等”〔胡岩涛《中国古代城防遗存研究综述》，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7（3）：57〕，其中瓮城是在城门外（亦少有在城内内侧）修建的半圆形或方形护门小城。

在元末风起云涌的农民起义中，张士诚领导的“张吴”政权以苏州为根据地称霸一方。根据《吴王张士诚载记》，元至正十四年（1354）春正月，张士诚自称“诚王”，建国号“大周”，改元“天佑”。至正十六年，据平江路（苏州）并定都于此，第二年改为隆平府，又纳降于元，被元朝廷封为太尉，但“城池府库、甲兵钱粮，皆自据如故”。至正二十三

年（1363）再次重立旗号，自称吴王。

碑文中启奉者有将军、万户、平章政事、枢密院事等职衔，此皆为武将，但对文中的地方武官任士元，史料中没有查到过多信息。

自宋代设立枢密院作为军事领导机构，元世祖中统四年（1263）五月援引典故先后置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分掌政、军、监察三权，中书省总领全国政务，始设丞相及平章政事、左丞、右丞、参知政事等宰执官，枢密院作为掌管军事的中枢部门，沿袭至明前期，知枢密院事、同知枢密院事和枢密副使等都是秩品较高的职位。

元朝军制中设镇抚、百户、千户、万户、总管、元帅等武职，而许多红巾军政权多沿袭旧官制，“各行省仅丞相或平章二官可知军事，丞相或平章多由蒙古人，偶以色目人充任”（萧启庆《元代的镇戍制度·元代史新探》，新文丰出版公司，1986：126）。此时再加总兵官职衔，统领军队。元顺帝为平定各处叛乱，授以高级将领总兵、总兵官的名目，但《元史·职官志》不载，因此总兵制度在元朝还是一种战时权宜之制”（胡珀《明代前期总兵制度形成研究》，黑龙江大学，2010：11），应用也很随意。



二、立碑的历史背景

元朝前后苏州城遭受过几次重大破坏。“一次是在德祐元年(1275),蒙古入侵,城池受到相当大的损失。元初,苏州城被拆掉很多。直到至正十一年(1351),因各地起兵抗元,元代统治者在此修筑城堡、加厚城濠以驻防”[廖志豪,陈兆弘《苏州城的变迁与发展》,苏州大学学报,1984(3):112]。

元顺宗至正十二年(1352)夏四月诏“天下缮完

廉访使李帖木儿会同达鲁花赤(蒙语“长官”,官职)六十公、太守高履,征调州县民工十余万人,以砖砌城垣,费时四个多月完工,凝聚了劳动人民的血汗。除保存了南宋五门,还重辟胥门。

元末红巾军起义此起彼伏,各股势力互相讨伐,陆战水战多频繁,从守卫自身力量出发需加强海防等各类军事用以抵御,水城门、城墙也是重要设施。同时期此类文物还有葑门城墙的修城铭文砖、浙江湖州临湖门天佑三年碑、湖州迎信门天佑四年碑等。

三、流传经历

此碑记叙了元末重建苏州阊门以巩固城防的史实,并对此举加以自我彪炳,是典型的称颂功德的纪功类铭文碑。其传世经历了较曲折的过程。天佑四年四月(1357)苏州阊门建成瓮城并立记铭石碑。民国十七年(1927)苏州市政筹备处认为旧式城门外的套城阻碍交通,决定自阊门开始予以拆除,并做了慎重的调研。在拆除过程中发现此碑,一陈姓石工欲将之磨毁,被时任吴县的一位领导黄



元新建瓮城记铭石碑

城郭,筑堤防”,之后全国各地开始了大规模的城墙修筑。这从很多文献中可知,如《苏州地方志·沧浪区志》记载“至元十六年(1279)元兵平定江南后,各地城池悉遭夷堙,平江城墙亦被平毁,百姓杂居遗堞之上”。虽存阊、盘、葑、娄、齐五门,然而形同虚设。至正十一年(1351)烽烟四起,于是朝廷诏令各地修复城墙,1357年首次在六城门外加筑瓮城。

《吴邑志长洲县志》亦有载:元世祖平定江南后,城池多夷为平地,防守也荡然无存。“至正十一年,兵起河南汝阳,所在云扰,诏天下缮完城郭。凡为六门,城高二丈三尺。下址叠石三层,加以大甃,凡厚三丈五尺,面广丈六尺,仍甃巨瓦为水沟,每门上建戍楼,下作峨眉甬道,周回夹以长濠,而城于是为备焉。”(陈其弟点校《吴邑志长洲县志》,广陵书社,2006:78)至张士诚入据增置月城(即瓮城)。

熊祥发现并制止,请李根源先生鉴定,他买下后置于其阊园。当时很多文人方家也赋诗纪念。

李根源先生是民国元勋、抗战义士,晚年致力于著书和购藏,对调查保护苏州古迹做出了卓越贡献。“上世纪50年代中期他捐赠了很多收藏,一部分捐给国家图书馆,一部分捐给南京博物院,还有一部分则留在苏州(当时尚未建苏州博物馆)”(高福民《瓮城碑》, http://www.360doc.com/content/13/0324/18/5701732_273650611.shtml),而苏州博物馆和苏州碑刻博物馆始终没有查到其下落。据今存现状来看当时应是捐给了南京博物院,直到第一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时才再现大众视野。

悠悠岁月,多少英雄豪杰随风而去。唯有从文物遗迹中能令人回忆和想象那段群雄战起、金戈铁马的历史。



江苏乡镇志发展述略

◎韩章训

这里所言江苏乡镇志，指1949年以前，含今上海地区。江苏乡镇志（含村志）发展有发轫早、数量多、佳作多和理论资源丰富诸特点。清翁澍纂康熙《具区志》、顾士琏等辑康熙《太仓新浏河志》被《四库全书》列为存目之书。清董醇纂咸丰《甘棠小志》、陶煦纂光绪《周庄镇志》被《续修四库全书》收存。被黄苇主编《中国地方志辞典》列入《著名方志》的有清张承先纂乾隆《南翔镇志》、董醇纂咸丰《甘棠小志》、沈葵纂咸丰《紫堤村志》。

古代江苏乡镇志发展所以能取得如此突出成就，主要原因有二。一是由于经济、社会和文化比较发达。清洪亮吉曰：“天地之气自西北日趋东南。何以见之？秦汉以来，西北郡县倍于东南。今归化城嘉峪关以外，以迄流沙西海河湟朔漠诸地，皆秦汉以来郡县也。今则有一郡并作一县，又或有全郡皆荒弃者矣。东南则不然。即如汉会稽一郡今分作五布政司，东冶一县今分作二布政司，甚至鄞县回浦一乡今亦分作大府六七。盖天地之气所趋，则人民、户口、城郭、镇堡之兴替，视之有不期然而然者。”又论江苏黎里镇与镇志编修关系曰：“黎里为吴江县一镇。今其土壤之富庶、民居之稠密，于西北可比大县，于东南则中下县或有不及焉。民居户籍既繁，则风气亦日开，文采亦日盛，人物轩冕亦遂擅于东南。推之而园亭、祠宇、艺文、金石皆可各立一门。此而不及今条记之，则后此者将何所考焉？”（洪亮吉《黎里志

序》，嘉庆《黎里志》卷首）二是由于热爱和重视乡土文化的学者型乡贤众多。有的当代学者称清乾嘉间武进、阳湖两县文人群体作用曰：“清乾嘉时期，江苏武进、阳湖两县参加各地修志的文人就达五、六百人之多。这些文人群居乡镇，必然会带来乡镇文化活动的繁荣，其中包括了乡镇志的大量编纂。”（黄苇等著《方志学》第741页）

一、发展述略

纵观江苏乡镇志发展历程，大致可作这样表述：滥觞于宋代，发展于明代，鼎盛于清代，持续发展于民国。为便于后文论述，这里得先据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徐复等主编《江苏旧方志提要》和上海辞书出版社2007年版、陈金林等著《上海方志通考》两书著录，对江苏古代乡镇志（不含乡土志）发展情况作如下分朝、分地统计。（见下表）

下表统计虽不太精确，但仍可反映出古代江苏乡镇志发展的大势大略。

（一）数量发展

据晚清学者考证，宋代江苏有两部镇志，即北宋梅圣俞《青龙杂志》和南宋林鉴《续青龙志》。如勒方锜说：青浦“未建县时，青龙为重镇，海舶商贾之所丛集，盐场酒务宋时极盛。故梅圣俞、林鉴皆尝撰述《青龙镇志》。”（勒方锜《重修青浦县志序》，

单位：种

	南京	苏州	松江	扬州	无锡	盐城	镇江	南通	淮阴	常州	徐州	合计
宋				2								2
元												
明	1	8	14		1	3	4			1		32
清	6	64	91	8	8	6	2	4	2			191
民国	3	20	11	4	1				1			40
合计	10	92	118	12	10	9	6	4	3	1		265



《光绪青浦县志》卷首)吴元炳亦持这种看法。他说:青龙镇“宋时盐场、酒务一时称盛。梅圣俞、林鉴皆尝撰《青龙镇志》,今不传。”据此可知,我国最早之乡镇志就不是南宋常棠《澈水志》,而是北宋梅圣俞《青龙杂志》。

自明始,我国编修乡镇志渐多,尤其是东南沿海地区编修乡镇志风气颇盛。其中江苏编修乡镇志最多。据上表统计,明代江苏有乡镇志32种。彼时有些乡镇曾多次修志。如平望镇就四次修志,即有陈氏志、曹氏志、潘氏志和杨氏志。《道光平望志·凡例》述平望镇明代修志曰:“平望志始于前明里人陈克礼《八景志》。徐师增《吴江县志》云《平望八景志》,陈克礼所定是也。后曹孚有《平望志》,见县志书目,今不传。崇祯时,潘凯、杨楨各有志。潘志较详,沈彤多采入县志。”此四志皆亡佚。

清代江苏编修乡镇志更加兴盛。时人朱琿有言,“乡镇之志于今特盛”。(朱琿《元和唯亭志序》,道光《元和唯亭志》卷首)据上表统计,计有191种,彼时江苏许多乡镇曾多数修志。如平望镇就四次修志,即有邹氏志、里人公辑志、翁氏志和黄氏志。黄兆棠述平望清代修志曰:继明后,“国朝邹氏焕续修之,又有公辑志,顾皆未梓,传者恒鲜。道光初,翁氏广平复加纂辑,始刻《平望志》……今议重刊,距翁氏纂修之岁已花甲一周矣。”其中雍正《平望镇志》、道光《平望志》和光绪《平望镇志》今皆存。

民国为江苏乡镇志持续发展时期。彼时江苏编修乡镇志计有40种。时人王謇称苏浙交界一带编修乡村志发展态势曰:自《澈水志》面世后,“嘉禾之唐栖、枫泾,昆山之安定、甫里,苕溪之乌青、南浔,

元和之唯亭、贞丰,吴江之黄溪、黎里,苏浙之交乡镇志乘风飏云起,无虑数十。”(王謇《相城小志序》,民国《相城小志》卷首)民国历时虽然甚短,但彼时江苏有的乡镇还两次修志。如彼时真如里就先后两次修志。第一次编修取名为《真如里志》8卷,洪福章撰,约成书于民国7年。第二次编修取名为《真如志》8卷首末各1卷,王德乾纂,约成书于民国20年。

从上统计表可知,明代江苏有乡镇志32种,平均

每10年有1.2种。清代江苏有乡镇191种,平均每10年有7.15种。民国江苏有乡镇志40种,平均每10年有10.5种,由此可见,自明以来,江苏乡镇志编修速度一直处于递增态势。

(二) 地域分布

自古以来,江苏乡镇志的地域分布一直是不平衡。据上表统计,宋代江苏有乡镇志2种,即梅圣俞《青龙杂志》和林鉴《续青龙志》,皆属松江青浦县。元代未见有乡镇志。在明代江苏32种乡镇志中,其地域分布情况是这样:松江最多,有14种。其次是苏州,有8种。此外,镇江有4种,盐城有3种,南京、无锡、常州各有1种。在清代江苏191种乡镇志中,其地域分布情况是这样:松江最多,有91种,近占江苏总数一

半。其次是苏州,有64种。此外,扬州、无锡各有8种,南京、盐城各有6种,南通有4种,镇江、淮阴各有2种。在民国江苏40种乡镇志中,其地域分布情况是这样:苏州地区最多,有20种。其次是松江地区,有11种。此外,扬州有4种,南京有3种,无锡、淮阴各有1种。

由上所述可知,在宋、元时代,只有松江青浦在编修乡镇志。至明代,编修地域范围明显扩大,苏州、镇江、盐城、南京、常州也开始编修乡镇志。至清代,江苏编修乡镇志地域范围进一步扩大,南通、



国家图书馆藏光绪《周庄镇志》书影

淮阴地区也开始编修乡镇志。但其中绝大多数仍集中经济和社会文化比较发达的苏州、松江（今上海市域）两地区和长江、京杭大运河两岸。

（三）内容进步

宋、元乡镇志内容较为单薄。如南宋浙江常棠《澈水志》计设15门，即地理、山、水、廨舍、坊巷、坊寨、军寨、亭堂、桥梁、学校、寺庙、古迹、物产、碑记、诗歌。此志设置门类虽多，但仅一万五千余字，篇幅很小，记述甚简。如“户口”目仅写这样一句话：“户口五千余，主户少而客户多，往来无定，口尤难记。”其中有一明显缺陷，就是未记人物。明江苏殷聘尹纂崇祯《外冈志》，其内容则比《澈水志》更为全面和深刻。全志分沿革、里域、故迹、水利、桥梁、亭墩、铺舍、街巷、兵防、社学、风俗、时序、俗蠹、寺观、寝墓、人物、列女、文学、授例、附例、廩例、武科、省察、封赠、游寓、物产、游尝、祥异，计28门，约二万二千字。其中所记该镇于明万历间因布市而兴，述布市之盛，对于研究上海市镇与棉织业史颇有价值。

明代江苏乡镇志尚未见到篇幅有超过二十卷的，但清代江苏乡镇志超过二十卷者并不少见。如嘉庆《同里志》就有二十四卷首一卷，道光《元和唯亭志》就有二十卷首末各一卷，宣统《信义志稿》就有二十一卷首末各一卷。与明代乡镇志相较，清代江苏乡镇志在内容上又有明显进步。如翁广平纂道光《平望志》十八卷首一卷，分四十七目，附五小目。卷首包括宸翰、凡例附问答、旧序、图。其中特别值得称道的是通过对景物、水泉、乡都图圩、土产、街坊、塘路、桥梁、急遁铺、亲报房、水栅、凉亭等具体记述，从而全面而深刻展示了江南水乡的独特风貌。

民国乡镇志与清代乡镇志相较，不仅门目有所更易，而且纳入许多新内容。如奚铮纂民国《无锡富安乡志》二十八卷首一卷，约三十万字。卷一区域、决策、自治团体、村落户口，卷二田赋、亩数、粮额，卷三山水，卷四物产，卷五风俗，卷六科举，卷七学校，卷八宦望，卷九忠节，卷十孝友，卷十一孝行，卷十二列女，卷十三善举，卷十四交通、电话、邮政、轮船、区乡道，卷十五兵防，卷十六古迹，卷十七祠墓，卷十八宗教，卷十九隐逸，卷二十儒林，卷二十一文苑，卷二十二耆硕，卷二十三寿征，卷二十四著述，卷二十五艺术，卷二十六流寓，卷二十七祥异，卷二十八杂著，卷首有序，卷末有跋，是一部内容齐备和地方、时代特色鲜明的佳作。

二、理论举要

自明代以来，江苏学界对乡镇志研究一直居于全国前列。尤其是在清代，许多学者不仅参与乡镇志编纂实践，而且还涉足乡镇志理论研究。民国为从传统走向现代的变革期，彼时研究者视野广阔，观点新颖。明代表人物有归有光，清代表人物有阮元、缪荃孙，民国代表人物有王謇。本文除引用江苏乡镇志序跋、凡例外，还酌引寓外学者归有光（苏州昆山）有关乡镇志文章。

（一）观念论

1. 起源说

有的认为，乡镇志源于南宋《澈水志》。如清乾隆《南翔镇志·凡例》曰：“郡县俱有志。宋绍定间，常棠著《澈浦志》，此里志之权舆也。”此中所言“澈浦”即指“澈水”，所言“里志”即指乡镇志。清张树福认为，乡镇志源于北宋梅尧臣《青龙杂志》。他说：“唐天宝五载，青龙置镇。宋设监镇，以理盐榷。梅尧臣撰《青龙杂志》，事在绍定前，则镇志有志当断自青龙始。”（张树福《黄渡镇志自序》，咸丰《黄渡镇志》卷首）民国王謇认为，镇志源于南宋《澈水志》，他说：“初，未尝就一镇一乡之地作志乘以彰之也。自宋绍定五年监澈浦镇税罗叔韶使常棠作《澈水志》……为镇志之滥觞，亦地乘之典刑。”（王謇《相城小志序》，民国《相城小志》卷首）

2. 乡镇志与郡邑志关系说

清阮元认为，乡镇志编修有助于郡县志编修。他在《扬州北湖小志序》说：北湖“地出灵秀，特藉孝廉之笔以传斯地之事也。使各郡县数十里中，皆有一人载笔以志其事，则郡县之志不劳而成矣。”清谭天成认为，编修一统志、郡邑志的资料根基在于乡村志，他在道光《双凤里志序》说：“昔眉山苏氏撰族谱，有各记各支之说。以见闻近则考核易，记载乃得精且详。汇而合之，即全谱所由成也，地志之书亦然矣。下至广大，无非郡县所积，郡县又非乡里所积。一乡之志成，则州郡志基于此。循而省志、一统志，胥不外此矣。”民国殷由莘认为，编纂乡镇志同编纂省县志宗旨一样，皆在用以稽考和取鉴。他说：“一地有一地之山川、人物，以及风俗、掌故等。若无人为之搜集记载，代远年湮，而后势必漫无稽考，将何以发潜阐幽、奖善惩恶乎？是以志乘尚焉。夫省有省志，县有县志，即一隅之地一乡一镇亦当有志明



已。”（殷由莘《巴溪志序》，民国《巴溪志》卷首）民国万以增认为，乡镇志与郡邑志是相辅相成关系。他说：“国有志，省有志，县有志，下至一市一乡莫不有志。志之范围小大虽殊，所以纪文献而资掌故则故一也。方苏浙等省同时修志，并督促各属县举行修志，以为省志之基础，而各属县又刺取各市乡志以为县志之预备。”（万以增《章练小志序》，民国《章练小志》卷首）

（二）编纂论

1. 观念说

明归有光首先论及乡镇志编纂观念问题。他认为，编修乡镇志是文人学士敬乡报国的应有之义。他论安徽《汉口志》编修意义曰：“志其方物、地俗与丘陵、坟墓。汝玉之所存可谓厚矣。盖君子之不忘乎乡，而后能及于天下也。”（归有光安徽《汉口志序》，归有光著《震川集》卷2）有的清代乡镇志编纂者继承明归有光，也认为编修乡镇志是文人学士敬乡报国的应有之义。如嘉庆《方泰志·发凡》论乡贤与修乡镇志必要性曰：“学者惟不忘乎乡，而后能及于天下，此镇志之所以不可不作也。”

2. 宗旨说

清王晦认为，村志编修旨在弥补郡邑志之不足。他论《紫堤村志》编修宗旨曰：“乡城皆王土也，然村迹入县志则已略，入府志则尤略。以略始者，久而必遗，况地兼二郡二邑。如紫堤者，安所得汇各乘而详观之，此村志之所由作也。”（王晦康熙《紫堤村志序》，咸丰《紫堤村志》卷首原序）民国杜纲认为，编修乡志旨在存史。他说：“一统者，一乡之积也。重一乡者，重一统也。今自一统而省而府而邑莫不有志，而乡之志绝少，故里闲事多湮没不传。虽有见于邑志者，亦阙略不详。不知一乡略即一邑略，一邑略即一府略，上而至于一省一统亦无不尽略。”（杜纲《菰溪志序》，民国《菰溪志》卷首）

3. 人才说

清阮元认为，在一般乡镇中，皆缺乏热心乡土文献的修志人才。故他在拜读焦里堂《北湖小志》后曾慨叹曰：“使各郡县数十里中皆有一人载笔，以志其事，则郡县之志不劳而成矣。亟索其稿彙于板，以贻乡人观览，以待长官采摘焉。”（阮元《扬州北湖小志序》，嘉庆《北湖小志》卷首）阮氏此说大抵符合历史实际。清缪荃孙认为，乡镇志编纂者当是“笃学好古之士”。他说：“姚惜抱先生云：凡邑皆有笃学好古之士，考纪其实，互相考订，天下地志何患不

善？……至于镇志，地方不过十余里，学人名士朝夕相聚，治事之疏密，植品之嫩恶，闻见皆真，网罗益富……赵君仲宣墨守家学，富有藏书，仰承先人之志，重辑是编，成书二十一卷。原原本本，殚见洽闻，姚先生所谓笃学好古之士也。”（缪荃孙《宣统重修信义志序》，缪荃孙著《艺风堂文漫存·辛壬稿》卷2）民国郭绍裘认为，编修乡村志得有“博古通今”之人。他说：“志乘之作与史例同，大而一邑，小而一乡，有待博古通今之士为之表彰者多矣。”（郭绍裘《木渎小志序》，民国《木渎小志》卷首）

4. 体例说

清至民国，江苏方志学界对乡镇志体例问题的见解可归纳为三种。有的认为，乡镇志体例全同于郡县志。如光绪《黎里续志·凡例》曰：“里志与县志、府志体例悉同。”故有人主张，编纂乡镇志体例当从郡县志。如光绪《光福志·凡例》述本志编纂体例曰：“是镇原郡县分区，体例当从郡县志。”民国《黄埭志·凡例》亦曰：黄埭“今称乡者，以乡为县治分区，体例当从县志。”有的认为，编修乡镇志体例略同于郡县志。如道光《黄溪志·凡例》曰：本志“为一乡之志，其体例略仿郡邑志。”有的认为，乡镇志体例不同于郡县志。如嘉庆《黎里志·凡例》曰：“志书旧有乡都鄙圩、户口、丁田、赋役之类，今不备采，未敢上拟于县志也。”民国《王家营志·凡例》对于乡镇志与郡县志体例不同问题说得更为明晰。其文曰：“乡镇小志与县志不尽同符。按目以求，则胶而难通，故民赋不载，贡举不载。秩官分入军警，艺文附见人物。亦有在县志为子目，而在本书则特立专门。如警卫示乡治之本原，职业、交通著民生之惨舒，礼俗、宗教见方隅之习尚，县志综贯全邑，势有不该。镇志断地立限，法宜详记，以资考镜。至如建置、河渠、军政、学校、人物、古迹、杂记诸目，以方县志，虽广局有殊，标揭不二。殿以叙传，则私著之恒规，所由与官书异也。”“全同”说不足为训，“略同”说和“不同”说皆有可取之处。

5. 详略说

于树滋认为，乡村志叙事必须详于县志。他在《瓜洲续志序》中叙事曰：“昔德清俞曲园先生有言：‘镇志详于县志，县志详于府志，府志详于通志，以备采择。’树滋悉本此旨。”自晚清始，江苏修志界对乡镇志叙事要求则更为明确。如光绪《罗店镇志·凡例》述详略把握曰：“志体贵简要，而里志则不厌其详。况是志原非定本，详者可以待删，一



或失收，后将欲考无从矣。与其失之漏，何如失之芜。”民国《月浦里志·凡例》亦曰：“志体贵简要，而里志则不厌求详。”

（三）文本说

1.取名说

吴熙认为，乡村志取名既要避免与他志相同，更要讲究名实相符。他论《泰伯梅里志》取名曰：本志初稿“题曰《锡山梅里志》。志例言因吴江、常熟均有梅里，特冠‘锡山’以别之，所见未免迂浅。古来地志之书名同代异例不避。易锡山非梅里所有，又非古今县名。举以名书，甚属无谓。今据其稿芟芜存实，重加删定，厘为八卷。以泰伯、梅里二乡为权舆，即以名志。”吴氏所言完全在理。

2.性质说

有的认为，乡镇志多为民书。如雍正《平望镇志·凡例》曰：“镇志非官志，体裁不过同里诸君子存其目之所睹，足之所历，以为一镇之文献而已。”有鉴于此，有的当代学者还把“私撰性”视为古代乡镇志的一个基本特点。如有学者说：古代“省府州县之志，都是官修之书，极少有私撰的。但乡镇志却相反，多系私撰而成”。

3.作用说

清沈葵认为，村志可借以保存地方文献，可供编修邑志者采择。他说：

“村之有志，所以著一方文献，备郡邑志之采择也。”（沈葵《增修紫堤村志自序》，咸丰《紫堤村志》卷首）民国胡可霭认为，对于乡人来说，乡镇志最具实用价值。他说：“顾或者谓，一统志记载翔实，县府志宏富搜罗，已足供乡人士之研究。乡志奚为哉？殊不知乡者，邑之根荄、国之基础。一统志藏

之天府，非尽人所能窥。县府志提要钩玄，又非一丘一壑能纤介之毕具。乡先生在乡言乡，关心民瘼，一旦主乡政，苟鄙乡志而不寓目，是何异采干霄蔽日之木而不察其根荄处，摘星袖云之楼而不审其基础乎。”（胡可霭《无锡富安乡志序》，民国《无锡富安乡志》）胡氏非常在理，迄今仍有借鉴意义。民国陆曾纘认为，乡镇志能培养乡人爱乡爱国思想。他在《钱门塘乡志序》中曰：此志“可使后之生是乡者，援古镜今而有所感愤也，且使各如君之爱其乡，一一辑志成书，以示后进，则某山某水开卷悉而知。各保其疆各兴其业，是即不言爱国而爱国之道存焉也。”

综上所述可知道，

自宋始，江苏乡镇志发展就一直居于全国前列。尽管江苏古代乡镇志发展已经赢得出色成就，但其发展春天的真正到来，还是始于上一轮修志开展之后的20世纪80年代。据江苏新编《武进县志》载：“一九八二至一九八五年，该县已编纂铅印乡镇志达六十六种之多。”尤其是进入21世纪后，江苏乡镇志更是蓬勃发展。但由于种种原因，此前乡镇志发展历史问题一直未被学界所重视。2015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全国地方志事业发展规划纲要》就号召说：要“指导有条件的乡镇（街道）、村（社区）做好志书编纂工作，做好中

国名镇志文化工程、中国名村志文化工程组织编纂工作。”在当下江苏，以实施“名镇志”“名村志”工程为龙头的乡镇志发展正在蓬勃发展。我们应该加强对乡镇志发展历史的研究，从中总结出有益经验，以促进新时代乡镇志事业的进一步发展。



国家图书馆藏民国《相城小志》书影

浅议《江苏年鉴（2017）》编纂特色

◎ 陈晓婧

《江苏年鉴》是一部编纂特色鲜明的省级综合年鉴。《江苏年鉴》2017卷用165万字全面、系统地记述和反映了2016年江苏省自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 and 生态建设等方面的年度状况，在框架设计、图片专题和资料挖掘等方面都有所创新，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优化调整，着力完善框架设计

《江苏年鉴》始终坚持结合江苏经济社会发展实际，参照相关分类标准，进行科学分类，在多年的编纂实践中形成了相对稳定的框架结构和自身特色。2017卷依据经济社会发展新情况，进一步调整和完善。《江苏年鉴》2017卷设图片专题、江苏省第十三次党代会专辑、文献、大事纪要、省情概览、政治、法治、公共管理、经济结构、农业、制造业、服务业、开放型经济、境外交流、基础设施、城乡发展、区域发展、生态环境、科学技术、教育、文化艺术、大众传媒、医疗卫生、体育、人力资源、收入与消费、社会保障、公共安全、军事、市县发展、附录、索引等32个类目。继续设置“生态环境”“境外交流”“公共管理”“大众传媒”“公共安全”等创新栏目。其中，附录内容重新整合，将原属于政治的“新任领导简介”调

整至附录，将原属于政治的“江苏省省级机关、民主党派、工商联、人民团体领导名录”、市县发展的“市县(市区)领导名录”统称为“组织机构领导名录”放入附录。将原属于公共安全的“民防”放入军事。同时对服务业、公共安全、教育等类目的分目、副分目编排顺序进行了调整，有关副分目的内容资料进行了整合。《江苏年鉴》2017卷收录了有年度特色的大事要事。大事纪要中，收录省政府2016年十大主要任务百项重点工作完成情况。经济结构中，对当前的热点问题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等内容有详细记述。农业中，对农业现代化过程中的农业机械化和农业产业化分别设置为分目重点记述。制造业中，对新能源产业、新材料产业、物联网产业、新能源汽车等新兴产业都用较大篇幅专门记述。生态环境中，记述了全省循环经济的发展情况。

二、精选图片,展现年度热点特色

《江苏年鉴》始终坚持图文并重,重视专题图片的策划和设计。近年来,江苏年鉴社和新华社江苏分社、新华日报社、江苏省摄影家协会等单位建立合作关系,精选记录年度影像、反映社会变迁的典型图片。《江苏年鉴》2017卷继续加大图片分量,共选用图片293幅。图片专题设《江苏要闻》《幸福表情 江苏力量》《年度影像》3个专题。专题图片《幸福表情 江苏力量》突出年度主题,设置“服务群众 满意的‘笑’”“创业创新 成功的‘笑’”“辛勤劳动 收获的‘笑’”“美好生活 幸福的‘笑’”等4个分主题,涵盖了普通群众“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等民生内容,反映了普通群众生产生活、创业创新的幸福美好瞬间和良好精神面貌,鲜明体现了地方特点、年度特色。在专题图片《年度影像》中,分设“心手相牵 盐阜有你”“蒋庄遗址:十大考古新发现”“世界记忆:近现代苏州丝绸样本档案”“水墨江南 园林生活”“城市群 未来协同发展增长极”“最强大脑:神威·太湖之光”“智造:让制造更聪明”“特色小镇 创新创业新载体”等8个主题,重点反映年度大事要事。其中,“心手相牵 盐阜有你”反映了“6·23”龙卷风冰雹重大灾害中,基层党员、机关干部、公安、武警和消防官兵以及志愿者伸出援手救灾区人民于危难之中,与灾区人民共建家园的感人画面;“水墨江南 园林生活”体现了太湖生态之美、田园生活与现代园艺之巧的有机融合;“智造:让制造更聪明”汇集了全球智能制造领域的部分最新成果、领先技术和高端产品,多维度展示了制造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趋势。除专题图片外,随文图片紧扣内容,选图典型,版面设计体现了较好的视觉艺术效果,全刊共选用随文图片162幅。

三、深度挖掘,提升年鉴的权威性

为系统、全面反映相关领域的发展情况,《江苏年鉴》重视基础数据的采集和资料信息的完善,从2013卷起,每年在各单位供稿基础上,主动利用新媒体大量采集各单位的公报、年报、报告、白皮书、蓝皮书、情况

通报等一次文献资料和权威性资料,并将其中有价值的内容进行深度挖掘和拓展后编入年鉴,提高了年鉴记述深度,增强了内容的权威性和可信度。《江苏年鉴》2017卷共著录引用参考文献28份,如《江苏省城镇体系规划(2015—2030)》《2016年江苏省高新技术产业主要统计数据》《江苏省互联网发展状况报告(2016年度)》《2016年江苏省邮政行业发展统计公报》《2016年江苏省环境状况公报》《江苏省水利资源公报(2016)》《2016年江苏省海洋环境质量公报》《2016年江苏省渔业生态环境状况公报》《2016年江苏省卫生和计划生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2016年度江苏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2016年江苏省安全生产情况白皮书》等,确保所用资料有据可查。为拓展补充正文内容,《江苏年鉴》还在相关条目下设置“延伸阅读”,以扩展条目内容的信息量。2017卷设置“延伸阅读”40条,内容涵盖法规文件解读、典型案例介绍、专业术语解释等各方面内容,既是对条目内容的有机补充,也增强了年鉴的可读性。

经过多年的摸索,《江苏年鉴》形成了一套特色鲜明且行之有效的运行机制。一是良性互动机制。各责任编辑与组稿单位通过QQ群、微信群等形式随时沟通稿件相关问题。每年定期召开组稿培训班,现场交流稿件内容及相关要求,实现了编辑与撰稿人的及时交流,确保稿件质量逐年提升。二是定向赠阅机制。每年都免费向省级机关、省内地方志系统、省内市县区图书馆、省内高校图书馆、港澳台大学图书馆以及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家有影响力的图书馆赠送《江苏年鉴》纸质中英文版。2017卷共赠送2000多册,扩大了年鉴的读者群和影响力。三是有效联网机制。为扩大年鉴的使用范围,最大限度地发挥年鉴的社会效益,《江苏年鉴》和全省其它综合年鉴已基本完成数字化、碎片化处理,初步建成全省年鉴智能检索系统,以及经济、人口、科技3个地理信息专题系统,方便读者上网阅读、下载和检索利用。同时,适应互联网时代人们的阅读习惯,《江苏年鉴》在江苏省人民政府网站(<http://www.jiangsu.gov.cn>)设立网页链接,加入中国知网(<http://www.cnki.net>)、超星期刊域出版平台(<http://www.chaoxing.com>),丰富了年鉴的利用方式和传播渠道。



清末著名女诗人吴茝

◎李嘉球

提起苏州的人物，人们就会想到唐伯虎、祝枝山等才华横溢、风流倜傥的才子。其实，苏州也是出才女的地方，沈宜修、叶纨纨、文俶、徐灿、徐媛、柳如是、张藻、朱宗淑、席佩兰……那真是巾帼不让须眉。在众多苏州才女中，清末有位著名女诗人则鲜为人提及，她就是曾经得到冯桂芬等名家高度好评的吴茝。

命运多舛，一代才女英年早逝

吴茝（1837~1874），字佩纕，又字纫之，室名佩秋阁。吴县光福（今属吴中区）人，家住邓尉山南。吴尧封之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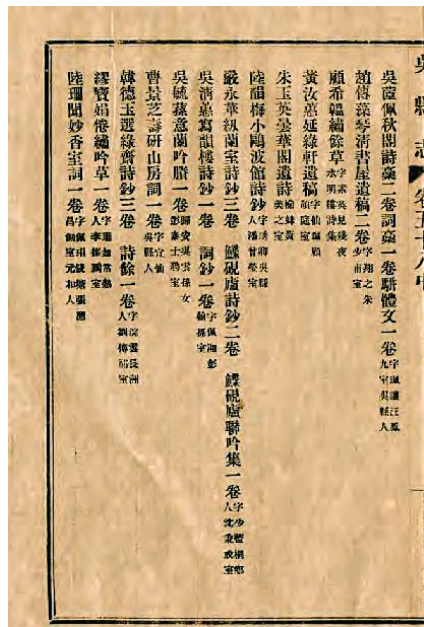
吴茝天生颖慧，深得父母宠爱。或许是天妒其才，她一生时运不济，命运多舛。幼年时父亲便去世，“早岁失怙，终鲜兄弟”，成为家里的独生女。母亲陈氏与她相依为命，加倍爱护，珍若掌上明珠，“甫胜衣，母课以针黹”，她“夷然不屑为，然为之亦未尝不工”（汪鹤衢语）。母亲于是“循《葛覃》之训，兼肄《木觚》之章，乃研朱晨披，即羞调粉，弄墨冥写，辄思散珠”（许鹤巢语）。母亲特地为她延请同里许鹤巢到家里课读。许鹤巢是彼时苏州著名文人，弟子众多，苏州末代状元陆润庠就是其弟子之一。吴茝聪明伶俐，学习刻苦，悟性极高，“得其学业最深”，成为许鹤巢的得意女弟子。

20岁那年，吴茝嫁给长洲儒生汪桐于（字凤

九）。婚后，夫妻恩爱，琴瑟和鸣，志同道合，经常诗词酬答。她侍奉公婆如同父母一般，因此也深得喜欢。小叔子汪鹤衢曾云：“事舅姑如父母，而吾父母亦以己女视之。温恭淑顺，上下交称，吾兄方喜得贤内助。”然而，孰知婚后七个月，丈夫汪桐于突然患病而逝。面对突如其来的灾难，她“百计求死，欲追随于地下”（汪鹤衢语，下同）。当时她腹中已怀胎三月，在家人的极力劝慰下，她“死之念始绝”，忍着悲痛以延夫嗣。六个月后，生下儿子，取名钟彦，“嫂悲戚稍舒，谓育之教之，俾儿获成立，未亡人之责可竟矣。”

咸丰十年（1860）四月，太平天国军攻占苏州。刚恢复的正常生活又被打乱，举家逃出苏州古城，吴茝带领全家老小逃回老家光福。当时“寇窜四乡，朝夕告警”，儿子刚二岁，因迁徙无常，迭受惊恐，又“患河鱼之疾，医药罔效”，至十二月而殁。吴茝“上痛良人之逝，下悼孤儿之夭，饮泣含悲，形如槁木死灰”。然而，她明察大义，强忍悲痛，服侍公婆





与老母，“哀戚不稍形于色，犹惟恐失老人欢。而夜深人静时，每泪湿襟袖也。其视吾辈弟妹，虽极流离，尤能曲慰吾父母意，无几微间言”。期间，携家先后迁徙于常熟海虞、白泖，无锡梅里，沙上，海门，娄江，沪上黄浦、浦东等地，一路颠沛流离。

太平天国结束后，汪家与吴家“生计均非往日比”，而吴茜“钗荆裙布，晏如也”，将生活安排得井然有序。她素性慷慨，好施与。亲戚以及“疏远称贷者，无不如其求而去”，汪鹤衢为此十分感叹，称赞她：“虽然是巾帼，而有侠士之风。”

同治十二年（1873）三月公公逝世，吴茜哀毁过甚而成疾，至明年八月而卒，年仅37岁。后以苦节旌表坊，入祀节孝。

工诗词古文，“巾帼中之庾鲍”

吴茜至性过人，耽文史，嗜吟咏，习书画，平日处闺中，手持一编，寒暑不辍，“虽儒生劬学，不是过也”（汪鹤衢语）。时人秦云评论她“淑质金相，慧心珠转，椿荫早失，荻教常承。针线之外，辄事丹青。膏沐之余，便弄文翰”。她娱情书画，均有相当成就，“细仿蝇头，妙同鹤舞。字偏肖夫簪花，体更摩夫倒薤。临洛神之赋。格写乌丝；拓曹娥之碑，力余粉腕。陋曹衣吴带之能，慕顾绿倪黄之技。管道昇只工篴竹，未获称奇；文端容但善禽虫，何堪擅

胜”。

吴茜没有像彼时一般妇女那样躲藏闺房，而是走出家门，探胜访幽，“洞访五云，泉寻七宝。诣萧家之古寺，览唐代之石幢。虎山桥畔，春雪一篷；铜井峰头，梅花千树”（秦云语，下同）。她志向高远，“探杜库之左癖，登李家之选楼。词赋而外，兼攻论撰，实能褫落浮藻，钩索秘文。尝作《宋穆公论》，识侔东莱，直关南董”（许鹤巢语）。

吴茜工诗词、古文，传世有《佩秋阁诗稿》二卷、《佩秋阁词稿》一卷、《佩秋阁骈体文》一卷，共计诗189首、词21首、骈文4篇。文笔生动有致，“黛笔点来，春山欲活；文几描就，流水有声。又复出风入雅，挾史刳经”（秦云语）。吴茜能熟练运用各种体裁，例如《入真如坊访五峰山馆》，分别写以五言、六言、七言三体诗，五言诗云：“投林入窈窕，日暮鸦背黄。老梅似迓客，权丫发古香。”六言诗云：“四山迸飞瀑音，一肩吟晚霞色。漫寻李郭同舟，且喜机云共宅。”七言诗云：“千鹊檐端报早春，不须障扇隔风尘。闭关著述无余事，闲与云山做主人。”写有《石幢歌》《拟古十二首》《明锦衣卫牙牌》《拟行路难》等许多古体长诗，洋洋洒洒，气势不凡。还善于撰写组诗，曾有《胥江词》20首，遍咏郡西山水、名胜、风俗，信手写来，清新隽永。冯桂芬评论云：“油素三尺，续班氏之吟；锦幃百步，眇谢家之选……顺成合律，平中无颇，哀而不伤，丽

而有则，温柔敦厚。”秦云说她诗词“宜有井水以皆歌，付旗亭而传唱”。其骈体文，“炼句锻词，选言树骨，严王后卢前之界，追潘江陆海之宏。精思而构，不让李华；切响是求，当从沈约。以视夸丽于错彩镂金，求工于俚青妃白者。”

吴苕的诗词少了一般女子常见的风花雪月、无病呻吟之习，多了一股男子侠义丹心、激越豪情之气。例如，她写有《拟行路难》组诗九首，其五云：“秦皇虎视吞九州，敲扑天下陵诸侯。毁销锋镝铸金人，长城万里何绸缪。自谓创基固，万世永无忧。朝采骊山不死药，晚巡海右乘飞流。一旦官车向晚出，迁徙忽起投戈矛。蛾眉曼睩变尘埃，阿房鬼哭声啾啾。吁嗟乎！祖龙气焰尚易灭，男儿何必争兜鍪。”丝毫不见女性纤丽浮藻之痕迹。秦云评论她诗云：“振藻于今，植干于古。词清琢玉，句响铿金。华靡刊落，不吟四角之篇；矩矱遵循，洵合六朝之体。洗绮罗之习，得山水之音。即其所造，足登萧统之楼；由其克专，已入青丘之室。”梁代萧统曾编《昭明文选》，青丘即明初大诗人高启，可见她诗文水平。她的诗词有裂月撑霆之劲气、掀鳌倒鲸之雄气，“斯诚闺闼内之曹刘，巾帼中之庾鲍照矣！”女性世界中的曹植、刘祯、庾信、鲍照。

陶写哀致悲情，比肩朱淑真、李清照

在现实生活中，吴苕是个不幸者，幼年失怙，早年丧夫，又遭太平天国战乱，流离逃难，失所殍子，

一个纤弱的女性承担了多大精神压力；然而，作为诗人的她则是个幸运者，家国的不幸及其颠沛流离的生活，给她文学的创作开拓了广阔的领域，带来了全新的题材。“家国不幸诗人幸”，写悲哀之情成为她诗词、古文的一大特色。

吴苕写有《癸亥五月山中寇窜，将避难之海门，感赋四律》，叙写逃难路上的艰辛与茶苦，其四云：

“汗雨频挥纪客程，乱蝉声噪夕阳晴。东征赋就心还戒，南浦春归调易成。海国扬舲风上下，江山对酒泪纵横。穷途滋味如茶苦，敢自登楼唱渭城。”她充满家国情怀，面对江山破碎，不禁热泪纵横。《初入郡城》写太平天国结束后回城里所见：“西风吹木叶，放溜出空山。作客能无悔，浮家独后还。芜城遍衰草，战血尚余斑。辛苦乡关路，因之涕泪潸。”《雨中还山感赋》云：“山雨抽帆野色昏，琳宫销歇断垣存……谁怜劫后重经棹，肠断难招未返魂。”她的许多诗歌成为记录社会、时代的“史诗”。

吴苕的词倚声而作，分刊合度，高下随心，瑶情远寄，蕙怨弥深，成就尤高。“云黯黯，笼纤月。风细细，透重幕。正漏壶欲断，檐牙犹滴。似我频挥斑竹泪，怜他碎尽枯荷叶。尽黄昏、凄绝九回肠，愁重叠。”（《满山红·听雨》）“飞花竟逐春光去，年华暗惊催箭。梦断难连，酒残易醒，帐触离宫荒苑。天涯路远，纵消息青鸾，好春愁晚。数遍阑干，回肠一曲一回断。依依多少旧恨，尽鹃声啼老，难诉幽怨。心字成灰，眉山更锁，怎说愁痕能剪。湘帘漫卷，任蕉绿樱红，几番更换。罢抚瑶琴，又回廊绕



吴苕家乡名泉七宝泉



宋代光福寺桥

遍。”（《台城路》）秦云评论说：她的作词“按白石之腔，吸碧山之髓。慕新声于箫谱，继雅韵于笛家。朱淑真《断肠》之集，竟获齐驱；李易安《漱玉》之编，遂难志美。”能与朱淑真《断肠》齐驱，能夺李清照《漱玉》之美。

吴苕曾仿鲍照《芜城赋》撰写骈文《拟鲍明远芜城赋》，尽情抒写江南城市遭受战乱的凄惨现状，其中有“见山崩断岸，水咽荒堤，零瓦雨堕，古堞烟迷。天空云漫，日落风悲。猿猱夕啸，鹿（鹿君）麋晨啼。山夔木魅，邀路当蹊。白杨已风摧，丛莽又霜凄。尘埃匝地起，沙砾当空飞。悲铜驼兮草没，敛拱木兮魂依……高岸夷兮深谷陵，流水逝兮丘陇平。念繁华兮顿灭，骇心目兮魂惊。”之语。许鹤巢说她“写哀述情，则杜陵《同谷》；抚时感事，则元结《春陵》。微波眷其郁纡，幽花鉴其悁悒。穷鸟善

号，独弦凄戛”。（《聊生草》序）冯桂芬评论她：“陶写哀致，寒花眷其郁伊；发扬苦节，贞筱侔其凌峭……志操弥洁，吟咏乃厉，加以中丁寇难，涉履关河，肩愁楮墨，贡骚帽绳。故其排遣幽恚，则陶壅株昭，逢纷之章，莫喻其凄婉焉！感怀时故，则尊嘉蓄英，匡机之什，莫喻其豪宕焉！述兰成之哀，丛棘荒荒；操高行之曲，劲节烈烈。所尤难者，商声激矣，应官而能和；秋花悴矣，凌霜而滋茂。”

光绪元年（1875），夫弟汪鹤衢将吴苕的诗稿、词稿、骈文刊刻，光绪十四年继子钟霖又补刻，因此得以传世。2012年2月，吴苕的《佩秋阁诗稿》二卷、《佩秋阁词稿》一卷、《佩秋阁骈体文》一卷，收入胡晓晚、彭国忠主编的《江南女性别集》，并由黄山书社出版。



唐朝经幢



光福寺、光福塔

《巢林笔谈》与白鱼段

◎ 陈 益



生活在清康熙、乾隆年间的龚炜，自称“巢林散人”。他的曾祖父当过明朝官员，父亲是进士出身，也当过官，妻子王氏则为太仓望族后裔。到了他这一辈，家道已经中落。龚炜“喜经史，工诗文，善丝竹，兼习武艺”，文才特别出众。然而年过四十仍屡试不第，身体又常常有病。于是他放弃科第，甘于贫寒，以笔墨自娱。他一生写过《屑金集》《虫灾志》《湖山纪游》《阮途志历》等著作。最为人称道的是《巢林笔谈》，记载了大量清代社会的风土人情、逸闻趣事，成为研究明清苏浙地区社会、文化、历史、经济、人物乃至昆曲等方面的珍贵文献。

读《巢林笔谈·白鱼段补志》等资料可以看出，他们家原来居住在昆山丽泽门，曾有丽泽书屋，后毁于兵燹。从先曾祖父西圃公开始，迁徙到县城西南白鱼段，卜筑于此。这里原本瘠田茅舍，只是一个寥落的村墟。西圃公带领家人与村民修筑圩岸，疏浚支河，励以服田力穡，敦以孝友睦姻，倡导耕读传家，于是地沃俗淳，为周围各村人所称道。康乾年间社会环境安定，经济有所发展，数十年中百姓得以休养生息，白鱼段村气色日新。村上有龚炜曾祖父龚时升构筑的澹溪草堂和一座名曰长寿庵的寺庙，这是龚氏家

族留下的文化印记。

白鱼段，又名白渎、澹溪，今天称白渔潭，离城不过几里路。龚炜说，元代末年吴王张士诚曾在这里为爱妃构筑园林馆舍，歌舞宴饮，纵情欢乐。原有七十二楼，最著名的是鹤嘴、鹤颈、尧仁、齐可、荷花、花瓶等。溪水清冽，景色秀美。虽然家住在这里，平日里却没有尽情游玩。中秋节前夕，他“棹一野艇，随湾荡漾，秋清月朗，风淡波澄，渔唱灯微，犬噪村静。”不由感慨——佳境也！

明嘉靖十八年（1539），时任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的昆山入顾鼎臣奏请朝廷批准，将原来的土城改用砖石砌造，以抵御倭寇入侵。为了支持昆山修筑城墙，他还带头捐出了皇帝的一笔赐金。昆山老百姓纷纷出钱出力，“入木于土，累石于足，封砖于表。”民间传说，白鱼潭是修筑城墙时的制砖取土之处。所以潭水深广，盛产白鱼。昔日经由大渎河与吴淞江、娄江沟通，久旱不涸，东流入海。

关于白鱼段的名字，历来众说纷纭。龚炜认为，“白鱼”的含义很难详解。白鱼的模样很像鲤鱼，出自海中，莫非因为吴王张士诚曾驻蹕于此，才以白鱼之祥瑞附会？古人有段谷、段溪的称呼，水乡称段，

也许有分段的含义？文人墨客的题咏，则称白渚或渚溪。这是因为它源于大渚浦吧。

《巢林笔谈》中，龚炜写到，“天久不雨，炎气酷蒸，且七日矣，今夜更甚，露坐溪上，水树无声，火尘翳面，虽云淡淡起，而风与雨杳不可即。”盛夏时节，很多天不见风雨的村落，酷热犹如蒸笼。他坐在渚溪岸边，仍感觉不到清凉。于是在夜半时分叩开朋友的门，一起跳入河水里。依然感到热，毕竟有些清气，比起在黑暗中喂饱飞蚊，挥汗如雨，好多了。

夏天日长，难以做事，他俯首温习经书。夜里热得无法入睡，就一边乘凉一边背诵史书。想起古人的经史之学，原本也是期望有所实用，他决定经以经、纬以史，撰写《裨政》一编。构思了一个多月，才开始握管动笔。不觉呼吸渐渐急迫，知道自己的老毛病又将复发，只得收辍而去。他不由感慨道：“乃知穷愁著书，亦终属有福人！”哪怕又穷又病，只要能够写书，总归是有福之人。《巢林笔谈》中的许多篇章，完全可能是龚炜在白鱼段忍着病痛写成的。

曾有人问他，诗应该怎么作？他回答道：“我不知道。以鄙见论诗，只有三字：情也，理也，景也。”一言以蔽之，是“真写得”三字。龚炜认为：“真，是诗之根，非学无以殖之。须于吟诵时，得其真气味，然后下笔时可以发我真性情。何谓真气味？神在句外。何谓真性情？言出心坎。若意浅、神竭、韵粘、字呆，都不是真气味。热中人作高尚，富贵性谈场圃，伪君子讲节义，都不是真性情。”只有明白了什么是真，才可以谈论如何作诗。显然，他的这番话抓住了“诗言志，歌永言”的本质。

他记叙的一则关于归有光批注《史记》的故事说，有一位张先生，以自己收藏的一百多卷古书作担保，请求借款。先君同情他，根据这些古书的价值，给予款项。几年过去了，张先生流露出把古书要还的意思。先君答应把书归还。其中有归有光批注《史记》一部，是张先生先祖烈愍公珍藏的，龚炜也非常爱惜，心里始终没有忘记这部书。又过了几年，偶尔与张氏邻居陆惠三谈到归批《史记》，陆惠三知道张氏打算出售，打听什么价格，张氏故意把价格抬得很高，龚炜一时无法回应。回家后跟妻子商量，妻子卸下金簪一枝，交给龚炜。于是这部书就归龚炜所有。

归有光先生酷爱《史记》，阅读时下过很深的功夫，常用五色笔在上面圈点。清代史学评论家章学诚

在《文史通义》中说：“归震川氏取《史记》之文，五色标识，以示义法；今之通人，窃笑之，余不能为归氏解也，然为不知法度之人言，未尝不可资其领会……特不足据为传授之秘尔。据为传授之秘，则是郢人宝燕石矣。”

龚炜当然懂得归批《史记》的可贵，妻子也非常理解他，以金簪换来古书，了却心愿。

龚炜生活的清代康、乾年间，昆曲创作和演出仍处于繁盛期，他的《巢林笔谈》有《戏题傀儡》《相公》《老郎菩萨》等多则记叙昆曲掌故。虽然他只是一个不仕文人，手头拮据，但仍然站在士大夫的立场表达自己对演艺界的看法。

当时有不少人认为，《牡丹亭》杜丽娘的原型是太仓人、明朝阁老王锡爵的二女儿王焘贞。汤显祖师从王锡爵，比他小十岁的王焘贞可算是小师妹。在昆山片玉坊将《牡丹亭》完稿后，曾交给王锡爵的家班上演。然而，王焘贞是个另类才女，未婚嫁而夫病死，于是修筑一个土室修炼，并且收了王世贞、屠隆等大名士为徒。不过汤显祖没有跪拜。龚炜在《牡丹亭非昙阳子事》中表明：“昙阳子（即王焘贞在入道后的法号）仙去，凤洲先生（明代大文学家，其族伯王世贞）传其事，而世或以《牡丹亭》诬之，误矣。”

王焘贞羽化之事，曾经轰动江南，招致朝野批驳，王世贞和王锡爵也因此受到了责罚。龚炜说，对于《牡丹亭》的误解，是将杜丽娘的“还魂”与昙阳子的“复活”混为一谈了。品行卓卓的汤显祖先生是决计不会这样做的。但是已经含冤二百年，没有得到申雪，所以我必须“表而出之”，澄清这个事实。

老郎庙里供奉的老郎神，是昆曲界的崇拜偶像、行业保护神。清代，不仅在老郎庙，一些戏园的后台也设有老郎神像或牌位。演员进后台，先要向神位拱手，称为“参驾”；临出场时再拱手，称为“辞驾”；下场进后台时又拱手“谢驾”。昆曲界一般认为老郎神是唐明皇。唐明皇多才多艺，不愧梨园鼻祖。但龚炜在《巢林笔谈》中说，“梨园所称老郎菩萨者，一粉孩儿也，平时宗之，临场子之，颠倒殊不可解。或云即唐明王。吾则有说以处之：开元精励，尽人可称为宗；天宝昏庸，优人得褻为子，恰合两截人。”他的分析很透彻，梨园供奉的老郎菩萨的形象是颠倒的，恰如唐明皇的精励与昏庸，构成了两截不同的人生。



苏州历史上的意外漂海事件

◎ 孙中旺





苏州处于江海交汇之处,在历史上就和海外交流频繁,涌现出了众多良港,为我国东南地区的重要门户。众所周知,唐代鉴真和尚的第六次东渡就是从苏州的黄泗浦起航,最终安全抵达日本,为促进中日文化交流做出了重大贡献。明代的郑和下西洋也是从苏州的刘家港出发,将海上丝绸之路发展到巅峰。由此可见苏州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的重要地位。

由于海上波涛诡谲,天气变化多端,极大地增加了海上航行的风险,据文献记载,在苏州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多次意外漂海事件,包括海外人漂到苏州,和苏州人漂到海外,虽然其中有些荒诞不经,甚至不乏传奇色彩,但也是苏州对外交流历史的间接反映,检诸史籍,略述如下。

海外人漂到苏州的最早记载是在晋怀帝永嘉四年(310),这一年吴郡司盐都尉戴逢在海边查获一船,船上有男女四人,遍体都长着约半寸多长的毛,身材矮小,不穿衣服,语言不通,不知从何而来。戴逢把这些人送往丞相府,估计是水土不服的缘故,半路上就死了三个,到了都城洛阳后,只有一个男的活了下来。晋怀帝赏赐了一个妇人给他成家,生子后,此人由于经常出入市井,渐渐能够懂晓中土语言,据他自己讲,他是毛民。按《山海经·海外东经》记载有毛民国,其国人遍体生毛。西晋郭璞注《山海经》云,此国在临海郡东南二千里的大海洲岛上,“为人短小,而体尽有毛,如猪熊,穴居,无衣服”,和吴郡

这次漂海事件中的毛民特征相吻合。关于毛民,此后的《宋书·倭国传》中亦有记载云:“日本东北隅,隔以大山,山外有毛人国……东境接海岛,夷人所居,身面皆有毛。”据现代学者考证,很可能是日本东北部的阿伊努人。

唐玄宗开元二十一年(733)八月,又有船从海上漂到苏州,不过这次是一个大船队,船上共有五百九十人之多,身份也很清楚,原来是日本的朝贺使真人广成及其随从,因遇到大风才漂到苏州,当时的苏州刺史钱惟正不敢怠慢,飞奏唐玄宗,玄宗下诏,派通事舍人韦景先到苏州慰劳,然后一起到长安朝贺。

除了日本人外,漂到苏州的还有新罗人。北宋仁宗嘉祐年间(1056~1063),昆山附近的海上有一船桅杆折断,随风吹到了岸边。船上有三十多人,穿着打扮一如唐代人,系着红鞋、角带,穿着短皂衫,见人就痛哭,语言不通,行走时像大雁一样排队前进。后来其中一个人拿出两封书札,一封是唐哀帝天祐年间(905~907),唐王朝告授新罗岛陪戎副尉的文件,另一封是上高丽国表,表中也称新罗岛,两封书札都是汉字写成,由此推测这些人是臣属高丽的新罗岛人。当时的昆山县令是赞善大夫韩正彦,“召其人犒以酒食,为治桅,造转轴,教其起倒之法”,船修好后,这些人都以手捧额头表示谢意。船中有不少谷物,其中的麻子大如莲子,为中土罕见。昆山当地人讨了一些作为种子,当年结出的麻子依然很大,但后来渐种



〔清〕徐杨《姑苏繁华图》（局部）

渐小,最后和当地原生的麻子没什么区别了。

明代还有琉球人漂到苏州的记载。明神宗万历二十二年(1594)五月,有一艘外国船突然进入苏州的沙沟口,当时正是倭寇猖獗之时,乡民以为倭寇来了,吓得纷纷逃窜。后来此船被苏州官兵擒获,船上共有十八人,没有兵器,盘腿而坐,服装的颜色很少见,见人就合掌稽首,口中哑哑有声,但由于语言不通,无法交流。后来苏州兵备道找到了一个翻译,方知道这些人是琉球国人,海行被风吹到了这里。这些人被送到苏州府城羁留了一年多,后来才被琉球派来的贡使验明身份后带了回去。

除了海外人从海上航行漂到苏州的记载外,典籍中苏州人漂到海外的记载也不少。如宋人范成大所编的《吴郡志》卷四十《仙事》就记载,唐僖宗乾符年间(874~879),苏州人胡六子一行航海迷路,漂流到一个风景优美的海岛上,这里不仅鸟语花香,而且人人以礼相待,问之方知此处名为范村,居民都是战国时越大夫范蠡的后代,首领为已经得道长生的范蠡,胡六子一行后在范村人的资助下顺利回到故土。此记载虽然有传说附会之处,但影响却很广,以至于范成大后来把范村作为自己小园的名字,寄托自己的隐居之思,撰写的著作亦以《范村梅谱》《范村菊谱》为名。

晚唐吴人范摅在其所编的《云溪友议》卷二中还记载了另外一个和苏州有关的漂到海外的事件。当时的登

州商人马行余,打算从登州海行,取道昆山到桐庐去。其规划路线大概是海行到昆山后,溯松江或娄江而上到苏州,再转道大运河、钱塘江抵达桐庐。谁知马行余在海上航行时遇到了强劲的西风,一直被吹到了新罗国。

明代苏州人漂到海外的记载有两次都和崇明岛有关,当时的崇明岛为苏州府所辖,和大陆之间尚隔着辽阔的海面,舟行颇险。明宪宗成化十七年(1481),苏州卫的几个军士被派往崇明岛公干,公事处理完毕后泛海而归,忽遇大风,漂到了一个“山麓深旷”的岛上。正在大家茫然无措的时候,忽然从树林里出来一个巨人,“长可三四丈,深目黑面,狞丑不可喻”,此人把船上的军士们捉住,并用藤条贯穿军士们的掌心系于树下,然后又回到树林里去。军士们趁机挣断藤条慌忙逃到船上,正要放船逃走,忽然那个巨人又带着几个长得差不多的巨人从山林中追过来,一把抓住了船舷,这时船上一个胆大的军士急忙持刀砍断了扒在船舷上的巨人手指,这才慌忙逃离。后来在船上发现了一节砍下来的断指,用尺子量了量,竟然长达一尺四寸。军士们回来后把这节断指献给了嘉定县,贮藏在该县的库房里,后来下落不明。

另一则和崇明岛相关的苏州人漂海事件更是荒诞不经。据《苏州府部汇考外编》记载,苏州盐铁口有一个姓朱的人,和同伴一起去崇明岛,但到海中时船破了,同行的人都死了,只有朱某随破船漂到一个海岛上。上岛后

见到一片殿宇,上面写着“紫阳府”三字,朱某在此闲逛时竟然遇到了死去的妹妹,妹妹请他到家中,刚好妹夫回来,妹夫说是在紫阳府服役的,并说紫阳真人是“掌录罪囚”的神仙。朱某说想回家,妹夫就背着他,让他闭上眼睛,片刻工夫朱某就感觉被放到了地上,睁眼一看,已经在家门口的海滩上了。此记载虽然属于“野狐禅”,但能记载于官修的方志中,可见流传之广。另外紫阳真人为道教南宗初祖张伯端的尊号,紫阳又是朱氏的堂号,而故事中的主角正是姓朱,所以此传说可能是江南的道教徒所杜撰,也可能是朱氏家族的附会。

《苏州府部汇考外编》中还记载了明末另外一个苏州人漂海的事件。据说当时苏州堡镇民施仁美,和众人一起去普陀山进香,途中遇到大风,漂到一个国家。这个国家以石为城,只有一个城门,城墙上无雉堞,崖口有守兵,看到此船后就操戈相向。众人赶快拿出香疏让守兵看,守兵奔报国王,国王很慈厚,每天都送米给众人做饭。两个月后,刚好福建梅花山到日本的船路过,国王给以文引,让众人附船而归。上岸后陆行十七日,方到温州。当时松江名绅夏允彝在福建做知县,给资归乡,众人方知漂到的地方为小琉球国。和上一条记载的荒诞不经不同,此记载有姓名可考,并和夏允彝仕宦经历相合,应为实事。

其实在苏州历史上影响最大的意外漂海事件不是海外人漂到苏州,也不是苏州人漂到海外,而是两尊石佛像的浮海而来。

吴郡石佛浮海的故事最早出现在南朝梁僧慧皎所撰的《高僧传》中,在该书卷十三《慧达传》中记载,西晋建兴元年(313),有两尊石像浮在吴郡的松江沪渎口,渔人一开始疑为海神,“延巫祝以迎之,于是风涛俱盛,骇惧而还。”有信道教的,认为是天师之神,“复共往接,漂浪如初”。后来吴县的奉佛居士朱应,闻而叹曰:“将非大觉之垂应乎?”于是洁斋后和东云寺帛尼及信佛者数人到沪渎口,“稽首尽虔,歌呗至德”,说来也奇怪,海上一下子就风平浪静了,“遥见二人浮江而至,乃是石像,背有铭志,一名惟卫,二名迦叶。即接还,安置通玄寺。”唐人陆广微的《吴地记》中还记载了石像置于通玄寺的传奇原因,“像至通玄寺前,诸寺竞争,数百人牵拽不动”,众人都说既然这样,石佛像看来应该居通玄寺了。说来奇怪,这时几个人试着抬了一下,竟然一下子就抬到通玄寺的宝殿中,“神验屡彰,光明七日七夜不绝”。后来梁代简文帝特

意为此撰写了《浮海石像铭》。

此事还有后续,据唐人皮日休的《开元寺佛钵诗序》记载,在石像发现后七年,沪渎的渔人又在沙汭上发现了一个石钵,开始时渔人只当它是一般石臼,但盛放了荤腥食物后,就会“有佛像见于外”,渔人大为震惊,认为此石钵应为先前浮海而来的两尊石佛的遗物,于是也送到通玄寺供奉。皮日休时此钵尚存,“遂观而为之咏”,并写了一首诗寄给好友陆龟蒙,诗云:“帝青石作绿冰姿,曾得金人手自持。拘律树边斋散后,提罗花下洗来时。乳麝味断中天觉,麦麝香消大劫知。从此共君新顶戴,斜风应不等闲吹。”

隋唐时期,吴郡“石佛浮海”的故事传播范围越来越广,佛教典籍中记载尤多。如隋代费长房《历代三宝记》、唐代道宣的《释迦方志》及《集神州三宝感通录》中均记载此事,并记载当时的咸阳长公主“闻斯瑞迹,故遣人往通玄寺图之,在京起模,方欲显相云”,可见当时此事已经声闻官闱,举国皆知。不但如此,唐代的“石佛浮海”的故事还被绘于敦煌莫高窟壁画第323窟的南壁上,至今尚存。该壁画上画有江水上漂浮着两尊站立的佛像,沿江两岸,由远而近有渔人巫师拜像、道人设醮拜佛,最下面是高僧居士礼佛、僧俗大众迎佛的情景。江中有一渡船,几个僧人扶着佛像,一船夫掌舵,一船工撑篙,岸边有跪拜的僧人,近处有骑水牛观佛像的农人,妇人手中还拿着供佛的鲜花。该壁画充满想象,生动地表现了当时的社会风情。宋元以后,“石佛浮海”的故事继续传播,成为中国佛教发展史上的大事,在一定程度上甚至可以与汉明帝“夜梦金人”的神话相提并论,可见其影响之大。

值得一提的是,能浮在海里的石头确实存在,如火山喷发出的岩浆所形成的石头就叫海浮石,因断面粗糙有小孔,体轻,投入水中浮而不沉而得名,广东、福建、山东、辽宁等地均有所产。从这方面来讲,“石佛浮海”的故事确实也有存在的可能。

另外安置两尊石佛的通玄寺旧址即今苏州城内北塔报恩寺所在地,为三国东吴赤乌年间(238~251)孙权为乳母陈氏所建,唐玄宗开元二十六年(738)改名开元寺。吴越钱氏时,迁建开元寺于盘门内。现开元寺仅存的无梁殿已列入全国文物保护单位。据知情人回忆,开元寺原有的两尊石佛在20世纪80年代初修筑东大街时,被砸碎铺在路基下,此两尊石佛应即和“石佛浮海”的故事密切相关,结局如此,实令人感慨系之。



莫愁湖曾公坊之始末

◎ 老 铁

2006年2月，莫愁湖公园管理处在整修湖西儿童游乐场时，清理出一批石块、石柱、石鼓之类，有的已残缺，但还有相当一部分是完整的，除了纹饰图案外，有一块石碑上刻有“赠太傅、太子太保、武英殿大学士、两江总督、一等毅勇侯曾文正公遗爱之坊”，据此，可以推定，这堆石块是清代曾国藩去世后的一座纪念建筑——“曾文正公遗爱之坊”的残留构件。

牌坊为何在莫愁湖

查《南京莫愁湖志》，在《续纂莫愁湖志·关梁》“湖之北·石城桥”条下有：

“其地有官廨，王臣奉使，与四方宾客来会、迎送之所。桂萝亭观察移建劳劳亭于此。其廨侧有石坊，下额

曰：‘民不能忘’，上额曰：‘赠太傅、太子太保、武英殿大学士、两江总督、一等毅勇侯曾文正公遗爱之坊’；联曰‘系亿万家父老讴思，堕泪碑宜同岷首；挽十二载干戈劫运，大功坊合配中山。’由廨过石城桥，可至莫愁湖。”

书证与实物完全吻合，由此可知，此曾公坊构件，就是原在石城桥官廨之侧的曾公坊构件残石。那么，曾

公坊又是谁建的？又是什么时候移到莫愁湖公园里的？什么时候被废弃的？

据朱孔彰撰《题江南曾文正公祠百咏》第十六首云：“旱西门外大功坊，民不能忘惠爱长。驻马万人齐下拜，一时堕泪似襄阳。”后有跋：“江南百姓思公遗爱，建石坊旱西门外，题曰‘民不能忘’。坊有联云‘系亿万家父老讴思，堕泪碑宜留岷首；挽十二载干戈劫运，大功坊合配中山。’”是说“民不能忘”坊即“曾公遗爱坊”，由江宁仕商捐资兴建，是民间集资，在旱西门外建造的，不是官建之坊。可知此坊名石背阴文字应为“民不能忘”，或许还有下款及捐建年月等字样。建坊时间应在曾的卒年，即清同治十一年(1872)。



汉中门外曾忠襄公牌坊



曾文正公遗爱牌坊石构件



曾文正公遗爱牌坊石构件

朱孔彰(1842 ~ 1919),字仲我,原名孔阳,字仲武,别号江东半隐,长洲人。乐骏声子。清光绪八年举人。三赴会试未果,惟一心著述。初留曾国藩幕读书,襄校江南官书局,学业大进。历主蒙城书院,掌教存古学堂。晚年聘修清史。著有《十本经汉注》《说文重文笺》《半隐庐丛稿》《题江南曾文正公祠百咏》等。朱孔彰在冶城校书,对城西情况极熟,此则资料甚可信。

官建的曾公祠在清凉山马端敏祠右后面。上书第一首“丞相祠堂何处寻?清凉山近石城阴。”第二首“路左先经端敏祠,榜题数字系人思。”就是说的官祠。曾国藩去世后,清廷诏在全国范围曾国藩曾任职之地均建祠祭祀。曾国藩曾三任两江总督,金陵官祠乃是奉旨所建。此一祠一坊与莫愁湖胜棋楼后由江宁布政使奉新许振祜所建之曾公阁,一座祠在清凉山,一座坊汉中门外,一座阁在莫愁湖上,鼎足而三,恰成呼应之势!但曾公阁迟于光绪十四年(1888)才建,此前一直是肖公像于胜棋楼的,所以之前十余年相呼应的是祠、坊、楼。

又从《南京戏曲资料汇编》第一辑中发现“莫愁湖公园戏剧石雕”后面有这样一段文字:“1965年拆除汉中门红土山曾国藩‘遗爱坊’时移建于莫愁湖,现四幅在莲园内圆门两侧,两幅在公园左侧水池石围上。徐六幅已破损。”“戏剧石雕”不去管他,曾国藩“遗爱坊”1965年移建于莫愁湖,是关键!不是“拆除……移存于莫愁湖”,可知是曾在莫愁湖复建了的。(该书名为“资料汇编”,实际上就是修志之前的“资料长编”性质,可信度极高)

回到文章开头的2006年,笔者在莫愁湖考察这堆

石构建时,曾向围观群众中几位年约六七十岁的老者询问过,中有一位说是过去(“文革”前)小时候来莫愁湖游玩过的老人,指着湖边不远处说,看到过(竖立的牌坊),原来牌坊就在那里,不高,窄窄的。当时陪同考察的有公园管理处广告部的李军主任以及她的同事张磊等人。可惜当时没有追问那位晨练的老人姓名及联系方式,不能作为口述资料记录在案。从时间上来看,“曾公遗爱坊”即使尝在莫愁湖公园复建过,寿命也不会太长,一年之后“文化大革命”就轰轰烈烈的到来了,一切“封资修”的东西全要砸个稀巴烂,曾公坊肯定首当其冲。从保存的完好程度来看,可能是公园的干部、职工做了一些保护措施,把这些构件拆下来堆放到附近一处不起眼的地方用泥土杂物做了覆盖,才得以大致保全下来的。

这不是没有根据的胡乱推测,莫愁湖公园里的文物级石碑、民国三十七年邹鲁撰《重修建国粤军阵亡将士墓记》碑,就是用类似这样的方式才得以保存下来的,现在已建亭展示。

曾公坊是南京三座曾国藩纪念建筑中,现在唯一还能看到大部分构件的一座,也可算是寿命最长的了。

“独柱式”之误传

前面一直没有提到曾公坊门柱上的楹联,现存的门柱仅剩一根,但上下联竟分别刻在了同一根柱子的正反两面。当年考察时对此也甚是不解,甚而产生了一些误会:同一副楹联的上下联,应分别镌刻在牌坊同一面的

左、右门柱上,或对称的边柱上,一般不会正反面同刻一副联。从这个角度来思考,除非这根柱子是一根独柱,否则毫无道理这样做。以为可能会像六朝陵墓神道望柱、或者佛家经幢类似的形式(此类建筑其实也应该是对称的),而不一定是传统意义上的牌坊建筑样式。当时写了一个初步考证的意见给了公园做个内部参考,主要内容还是释读柱联内容的,也提到了“独柱式”,是用纸质打印件交给他们的。交出后想到不对头,因为碑名石太大,重量可观,独柱式不可能承载得住,且当时也未发现柱子上有镶嵌碑名石的大凹槽(或榫头),只是考虑还要进一步考证,正式写成文章给他们更好,再后来事情一忙顾不过来,就没及时让他们销毁掉这个文件。没想到后来媒体采访时,公园的同志把这个供他们内部参考的材料提供给了媒体,结果传媒上哄传“曾公坊”,附带也送到了“独柱式”的说法。显然,错误的源头在我,怪不得公园的同志。是我被这堆保存较完整的牌坊石构件,仅有一根石门柱(另一根不知到哪去了,或许当年已被毁掉了)搞昏了头。后来看到汉中门外曾忠襄公牌坊老照片,证实曾文正公遗爱碑形制应与之相差不远。

汉中门外曾忠襄公牌坊

写到这里本文也可以结束了,但关于此坊其实还有一件事情很有意思,恰又是莫愁湖上三副有名的“错联”之一,一直没人提到过,故此费些笔墨,以存故实。

下面说说这副对联:

牌坊石柱上镌刻的这副联是惜阴书院山长薛时雨写的。薛时雨(1818~1885),字慰农,一字澍生,晚号桑根老农,安徽全椒人。清咸丰三年进士。官至杭州知府兼督粮道,代行布政、按察两司事。致仕后主讲杭州崇文书院、江宁尊经书院和惜阴书院。居乌龙潭畔“薛庐”。晚年曾募捐重修醉翁亭。著有《藤香馆集》《藤香馆小品》等。薛时雨曾参李鸿章幕,同治元年至赴安庆拜谒曾国藩,慷慨谈兵,为曾国藩所赏识。次年因军功由左宗棠保荐任杭州知府等职。十年后曾国藩去世,薛时雨撰写了不少哀悼诗挽联。其中一副联下款署的是“部民薛时雨”。当时修曾公坊,主事者请薛时雨撰联镌石,薛时雨特意作了两副联,后来上石时竟只用了一副。最离奇的是,上石的这副联,是被“砍了头”的,薛时雨大为生气,在其所著《藤香馆小品》中,附记了这件让他光火的事。

全文如下:

题曾文正公遗爱坊(今刊坊上,石工憎其长,截去首句,不成文理矣)偃武遽骑箕,系亿万家父老讴思,堕泪碑宜同岘首;削平等开创,挽十二载干戈劫运,大功坊合配中山。又(坊联本二首,石工刻上联之半,两面雷同而遗此联)使节三持,遭际如文端、干济如文毅;仁恩再造,钟阜同其高、江流同其深。

未上石的第二副联暂且不提,先来解读一下第一副联。偃武:即偃武修文,意思是停止武事,振兴文教。首句开明宗义指出曾文正在南京的功绩,是荡平了“长毛”之乱,恢复百业,创设江南书局,兴文重礼。骑箕,典出《庄子集释》,多义,此指去世。堕泪碑:唐代诗人孟浩然《与诸子登岘首》诗云“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水落鱼梁浅,天寒梦泽深。羊公碑尚在,读罢泪沾襟。”此因末句而得名。岘首:山名,在今湖北襄樊。古襄阳城西南诸山统称岘山,岘首山地处东南端,是古襄阳的重要标志。岘首山上有羊公碑,又名堕泪碑,为纪念羊祜而立。羊祜是三国魏至西晋初时人,官至征南大将军,为灭吴功劳甚大,为人民做不少好事,为官清俭,是以名垂千古。该联上联以曾国藩比之羊祜,是赞其为民做好事,人民深深怀念之意;下联以曾国藩削平太平天国成为中兴名将,与徐达为明朝打天下成为开国功臣相比,功绩相当,也应建“大功坊”表彰。此联无一字无来历,用典妥贴,可谓名联,用之于曾公遗爱坊堪称珠联璧合。这等精心力作,却被石工“斩首”,薛时雨焉得不恨!

所以此“曾公坊”不恢复便罢,若欲恢复,旧联柱则不可用;若用旧联柱,则非另立一石说明此原二联不可。主事者千万慎之!



曾文正公遗爱牌坊石构件

读高安宁新著《千秋风雅秦淮河》

◎ 雷 雨

南京这一沧桑古城，地处江东，历尽近2500年风雨兼程，长江在此转了一个大弯浩浩汤汤顺流东下，而其小小的支流一缕的秦淮河，大体上自东向西逶迤蜿蜒注入扬子江中，却因其见证了六朝的繁华绝代烟水凄迷，也饱尝了明清的天崩地裂革故鼎新，其文采风流，其桨声灯影，其斜晖脉脉，其举手投足，其一撇一捺，都引人无限低徊，发人遐思悠悠。高安宁先生大半生厮守在秦淮河畔，为其魂牵梦绕，在其花甲之年，向世人奉献出了几乎耗尽其毕生心血的《千秋风雅秦淮河》。千万不要把看似一部并不起眼的十多万字的袖珍图书混同于一般的风景名胜的千篇一律的广告文宣文字。在简约的篇幅之内，作者道出了对一条历史之河的真挚眷恋，对一条文化之河的深情款款，对一条都市之河的独到心得。

秦淮河承载的故事多多，粘稠而多元，世人熟知的是秦淮八艳，是秦淮的风月无边，是桃花扇底送南朝的文人猥琐巾幗不让须眉，作者无意于做翻案正名文章，但他并不是一味指责所谓的商女不知亡国恨，在有限的篇幅之内，尤为着眼于十里秦淮的最为核心的部位，用21个篇目，既有对秦淮河这一“南京母亲河”的简要梳理提要钩玄，也有对“金陵王气”“帝京门户”“越城长干”的历史寻踪平实观察，更有对彰显秦淮文化的“天下文枢”“中国诗河”“贡院首斯邦”的深入解读条分缕析；作者眼中的秦淮河两岸的“周处读书台”“凤凰台”“赏心亭”“桃叶渡”“佛都圣境”等等，不一而足，作者都力求以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令人耳目一新由衷心折。

与秦淮河相关的文字多多，鱼龙混杂，真假难辨。作者对《建康实录》《六朝事迹编类》《景定建康志》

《板桥杂记》《金陵琐志九种》《秦淮画舫录》等与秦淮河相关的乡邦文献，几乎是信手拈来，自然妥帖。这种有一分证据说一份话的踏实求真，而不是望文生义的无端悬猜，特别令人钦佩。他在《中国诗河》中，历数秦淮河与诗歌的种种因缘，从鲍照、谢朓到李白、杜甫、杜牧、刘禹锡，秦淮河就是货真价实当之无愧的“用诗歌来述说文脉的河流”。

书中所描绘秦淮河，饱含真情，溢于言表，渗透

在书中的字里行间，令人感慨。当说到越城长干的时候，他用了敬畏、敬慕、敬爱这“三敬”的由衷之言，敬畏这座城市的诞生之地，敬慕范蠡西施的爱情传奇，敬爱这座城池的最初奠基。这

“三敬”是发自肺腑掷地有声的坦荡心声。在谈到“天下文枢”的时候，一连用了三个“画龙点睛”，“天下文枢”牌坊的出现，为以传扬儒学主流文化为己任的文庙学宫、为以南京文化渊藪而自豪的十里秦淮、为南京这座历史文化名城，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对十里秦淮两岸的“河房”，作者在《河房千秋》中，也是纵情挥洒，豪迈慷慨，

“秦淮河房，宛如透着风雅气的线装书，一排排，一排排地立在秦淮河两岸，既可在外欣赏，也可让人走进去，细细的品读，慢慢地享受。”

秦淮终古流汤汤，山河转瞬悲咸阳。说不尽的千秋风雅秦淮河，值得为其魂牵梦绕的秦淮河。据说，刘铭传曾在河边居住过，而被有些学者认为是桐城派的重要人物之一的戴名世也曾在河边生活过不少时间，竟陵派的钟惺写《史怀》也是在南京秦淮河边，周亮工更是“我傍秦淮住”，但因为篇幅所限，高安宁先生只能是忍痛割爱无暇提及了。





新兴的“盐”与“灶”

◎ 宋本竞

盐城东临黄海，古称“淮夷地”。早在6000多年前的新石器时期已有人群在境内繁衍生息。因盛产淮盐而置县，称城，故称“盐城”。市区北郊亭湖区新兴镇更是一座有2000余年的历史重镇。煮盐大镇，寻着历史的声音走进新兴，仿佛置身于尘封已久的年代。沧海桑田，见证了它的神奇与古老。

“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翻阅掩藏在岁月深处的故事才知晓，战国时盐城先民汲海水而煮盐。秦汉时，则“煮盐兴利，穿渠通行”，可见当时已是盐业兴旺之地。同时还在盐城北门外置管理盐务的盐铁官衙置。唐乾元元年（758）一直到宋朝，新兴即为

盐城监管辖的九大盐场之一。新兴因其设立比附近的刘庄场、白驹场，伍佑场稍迟，而兴旺发达超过以上各场，故名为新兴场。明代时曾设盐课司署，盐业兴旺，商业繁荣，称为新兴镇。宋代天圣六年（1028），因盐税锐减，九处亭场并为七处，新兴场仍为七大场之一。

新兴，既是苏北一座普通小镇，又是一座历史悠久的“盐镇”。在这块土地上，先祖们以煮盐为生，留下丰厚的海盐历史文化遗存。说起盐，那是开门七件事之一。盐是百味之王，这是明代科学家宋应星在其《天工开物》中曾如此评价盐在调味和食物

中所居的这种独一无二的地位。许慎在《说文解字》中释盐写道：“卤也，天生曰卤，人生曰盐。”这表明卤与盐是同一物质，两者的区别在于卤是自然形成的，而盐则经过了人类的加工。而早期的人工盐主要有海盐和井盐两大类，其中资源丰富，易于开采的则无疑是海盐。而我们沿海地区自然属于海盐。海盐是古代文献中所记的“散盐”，并有“散盐煮水为之出于东海”之说，即煮海水熬盐。

与盐有关的故事很多，流传最广的莫过于“盐婆婆”。很久很久以前，有一家住在黄海边，家中只有严大娘一人，严大娘一生无儿无女，专靠给当地的渔民织网度日，因她人心善良，人们都很敬重她。那时的老祖先们吃粗粮、吞野菜，没有吃盐的观念。因缺少盐分，个个面黄肌瘦，手脚瘫软，疾病频繁。一年春天，严大娘在海边挑野菜，偶然发现一块洼地里有一层白色闪亮的细小结晶颗粒，她好奇用手捏点放在舌头上尝一尝，滋味特别，很开胃口，就随手扫了一些带回家。吃饭时拿出一些拌野菜，一尝很好吃，吃过几顿，精神大振，浑身是劲。这下子一传十、十传百，很快传遍了沿海的家家户户，人们吃了这种东西，个个身强体壮，精力充沛。因为这种神奇的东西是严大娘发现的，奉严氏为“严神”。又因“严”与“盐”同音就把这个具有特别滋味的东西叫“盐”了。吃盐的人多了，洼地里的盐很快被吃光，严大娘经过反复琢磨，终于找到了海水与盐的关系，就和邻居们一起海水煮盐，人工产盐就这么发展起来。后来盐民们为了纪念严大娘，就把正月初六定为“盐婆婆”的生日。每到这一天，盐民们就到盐滩上烧纸焚香，保佑他们洒水成盐，点卤成晶。民俗禁忌，仔细想想，不能算是愚昧和迷信，很多时候，它是一种美好期盼，约束人们的言行，让人们心存敬畏。

古之新兴，仿佛是神来之笔，在一片远古的沙冈上写下了硕大的“业”字。新兴场的“业”大，家也大，这家便是煮盐重镇，这业便是盐兴。由唐至明代，新兴场的盐业又兴又旺。它不再仅仅是生产海盐



的场，同时也成为海盐贮运集散地和盐务管理机构新兴场公署所在地。水运，在古代运输中，始终是重头戏。而新兴场境内的串场河奔流不息，造福了新兴场，又成为盐业的重要商埠。当年“舳舻往来，恒以千计……”运盐商船首尾衔接又成了一条“盐运河”。明末，因海势东迁，新兴场一带卤气渐淡，盐业衰落，仅凭商埠而存在。明嘉靖三十四年（1555）新兴公署迁至上冈镇。

“盐”，注定是一个古老的字眼，又是一个带味的词汇。历史上的唐至清代，淮盐一直是封建王朝的主要财源之一。唐时的盐城境内，盛产海盐，贡献极大，闻名全国。宋时，盐城“去海不过一里”，境内有富安、刘庄、白驹、伍佑、新兴等盐场，年产盐



民歌谣：“生在海头，晒熬日头，吃煞苦头，永不出头。”制盐是靠天吃饭的行业，炎热的夏季是制盐的黄金季节，炽热的太阳晒得人都喘不过气来，盐民们要冒着酷暑，在海滩的灶边烧火、浇卤、制盐、挑盐。年轻时曾烧过盐的盐民诗人吴嘉纪曾在诗中对盐民劳作的描绘：“白头灶户低草房，六月煎熬烈火旁，走出门前炎日里，偷闲一刻是乘凉。”除此而外，海潮也经常对盐民的生命构成威胁。清康熙四年（1665）七月初三，飓风大作，海潮涌起数丈高，海边灶民房屋倒塌，淹死盐民数人。可见当年盐民的生活又是何等艰辛和困苦。就是这样一代代盐民在极其恶劣的生产生活条件下生产出晶莹的白盐，这些粒大色白的盐源源不断地运出去，换成了白花花的银两，流进盐商、官吏、把头的腰包，而盐厂灶民仍则以泪洗面，哭断寸肠。到了清代，盐丁们由煮海而变成晒盐。在盐海滩上盘出晒盐城池，夏秋两季纳入海潮、排出淡水，而后将卤水提升到大格盐池再舀入小格盐池，经海风蒸发，卤水变浓，撒入盐种，结晶成形。盐民们说是晒的海水，而实际上是他们身上淌下来的汗水和泪水。

穿越烽火连绵的岁月，翻看一本本泛黄的线装书。古老的文字告诉我们，中国最早的盐商出自春秋时期，官府就直接介入盐的生产运输和销售，形成早期的官营制度。被后人尊为“管盐之宗”的齐国

人管仲则是这个制度的创立者。我国古代制盐生产组织严密，管理严格。盐业生产可分为盐司一场一团一灶组织，盐司为最高管理机构，灶是盐业生产组织中最基层的生产单位。在新兴这个方圆几十里的地方，用“灶”字取地名较多，从南到北有三灶、北灶……这些就是盐场灶址的印证。“灶”在《辞海》中解释为煮盐的锅炉，是烧盐的生产工具，即以盐场的代称。同时又是古代盐民的一个特殊组织，是隶属团下面一个最基本生产单位。灶有户有丁，并非一灶一户，每灶由若干盐户组成。宋代灶之下需二十户，北宋熙宁五年间（1072）将保甲制推行于盐户中，于是出现了“灶甲制”。南宋时“灶”已经不是单纯的生产组织，而是成为政府的政治组织。“灶”既是组织

100多万石（约合2700多吨），生产规模之大，超过四川的井盐工场，属淮南之首。元中叶两淮20个盐场产盐380万石，居全国产盐区之首，素有“两淮盐税甲天下”之说。盐城境内13个盐场产盐290万石，占淮盐总量的76%。《元史·地理志》注盐城为上，足以说明盐城海盐业的兴旺，成了全国上等之县。针对白盐而设的官税，从秦代就有，到了清代，几乎撑起了朝廷的半壁江山。清顺治十年（1653）全国盐税入库212.8万两，而两淮盐税入库就达119.7万两，占全国盐税56.3%，康熙三年（1664）两淮盐税占全国盐税的64.5%。到了嘉庆八年（1803）淮盐纳税仍占全国的40.8%，不难看出盐城产盐在全国的位置是多么重要。

在盐城的海盐博物馆内，我们看到早先的一首盐

机构，又是烧盐的盐灶。说到盐灶，在古代它采用特殊的建造方法，这种灶不用砖石，全用泥土垒制。据史书资料介绍，古代制盐有一灶“五镬”，一灶“六镬”，甚至一灶“十二镬”（镬古代指的是锅）。经考究，旧时的新兴场的灶一般都是一灶五镬。因此，用“灶”命名的地方，除作为最基本生产单位之外，也包含了生产工具的意思。从五代开始，设灶煎盐的盐户就叫“灶户”后来亦作各种盐户的总称。灶丁亦称盐丁，灶户中承担盐役缴盐的丁壮，从十五岁起至六十岁均应服役。北宋开宝七年（974），朝廷为防止盐民私自煮盐和贩盐，规定每盐场设灶十座，每座盐灶下辖灶民20户，按场造册，按实上报朝廷。同时划一座灶为一甲，每甲设一甲头，专门监视盐灶起火、停火，督促灶民纳盐归仓，堵住贩卖私盐的货源。在古代经官方批准，盐商方可售盐，相当于现在的营业执照。若无盐引悬挂腰间，挑盐沿街串巷叫卖，就要受到官方的处罚，按贩“私盐”罪论处。由此可见，盐又是历代王朝专控的一种商品和食品。

岁月沧桑，斗转星移，自清中叶后，黄淮巨量的泥沙不断淤积，使得海势东迁迅速，新兴场的灶地土

卤变淡，茅草渐盛，盐产日薄，因而盐场面积逐渐减少。到了民国初期，新兴场的灶民不得不进行零星垦殖，未料垦殖的经济效益竟是盐业的十倍。于是初尝甜头的灶民，陆续开始了他们世世代代的第一次产业转移，盐灶渐废，垦殖兴起，已成不可阻挡之势。1915年，经南通实业家张謇的登高一呼，各大盐垦公司纷纷成立，废灶兴垦进入高潮，昔日“煮海为盐”由此成为历史。

串场河畔的明星古镇——新兴，它是盐业兴旺的承载者，煮海为盐的见证者。随着岁月流逝，如今静静地小憩于夕照之中。漫步古镇，这里市场繁荣，交通便捷，人杰地灵。昔日的寺庙，亭坊、古银杏树也成了新的旅游景点。当年徐氏接骨灵膏如今名声大振，成为黄海之滨一颗璀璨的医学明珠。有着300多年老字号的姚太生药店，又焕发了新的生机……翻身做了主人的昔日盐丁灶民荡漾着笑脸，奔走在小康路上。新兴，犹如一本厚重的史书，那么古朴、典雅，耐人寻味，爱不释手。我想，饱藏千年盐文化底蕴的新兴镇在盐城未来的史册上必将谱写更加光辉灿烂的崭新一页。

